

小林多喜二 著

文洁若 译

I 313.245

812.841

防雪林



封面设计 王朝瑞

扉页插图 刘若舒 葛



书号: 10088-736
定价: 0.72 元

防 雪 林

小林多喜二 著
文 洁 若 译

防雪林

(日) 小林多喜二 著
山田 歌子
文 洁 若 译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井州路七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 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9.5 字数, 143 千字
1982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8,800册

*

定价: 1.0088-736 发行: 0.72 1



小林多喜二

1924.10.10

译本序

自一九二二年日本共产党建立，至一九三四年遭到反动政府全面镇压，日本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蓬勃开展，为日本文学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优秀的共产党员，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坚定柱石小林多喜二，便是这个时期所涌现的许多天才作家中最杰出的一位。

多喜二于一九〇三年十月十三日生在日本秋田县北秋田郡下川沿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四岁时，由于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全家背井离乡，象逃荒般地来到北海道小樽市，投靠开面包房的亲戚。小林过了十七年寄人篱下的生活，半工半读，先后毕业于厅立小樽商业学校和小樽高等商业学校。一九二四年入北海道开发银行当职员。还在读书期间，他就在《小说俱乐部》上发表《龙介和乞丐》，在《新兴文学》上发表《健》、《回家过节》等短篇，受到文坛瞩目。以后又在《战旗》上发表《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

日》（1928）和《蟹工船》（1929），引起了巨大反响。这两个充满革命斗争精神的中篇小说一并译载于当时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机关杂志《世界革命文学》上，使多喜二成为日本无产阶级具有代表性的革命作家。一九三〇年，《蟹工船》的中译本问世。作者在给译本写的序言中说：

“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给予骨肉相连的日本无产阶级以极大的鼓舞。”由于在中篇小说《在外地主》中揭露了银行勾结地主剥削农民的罪行，多喜二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解雇。转年三月来到东京，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当时如火如荼的日本革命斗争和革命文学运动中。一九三一年担任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书记长，十月秘密参加日本共产党。次年四月被迫转入地下，成为日本革命作家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奋不顾身地掀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斗争。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正当他在街头进行联络时，由于叛徒告密而被捕，遭到法西斯警察骇人听闻的严刑拷打，当天就壮烈牺牲。多喜二被虐杀后，鲁迅先生在唁电中说：“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是兄弟。……我们坚决地踏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携手前进！”

在不到三十个年头的短暂的一生中，小林多喜二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除了上述作品

外，还有《工厂支部》（1930）、《组织者》（1931）、《安子》（1931）、《沼尾村》（1932）、《为党生活的人》（1932）等十几部中篇，五十多个短篇，以及相当数量的评论、散文、书信、日记和诗歌等。在多喜二写作的年代里，苏联十月革命的光辉正照遍全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慢性经济危机开始在日本蔓延。当时日本国内矛盾日趋尖锐，日本反动政府的穷兵黩武政策弄得民不聊生，终于爆发为一九一八年的抢米斗争。日本共产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奋起同地主资产阶级开展斗争，矛头指向反动政府，反对它所发动的侵华战争。

多喜二在自己的作品中深刻地揭露了日本统治阶级的虚弱本质，并塑造出一系列革命者的崇高形象，鼓舞日本人民坚决进行革命斗争。因此，当时日本反动统治阶级对多喜二恨得要死，甚至在肉体上把他消灭后，仍惧怕他的作品在广大群众中所产生的精神力量。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五年侵华战争全面展开期间，谁要是收藏了多喜二的著作，就要被逮捕。但是革命的火种是扑不灭的。第二次大战后，多喜二的全部作品得以基本上恢复本来面目，大量发行。他的主要作品被译成许多种文字，广泛受到读者欢迎。多喜二牺牲后近半个世纪来，他的作品的重要价值越来越

为日本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所认识。

在早期的作品中，多喜二就对贫苦人民寄予同情。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日本工农运动蓬勃发展，促使作者密切注意社会问题。他在《杀人的狗》（1926）中揭露了被骗到北海道的劳工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和迫害。

一九二六年冬，北海道矶野农场的佃农开展减租斗争，转年春，以佃农的胜利而告终。多喜二以实际行动支持了这场斗争。那次斗争结束后，多喜二就着手写《防雪林》。当时，农民问题在现实生活中最为迫切，农村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和工人联合起来，向地主资本家开展激烈的斗争。在近代日本作家中，多喜二是最早通过文学作品来反映这一重大斗争的。

在多喜二的全部作品中，《防雪林》的发表过程是曲折的。它在作者牺牲后才问世。战后初期为了编辑《小林多喜二全集》而成立的委员会发现了多喜二这部遗稿，一九四七年予以发表。这段蹊跷过程既说明小林对自己作品的要求有多么严格，又可以看到他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

《防雪林》的原稿上，除副标题“献给北海道”外，还标有另一个题名：《石狩川畔》。作者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写道：“《防雪林》（《石狩川畔》），预计约达一百

二三十页，现已完成三四十页。（月初动笔的）目前撂下了。我一定要把它完成。我想塑造一个高尔基的契尔卡什^①或有岛武郎的该隐的末裔^②那样一个没有纤弱神经的原始人的形象。此外还想描写农民的生活。”

这个中篇的写作一度中断，同年十二月，多喜二又继续写下去，次年四月二十六日才完成。可能由于这篇小说的描写偏重于个人报复行动，作者对它不满意，生前没有予以发表。后来他把同一题材改写为《在外地主》。在后一作品中，个人报复行动不见了，而代之以工农联合起来所进行的集体斗争。《在外地主》克服了《防雪林》主人公的那种无政府主义倾向，思想性提高了，然而日本有些评论家认为，在艺术性方面，它不如《防雪林》。例如作品中主人公源吉邀上伙伴阿胜到石狩川去打渔的描写，农民在冰天雪地中乘着雪橇到镇上去卖农作物，被警察赶回途中又遭到暴风雪袭击的场面，《防雪林》总是通过自然景物的描写来渲染气氛，衬托人物情绪的变化。日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评论家江口涣说：

“在描写大自然方面，他显示出高超的写作技

^①高尔基的同名小说《契尔卡什》中的主人公。

^②指日本作家有岛武郎（1878—1923）的同名小说《该隐的末裔》（1917）中的主人公佃户广冈仁右卫门。

巧。小林多喜二不仅仅是个优秀的无产阶级作家。象这样出色的大自然的描写，在近代日本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①

在《防雪林》中，多喜二还想阐述这样一个论点：即使是没有阶级觉悟的农民，一旦被逼得走投无路，也会铤而走险。他们站起来后，就将自发地组织起来。然而如果没有很好的领导者，他们的统一行动仍不堪一击。

在这一作品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贫苦农民源吉的形象。他强悍粗犷，带有原始气息。他与以自己的父亲为代表的逆来顺受的老一辈的拓荒者不同，他敢于反抗。当地主串通警察对农民施加暴力后，他便单独采取行动，纵火烧掉地主的住宅。

同样是二十世纪初叶的北海道拓荒者。多喜二所塑造的源吉的形象远比有岛武郎《该隐的末裔》中的佃户仁右卫门要高大。仁右卫门被描绘得粗野落后，仁右卫门的狂怒是盲目的，他霸占邻居的妻子，和贫困的农民闹不团结。正因为多喜二本人就是个穷苦佃户的儿子，他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源吉的思想感情。源吉爱憎分明，他把违禁捕来的鱼全分给穷哥儿们吃。源吉有敏锐的观

^①《防雪林·在外地主》解说，第258页，东京岩波书店1954年版。

察力和深思熟虑的能力，从小认识到财主是使他的家庭和周围的佃户不幸的根源。农民和警察发生冲突后，他认识到社会制度本身是维护富人的利益，与穷人为敌的。

与多喜二早期的作品相比较，《防雪林》有着广阔的社会背景。作者第一次抓住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主题。这一点成为他以后创作的一个特征。这篇小说中出现了他过去的作品中所不曾看到过的思想进步的人物。这些新型人物不是孤独的反抗者，而是本阶级的代表。这以后，多喜二作品中的中心人物——不论《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中的渡抑或《为党生活的人》中的佐佐木，都是有觉悟的革命家。

在《防雪林》中，多喜二第一次塑造了人民的群像。作者笔下的人物在从事革命斗争中集结成为活跃的力量。在作者以后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因此，《防雪林》可以说是多喜二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比起初期的短篇来，他的视野显然扩大了，这部作品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融合在对现实生活的描写中，形成了完美的艺术风格。它也是多喜二创作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作者仿佛翱翔在“防雪林”所在的北海道辽阔的原野上，写得酣畅淋漓，一泻千里。这部作

品已经超出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范围，因为它不仅仅揭露黑暗，并且生动地描写了革命发展过程中农村的生活图景，对生活所提出的问题积极地作出解答，指出当时革命运动的具体斗争方向。以《防雪林》为开端，多喜二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斗争实际，严格解剖自己，在艺术上也不断创新，终于成长为日本最杰出的革命作家。

文洁若

一九八一年四月

和《防雪林》合成一册出版的《活下去！》是一部以一个普通日本女工的真实生活为题材的自传体小说，是劳动人民自己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它代表五十年代初期日本进步文学界的一个新的萌芽，新的方向。因此，日本的文学批评家们认为，这部小说开拓了一个崭新的文学领域。

它的诞生经过是这样的：

在日本东北部盐釜市，有一个进步团体主办的坂医院，住的病人大都是劳苦大众。他们在医院里组织了文学小组，领导者是佐藤一和武田久。他们两个人都是松川事件这一冤案中的被害人。本书作者山田歌子（真名镰田歌子），一九

五二年因患肠结核症入院疗养，不久她也成了文学小组的一员。

有一天，医生问起歌子的家庭情况，这个二十三岁的女工就述说了她自己的身世和她一家人的遭遇。医生听了，深深受到感动，就鼓励她把自己的生活写出来。然而歌子是个连“县”字都不会写的半文盲，她怎么能写书呢？她隔壁床上躺着一个女子中学教师，名叫疋田八重。这个病友也竭力鼓励歌子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下来，并且表示愿意帮忙。

於是，歌子就向各病床搜集起包药纸，然后在那一小片一小片的纸上，吃力地写下了她自己跟贫穷困苦搏斗的经历，一共写了二百四十张纸。在写作过程中，文学小组不断地给她帮助，他们把这看作是一件集体的事业。医院副院长高桥实的妻子是一位相当有文艺修养的妇女，她看到这部稿子以后，又亲自来替她加工整理，就成为目前这样形式的作品。所以，这部作品的确可以说是集体创作出来的。

一九五三年底，日本著名作家野间宏（《真空地带》的作者）到坂医院来给文学小组讲话，会后他读了《活下去！》的原稿，认为这是一部写得很真实的文学作品。后来经他介绍，就发表在《文学之友》上。

作者的生平大致就象作品里所叙述的：歌子一家人因为在本乡生活不下去，於是迁居到海边的一个渔港。她在农村里帮人做短工，在鱼类加工场作女工，终年劳累，得不到温饱。她的哥哥被当时的日本政府徵去当兵，死在太平洋战争中。家里祖父母和父母两代，都因为贫病交迫，相继去世。她自己也病倒在医院里。

《活下去！》发表以后，引起了日本读书界广泛的注意，并由仙台文学小组土曜会在坂医院召开了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各方面的读者都对这部作品表示了热切的共鸣。这首先因为它是战后初期千百万日本人民的悲惨生活的真实的缩影。作者抓住了现实生活中的主要环节。这部作品除了成为战后日本进步文坛一个新的重要收获以外，对五十年代初叶日本各地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也起过推动作用。

《活下去！》最初连载在一九五四年三月至七月的《文学之友》上，作者加以修改后，于一九五五年四月由理论社出版单行本，插图作者是安部真知。中译本是根据单行本译出的，并于一九五六年三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二十几年来，译者接到不少读者来信，希望此书能够再版。现

在借《防雪林》出版的机会，将《活下去！》的译文作了一些修改，重排再版。

《防雪林》和《活下去！》是不同时代的作品，虽出于不同作者的手笔，但它们都是反映了压在社会底层的日本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活下去！》最吸引人的是书中那种明朗的乐观主义精神。是的，歌子永远相信自己有一双能够劳动的手，在任何情况下她从不悲观，不妥协。作者通过这个坚强、英勇、正直的人物形象，显示出了日本人民必然胜利的前景。

文洁若

一九八一年六月

目 次

防雪林.....	小林多喜二 (1)
活下去.....	山田歌子 (115)

防 雪 林

——献给北海道

—

十月底。

那一天，冰冷的雨雪朝着那辽阔无垠的石狩平原^①斜地里倾洒下来。

举目四望，毫无遮拦，一排电线杆连绵不断，到了远方小得象火柴棍，终于消失了。剩下的仍旧是一览无遗坦坦荡荡。时而有些象笤帚一样耸立着的白杨树在风雨下摇曳着。阴云密布，天色怪昏暗的。乌鸦不时惊慌地腾空而起，三三两两地朝着略有些亮光的地平线那边飞去。

源吉背着个大包袱，从三里^②开外的有车站的镇上回来了。源吉他们家的房子，就散布在这饱经风雨的平原上，三户一丛，两户一簇，一共

^①日本北海道石狩川所流贯的一个平原，也叫石狩平野。

^②一里约合3.9公里。

二十来家。有的沿着村庄小道排列着，有的一直缩到旱田里。除了当中的小学校而外，家家户户的屋顶都是稻草铺的。房顶东倒西歪，泥墙全都裂了缝，屋子里暗得从外面几乎什么也看不见。窗户小得只是做做样子，牛圈马棚就设在房屋后面或是对着门口。

农舍后边，那点可怜的土地朝着石狩河的方向一溜歪斜地延伸过去。那里虽已开成熟地，然而红土和沙子里面，到处还裸露着石头块儿。那是由于石狩河一年一度必定在五月里泛滥，到那时这一带就全被淹没了。因此，直等五月里闹过大水之后才能在这里种庄稼。旱田尽头是杂草没膝的草原。再过去就是排列在石狩河堤岸上的杀木林。这里紧挨着石狩河。河面很宽，完全看不出水在流动，深得令人毛骨悚然。它蜿蜒曲折，悄无声息地流着。河对岸是沙堤，也是田地弥望。地平线上零零落落地浮现出跟这边一样的庄稼户屋顶，看上去宛如一块块的巧克力。有时候公鸡在对岸一打鸣儿，这边的鸡就遥相呼应。

源吉不知在想什么心事，闷闷不乐地回来了。他走过的家家户户好象都在烧柴禾，从窗户、门口和茅草屋顶的缝隙里全冒出炊烟。由于下雨，烟不能迳直升上天空，被压得擦着地面向四处蔓延。他走过自己家的时候，牛突然粗声粗

气地叫起来。在地里牧放的牛，嘴巴不停地咀嚼着，抬起头望望他。源吉回到家来，只见屋里烟雾腾腾。从外面就能听到妈骂骂咧咧的声音。弟弟由儿走了出来，手里拿着油灯罩子，直揉被烟熏着了的眼睛，眼圈儿上乌黑。

由儿骂了一句：“呸，臭老婆子！”

源吉一声不吭地绕到屋后去。

由儿倚着满是裂痕、簌簌落土的泥墙，开始擦着灯罩。他用手心按住灯罩的一端，往里面哈口气，然后塞进报纸团儿来擦。一遍又一遍地这么做，手上沾了油烟，一股子煤油味儿。由儿顶腻味每天擦灯罩这份差事了。总得等妈妈阿关嚷上几十遍，而且还得饶上一个耳刮子，他才肯擦。

“呸，臭老婆子，”由儿边擦边想起什么来似的自言自语了一声。

“由儿，你要在那儿磨蹭到啥时候哇？”

“这就去！”他回答说，“呸，臭老婆子！”

妈蹲在堂屋^①灶前噗噗地吹着火。她头发乱蓬蓬的，每逢眼睛被烟呛了就用围裙擦。在黑糊糊的烟雾里，阿关看上去简直不象人了，恰似别

①日本农村的房屋，进门处一般只铺着土，叫“土间”，相当于我国旧式建筑的堂屋，在这里做饭。里屋比土间高出一段，拉门外直有台阶。

的什么“动物”趴在那里。她那被灶火忽闪忽闪地照亮了的半边脸尤其显得可怕。由儿一进门她就说：“快把灯点上！”

由儿本来就不耐烦，再给烟一熏，都快哭出来了。他进了里屋，从橱柜上取下灯，鼻涕眼泪不断往外流。他摇摇灯，才发现没有煤油了。

“妈，油没啦。”

“笨蛋，没了，就到隔壁去一趟呗，脓包。”

“钱呢？”

“跟哥哥要！”

“……我害怕隔壁那条狗。”由儿拿着灯，在妈身后打转转。

阿关把放在厨房里沥水的筐箩里的大米倒进锅中：“叫你去就去！”

由儿怕挨打，就走了出去，喊道：“哥哥——！”

他绕到后门，又喊了声：“哥哥——”。源吉正在挨着后门拾掇褐色的鱼网呢；按照一定的间隔安上铅坠。

“哥哥，钱——我打油去。”

源吉默默地从腰兜里掏出一张一角钱的钞票递给由儿，由儿稍停了一会儿，看着哥哥干活。

“哥哥，入江家的阿房说，道厅^①的人来啦。”

“啥时候来的？”

“刚才，在学校。”

“他们住在哪儿？”

“不知道——”

“傻瓜。”源吉晃了晃身子。

“阿房说，所以他们家把网子都藏起来啦。——哥哥，要是道所的人到这儿来，你也得这样啦。”由儿故意把手背在身后给源吉看。

“——傻瓜。——去，去！”

由儿走后，源吉先是咧嘴一笑，然后又耸着他那壮实的肩膀，放声大笑开了。

天擦黑时，风稍大了些，也冷起来了。略一抬眼，就看到越聚越浓的乌云，正在那黝黑的、无边无际的平原和地平线上疾速地翻腾。

天黑下来以后，源吉边用双手掸着沾在衣服前面的尘土，边进屋来了。由儿趴在油灯底下，正在翻来复去地看着那本仅仅剩下两三页的小人书。

“姐姐，你替我读读这个。”由儿说着就去拽坐在炉边衲布袜子的姐姐的袖子。

^①北海道的道政府。

“混虫！”姐姐把手放在嘴上噤了噤。“混虫，针扎了我的手！”

“喂，姐姐，这只狗后来怎么啦？”

“姐姐可不知道。”

“说嘛——”

“讨厌死啦！”

“那我可要淘气啦。”

源吉边坐在台阶上洗脚，边问阿文：“吉村家的阿胜来过了吗？”

阿文仰起脸来望望哥哥，一时没有吱声。

源吉也问了声：“干吗来啦？”就没再问下去。

阿文半晌才说：“来过。”

“哦……说啥来着？”

“啥也没说。”

“啥也没说？……没说今儿晚上要到哪儿去吗？”

“不知道。”

源吉进了屋，盘腿坐在炉边。由于经年累月地烧柴禾，不论顶棚还是板壁，家里到处都是乌黑油亮的。从顶棚上挂下来的好几条长长的烟尘，随着火势和风，直晃悠。

厨房的地是泥土铺的，隔壁就是马棚。所以马棚的气味随时都直冲进屋里。到了夏天，热气

就腾得馊臭馊臭的。成群的马蝇子扑过来。——马时而低声嘶鸣，有时还听到马往板壁上蹭，和用前蹄挠板子的声音。

房间里，只在正当中点着一盏灯。灯影映在用圆木构成的房梁上。灯焰一晃，影子就随着摆动。

妈妈阿关边端出桌子，边问道：“源儿，你找阿胜有事吗？”

“没事。”

“那末跟谁一块儿打网？”

“嗯……谁都成。”

“听说道厅的官儿来了。不要紧吗？”

源吉耸了耸肩，说了声“官儿……”就笑起来了。

“喂，哥哥，这只狗要干啥？”由儿这次把小人书拿到源吉跟前来了。“这回，这狗是要报仇吧？……”

“妈，替我准备一下褂子吧。”

“喂，哥哥，这只狗一定挺凶吧？隔壁阿庄非说这只狗没狼厉害。他是瞎说吧，哥哥？”

“咱们已经有两三个月没吃到鱼啦，妈！——真是太欺负人啦！”源吉恶狠狠地说。

“可你也犯不上担这样的风险……”

“简直是混帐！”

妈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些什么。

“来，吃饭吧。”妈从挂在炉火上的锅里给大家舀青菜酱汤。“喏，阿文也别缝了，吃饭啦。”

由儿喜欢学哥哥的样儿。吃饭的时候，大模大样地盘着腿，扎煞着胳膊肘——他不时地朝哥哥瞥上一眼，并纠正着自己的姿势。

“喂，哥哥，狗和狼，谁凶呀？是狗吧？”

“别说话啦，快吃吧！”阿关呼呼地吹着撵了白薯和小豆的粥，呵叱道。她忙不迭地抽噎了好几次鼻涕。

由儿吃罢一碗粥，就用筷子咣咣地敲碗，递给阿关去添。

“哥哥，阿芳来信啦。”阿文说。

“哦。”

“她说挺想念在这里度过的那些日子。瞎说一气，这里有啥可喜欢的！”阿文满脸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

“哼！别这么说——她说的兴许是真心话哩。”妈插嘴说。

“简直是胡说八道。这儿有啥好玩的？朝哪儿看，都空荡荡的，大得没边儿；到隔壁家串个门，都象是去旅行一样。没有电灯，也没有电报，连火车都没见过——大伙儿全穿得那么邈

邊，二流子似的……”阿文說。

“哥哥，還是狗凶吧？”

“她還說，越是看穿了城市是骯髒的，就越想念在石符河邊上干活兒的那些日子。”

“嗯哪。”

“嗯哪個啥？在這種地方，敲打着馬屁股干活兒，熏得滿身糞臭味兒——有啥意思？”

“喏，源兒，阿文這程子鬧得太不象話啦。”阿關看着源吉說。

源吉沒有吱聲。

“我告訴她我也想去札幌，她說：這不是咱們來的地方——她可忘了是她自己死乞白賴要去的。”阿文說。

外面，雨一陣陣瀟過來，宛如撒豆子般地山响。每逢這種時候，油燈就搖動，大伙兒的影子映照在後面紙門上也忽大忽小地跟着晃悠。

由兒吃完飯，叉開腿站在爐火前面看小人書，把小指尖那麼大的小雞頭露在外面。

他說：“哥哥，你見過狼嗎？”

“沒見過。”

“在畫兒上瞅見過吧？”

“嗯。”

“誰凶？”

“誰力氣大，誰就凶嘍。”

“不行，不兴这么说。”

源吉放开嗓门笑了。

炉火里烧的是树根，大概燃到节子上了，火星儿噼噼啪啪四溅，有一点火星溅到由儿那“活象牵牛花骨朵儿”的小鸡头上。

“好烫！……”由儿丢下小人书，仰面朝天躺下来，啪嗒啪嗒地掸衣服。

“瞧，谁叫你把那玩艺儿冲着火的，招火神爷怪罪啦，傻瓜！”

“妈的，呜呜——嗯嗯。”由儿快哭出来了，直摇晃身子。

阿关和阿文在厨房里竖起一根蜡烛，正在洗碗什么的。雨点在窗户上拍打着，在窗玻璃上流淌着。

“越下越大啦。”阿关说。

阿文搭碴儿道：“哥哥就别干算啦。”

“俺们乍来的那程子，大马哈鱼随便你捉。下晚安静的时候，还能听见大马哈鱼把脑袋伸出河面唧唧地哭呢。”

阿文噗哧一声笑了。

“傻丫头，是真的咧。这年头越来越不好过啦。”

远处，牛叫了，接着，旁处也传来了牛叫声，由于风向的关系，半截儿就听不见了。

由儿仰卧着，哼着什么小调儿。他问道：
“妈，啥叫巫呀？来了个巫，给吉川他爹招魂来着。她说，吉川他爹在阳间给火烧得够苦的啦。——巫是个老婆子呗，都管她叫巫婆。”

“真的吗？”

“吉川家做油炸豆腐哪，说是做给巫婆吃的。”

“是狐仙^①吧。”

“狐仙就是狐狸吧？”

“嗯。”

“阿胜家的芳儿带着狗到吉川家去串门子，挨了一顿臭骂。”

“嗯哪。”

“哥哥，狐狸没有狗凶吧？”

源吉一声不响。

“吉川他妈直号丧，眼睛都哭红啦。”

阿文点上灯笼走进后面的堆房，把手伸进堆在靠门的角落里的草包，掏出土豆，用围裙一兜。老鼠窸窸窣窣地蹿到里边去。灯笼的圆影子在黑糊糊的堆房顶棚上晃动。

“喏，土豆。”阿文回来了，把围裙里的土豆倒在炉边。

①原文作“稻荷”。原是五谷神，他的使者是神狐。后来此词也指狐仙了。相传狐仙喜欢吃油炸豆腐，故民间多以此作供。

“土豆吗？——呸，不好吃！”由儿四仰八叉地躺着，用脚尖把土豆东拨拉一下，西拨拉一下地玩。

“别造孽啦！”阿关用火筷子敲由儿的脚。

由儿缩回脚去，吐吐舌头说。“吉川家吃的是白薯哩。”

“等着瞧吧，你这脚丫子不烂掉才怪呢。”

源吉把两只胳膊直直地往上边一伸，打了个哈欠，映在纸门上，活象鬼影子。

由儿缩着脖子看了看，说：“我怕！”

源吉回头瞥了一眼，说：“怕啥，傻小子！”他把两三个土豆埋在炉灰里。“由儿，呆会儿烤熟了，你可别又吵着要吃呵。”

由儿故意朝一边看，就势儿一歪身向旁一滚。

阿文把没缝完的衣服拿到油灯下，将自己那份土豆埋在灰里。她说：“下雪啦，冷起来了。往后，北海道的日子可讨厌了。就象进了洞的熊似的，大半年出不了房门——烦死啦。”

“烦又顶个啥呢，呃？”

“顶个屁。”

“那你就别吭声啦。”

阿文半晌才不服气地说：“不吭声就不吭声……”

由儿胡乱躺在那儿，手拿尺子，把它掰来掰去。这会儿又在姐姐身上戳着玩，淘起气来了。阿文满肚子气，起初没有理会，只是不在意地用手摸摸被戳过的地方。由儿觉得挺有趣儿，就戳了好几次。后来索性把尺子的一头杵在姐姐的脖子上。阿文这回当真了，说了声：“别闹啦！”

由儿又杵了一下。他说：“哎呀，姐姐的脖子这儿有一块记。”对着那儿又戳了下去。

阿文猛地回过身来，一把夺下尺子。

在炉边盘腿坐着的妈，不知什么时候打起盹儿来了。灯光在她脸上清晰地照出了皱纹，这下子就显出她苍老了。

阿文望着妈说：“最好变得象妈这样。”

灯火照得房间里忽明忽暗。外面，传来人们穿着草鞋在泥泞里吧唧吧唧蹚着的声音。

发条松了的钟，走到八点那儿，却慢悠悠地打了四下。由儿背对着炉子睡着了。源吉到屋外去看雨势。

接着源吉动手做起准备来了。阿文做着针线活儿，时而望望哥哥，问：“行吗？”

源吉没有吭声。他准备就绪，背起鱼网就走出家门。雨停了，然而夜晚黑魆魆的。他好几回都意料不到地踩到洼坑里。那儿满是泥水，每回泥都溅得老高，甚至沾到脸上。天空出现了星

尾。从远处不断传来象是风穿过树丛般的瘆人的声音。四下里一团漆黑，只是远远地在东南方向，地平线上依稀有一点点光，那是岩见沼泽地。

源吉边走边想着自己就要开始干的事。他喃喃地骂了声：“畜生！”然后吐了好几口唾沫。他心里按捺不住，连自己这么走着，也觉得极不耐烦。“畜生！”那路拐弯了。

打那儿拐过去，在相距两百来米的前方发现了光亮。那是从一扇小窗户里透露出来的灯光。突然，在后边十几米的那个草丛上“哗”地响起来了。又下起雨来了。倾刻之间，前后左右都给雨声包围住了。唯有从灯光照亮了的窗口那一小方块儿地方，可以看到雨丝。源吉走到那栋房屋跟前去，猛地听到狗在黑暗中低低地嗥吠着。他忽然想起了狗的名字，就揣摩着方向，低声叫了叫。于是，嗥声停了，有什么东西碰着他的脚——是给狗缠住了。他又叫了两三声狗的名字。

雨声稀疏下来，逐渐止住了。屏息一听，可以清清楚楚地感觉到雨声是从西边停下来的，如今正往东边移动。尽管源吉所呆的地方，雨完全住了，却听见了石狩河那边还在下雨的声音。雨声沿着原野一路上停下来，越去越远，他听得很真切。

源吉绕到后门去，喊道：“阿胜！阿胜！”

源吉听见里屋有人站起来，走下堂屋，趿拉上木屐，走了过来。那个人鼓捣了一会儿门，咯嗒一声把门拉开了。亮光刷的一下射到外面，正照在站在门口的源吉身上。

“是阿源吗？”

“嗯，去不去？”

“去，稍等一会儿。”

“怎么样？”源吉压低了声音说。“你爹没说啥吗？”

“嗯哪。”阿胜含含糊糊地答道。

源吉咧嘴一笑，抽动着鼻子。阿胜害怕，不敢干；今天早晨是源吉硬让他应承下来的。源吉想到这里，直觉得好笑。他说：“那你就快点准备吧。”

过一会儿，他俩已经走在漆黑的道路上了。

“在哪一带干？”

“要径上游走一里来路。这样离北村就近了。不然的话，一旦给发现了，就麻烦啦。”

“听说道厅的官儿来啦。”

“可不是吗？所以就越发有意思啦。”

“……”

“凭啥要给道厅的小官儿发现呢。那些家伙提心吊胆的，再说这会儿也该睡着啦。”

源吉大声笑起来。广漠的平原上连点回音都没有，使人发憊。笑声消逝了。

源吉领先，象是拽着走在后面不大吭气的阿胜似的，硬是大踏步往前走。过了约莫五分钟，又下起雨来了。在无边无际的平原上，黑咕隆咚的，下着瓢泼大雨，连灯笼也不打，这么冒着雨走，阿胜毕竟觉得不自在。

“真糟糕。”

“嗯？”源吉掉过头来，压过雨声问道。

“我说是不大合适。”

“啥？”

阿胜不好意思地笑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向走在自己前面的、肩膀宽实的源吉问道：“官儿住在哪儿啦？”

“在北村。北村的旅馆里。——洗过澡，仰巴脚舒舒坦坦地躺着哪吧。离这儿有三里路呢，不会冒雨跑来的。”

“今儿个早晨我妈到河边去，说是有五六条大马哈鱼露出了脊背，朝下流游去了。”

“是吗，那可好啦。”

他俩默默地走了一会儿，源吉跨着大步走，阿胜急匆匆在后面追赶着。

突然间，路旁一头牛粗声粗气地大叫一声。他俩不由得一惊。

“畜生，吓人一跳。这牛真讨厌！”

接着，远远地传来了另一头牛好象对答的叫声。旁边出现了一座房屋。路过那里的时候，阿胜好象忽然想起来似的向走在前面的源吉问道：

“你听说阿芳的事儿了吗？”

阿胜知道阿芳去札幌之前曾和源吉之间有过什么样的关系。

“嗯。”源吉回答的声音里露骨地表示出心头的 not 痛快。“阿文也真让人伤脑筋。”

“……”

他俩宛如顶了牛一般，都把话顿住了。

“阿胜，你净跟阿文讲些废话。”

“我？”

“嗯。你跟阿文是半斤八两。你腻味种地了吧？”

阿胜又不作声了。

“自从见到了札幌的市街，她光知道作梦啦。”

“当这份穷种地的，只有傻瓜才不会腻味呢！”

“哼——我就是傻瓜呗。”挡在阿胜前面的源吉说到这里，晃着肩膀笑起来了。“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汉。”

阿胜听了，不由得一怔。但他低声说：“这

也没啥好显摆的。”

“阿胜，你知道阿芳在札幌干啥行当吗？”

阿胜吞吞吐吐地说：“听说干的事儿不大体面哩。”

“是卖淫吧？”

雨几乎不下了，只能听到在泥泞中走着的两个人的脚步声。

“……可不愿意让她去卖淫呵。”源吉自言自语地说。

跟在后面的阿胜没怎么听清楚。

他俩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的原野里走了将近半个钟头。

“打这儿穿到河岸上去。”源吉停下步来，接着就从大路拐进了小岔道。“快到了。”

这是穿过旱田的一条小道。每迈一步，裤腿就碰上两旁给雨淋湿了的草，马上就弄得湿漉漉的，挺不舒服。

“喂，小心点儿。”源吉说着，把背着的鱼网向上颠了颠。“这样的雨天，官儿绝不会来的。”

“我……”

“嗯？”

“……”

“啥事？”源吉回过头来问道。“嗯？”

“给逮住，可就完蛋啦。”

“……咋的，害怕了吗？”

“……”

“怎么啦？”

“不大合适。”

“傻小子，鼓起劲儿来。”

他俩走进了一个相当大的树林子。透过树梢，可以看到天空。依稀看得到云彩掠过细小的黑色树梢飘去。树枝摇曳着，彼此碰撞，发出各色声响，汇成一片怪可怕的吼声。走了五十来米，稍微往下一瞅，就看见了石狩河的河面。暮秋，在这风雨欲来的黑夜，河水流动着，闪出令人毛骨悚然的黯光。就连白昼，它也是那么讨厌。河中央有两三个地方，水在静悄悄地打着转转。木片、碎纸之类漂过来，就在漩涡这儿转来转去，好象河底下有什么东西在拽它们，终于被“吸进”漩涡里去了。这情景就连在白天，让人看了也生厌。阿胜俯瞰着这悄无声息、怪阴森恐怖的石狩河，浑身打了个冷战。他向源吉身后紧赶几步，问道：“这是渡口吧？”

他俩朝岸边走下去。源吉把背上的东西咕咚一声攒到系在岸上的小船里。然后他坐在船头上，往四外眺望了一会儿。

源吉掏出烟来，说道：“喂，阿胜，你放开

嗓门儿唱支歌吧。”

阿胜觉得纳闷，叮问了一声。

“啥都行。——喏，我先唱吧。——啥都行，大声唱。”

本来是 你让我 常常来相见，
到如今 你却又 不肯随我的愿。
不愿意 你就该 把话说在前，
那我就 绝不会 跑来见你的面。

源吉可着嗓门儿嘎声唱着。歌声一下子就消失了，一点回音也没有。阿胜心里怪害怕的，直发怔。

“你怎么啦？”源吉突然笑起来了。他摇晃着魁梧的身躯，肆无忌惮地大笑着。他“嗯？”了一声，还是笑个不停。

“喂，别唱啦。”阿胜掣蹙着鼻子眼，恳请般地伫立在那儿。

“哈哈哈哈哈。”源吉笑罢，说道：“再唱一个！”

鸟也飞不到……喔——喔

接着又说了声：“哎，嗓子上不去。”又改

唱道：

花看——樱花，
人看——武士。……

源吉没唱完就止住了，他催阿胜沿着来路折了回去。走了五十几米，又进了树林子。于是他停下脚步，说：“就这样呆一会儿。”他留心观察周围的动静，屏息侧耳细听。他俩这样呆了有二十分钟。

“好啦，不要紧。”源吉说。“喏，走吧。”他俩又走下去，到了船那儿。源吉说：“上去。”

源吉让阿胜上了船，就使劲把船推到河面上，就势儿灵巧地跳上船尾。这样一来，船头就犹如烈马昂首似地翘了起来，船身直晃动。

源吉在鱼网上坐定后，阿胜说：“我还在闷葫芦里呢。”

“是吗？很简单。我故意试试官儿在不在。你是头一遭儿，所以不明白。大伙儿都这么干。”他又补上一句：“可是打现在起，就得放安静些了。”

阿胜浑身颤个不停。他暗自后悔不该跟源吉一道来。人家都说，石狩河闹“鬼”。他总觉得

那漩涡会把他们连船给吞进去。在白天，会认为这是个荒唐的念头，可如今阿胜就不由自主了。事实上，不知怎地，在石狩河里淹死的人，尸体从来没有浮上来过。河比夜晚的海还要可怕。他一个劲儿地觉得水里会“突如其来地”冒出什么来。船顺着水势荡去，忽而船尾朝前，忽而船头向前。听见了水拍船底的汨汨声。两岸黑黝黝的，高耸处恰似陡峭的悬崖，也有低得一直可以看到地平线的地方。树林子延伸到岸边，树叶随风摇曳着。河上是漆黑一团，本来靠水面上微微反射出来的光还能辨认彼此的脸，经过这儿的时候就完全看不见了。

“喂，阿胜，你看着这边。要是有人，就招呼我一声。”源吉说。他自己盯着另一边看。

船朝着下游驶行了十分钟光景。一连下了两天雨，水涨了半尺，水流也湍急了，不久就来到石狩河缓缓地拐个大弯的所在。源吉想靠岸，于是拿起桨，逆着流得相当急的水势划起来。阿胜也拿起桨这么划。两个人挤出浑身气力划着，小船一耸一耸地颠簸不已，橹弯得象弓似的。他俩用力过猛，直打趔趄。阿胜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两三次失掉重心。尽管他俩使足了劲，船还是随时都会给冲到河湾当中去。源吉叉开两脚，金刚力士似的站着，边划边呜呜地哼着。不久，

他俩的努力在船身上只不过显出了千分之一的效果。

“嗨哟！干哪！”

阿胜也浑身汗涔涔的了。

当船划过河中心两米左右之后，好象靠着惯性作用，容易划了。

“这下子可好啦！”

船腾的一声搁到沙滩上了，源吉给捺得差点儿栽个跟头，他用衣袖擦了擦满脸的汗。

“开始干活儿以前，你先去放一会儿哨。”

源吉对阿胜说，并从渔网里找出一根象打棒球用的棍子，递给了他。阿胜好象很稀罕地接过来，苦笑了一下。

“好家伙！”阿胜把这棍子当玩具似地摆弄着，开始攀登沙崖。源吉拿着渔网一端的绳子，跟着爬上去。他俩光把头伸到平地上，先四下里仔细打量了一下。黑魆魆的，看不大清楚。风从老远的地方刮来——他们对风移动的情况，了如指掌。天地连成一片，斜雨渐来，时而在眼前闪现出一道道白光。

“这种时候官儿才不会来呢。”

源吉让阿胜等着。于是，他把绳子捆在早就看中了的树干上。树干给雨淋得滑溜溜的，源吉使劲一扎，树皮就哗啦哗啦地剥落下来了。扎结

实后，他就用双手把住树干，站定了脚根，拼命地摇撼。立刻树叶儿沙沙作响，随着就西里哗啦地落下雨水来。阿胜隔着一定的距离站着，这时候吃了一惊，跑到源吉这儿来。源吉也不由得感到紧张，掉过身来，压低了嗓门严厉地问道：

“咋的？”

“刚才那是啥？”阿胜慌得结结巴巴地说。

“嗯？”

“沙沙直响。”

源吉说了声“原来是这么回事”，就笑了。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倒把我吓了一跳。”

“是啥？我吃了一惊。”

“我摇树来着。水流得太急，我摇摇树干，看经得住不。这会子你那根棍子屁用也不顶了。”

源吉笑道。

他俩又回到船上，把鱼网在船上码好。于是源吉自己划船，让阿胜下网。他拼足了力气朝对岸划去。这样一来，船就沿着河湾到达斜对过的下游岸上了。

源吉边划边说：“来，干哪！”阿胜麻利地把鱼网抛到水里。到达对岸后，在阿胜的帮助下，源吉背着河，把鱼网一端的绳子搭在肩上，挣扎着不让网给流水冲走，然后将绳子扎在岸边的树上。凭着两个人的力气，他俩还不时被

拖得向后边倒。后来把船拉到岸上了。

这样就完了。

他俩商量好第二天早晨四点来钟再到这儿来，于是就各自沿着田间小道回家去了。

源吉进门一看，已经熄了灯，大家都睡着了。他摸着黑儿到了厨房，从缸里舀了两三勺水咕嘟咕嘟地喝下去。马棚里传来吧嗒吧嗒的声音，马甩着尾巴在拍打自己的身子呢。

二

凌晨四点钟，黑得跟晚上九十点钟一样，但是天却略微发蓝，冷飕飕的。

河里涨了水。水势把扎着绳子的树冲弯了，在那里晃悠。虽然他俩离开家走到那个地方，一直都没下雨；着手干活儿的时候，却又下大了。

他俩马上去拉网。逆流拉网可不是件容易事！他们打了好几个趔趄，还差点就势儿给拽到河里去。两个人呼哧呼哧地直喘，约莫二十分钟后，就汗流浹背，冒出热气来。好不容易总算拽开了头，哪怕是一点，也足以鼓起他们的劲头，就嗨嗨、嗨嗨地边吆喝边拽。接着就越拽越顺手，用不着花那么大力气了。

源吉歇了口气，问道：“阿胜，有棍子吧？”

阿胜嗯了一声，源吉就嘿嘿笑了：“真够呛！畜生，混帐东西！”

雨水疯狂地砸在地上，迸溅开来，哗啦啦地流走了一一就象是在顶棚上打翻了水桶似的。由于下雨的缘故，在一片漆黑当中却依稀露出白糊糊的光。

忽地听见了噼喳啪喳溅水的声音，马上又止住了。过一会儿，水又啪喳啪喳溅了起来，接着就溅得更欢实了。网逐渐拽过来了。

拽呵，拽呵，拽了个大姑娘呵，

嗨呀嗨，嗨呀嗨！

哼——嗨，哼——嗨！

源吉气喘吁吁地喊着号子，象跳舞那样摇摆着魁梧的身体。他略弯着腰，蜷起腿，全身有节奏地晃动着，简直象是个孩子。网越收越紧，大马哈鱼发出象是用板子拍打水面似的声音。

“阿——源！”阿胜喊道。

“嗯？”

“你看那个！”

四下里黑漆漆的，活象是用黑布蒙住了双眼。只见一道鳞光忽闪了一下，令人几乎怀疑自己的眼睛。紧接着就是使劲击水的声音。

“是大马哈鱼！”源吉大声说。“好大的个子！”水哗啦哗啦越溅越欢了，就象是小孩子打水仗似的。过了片刻，有两三条鱼似乎蹿上了沙滩，厚实的身子撞来撞去，乱蹦一气。源吉把网交给阿胜拉，自己拿起木棍向岸边走去。源吉忖度着里面有不下十条大马哈鱼。鱼抽冷子将尾鳍一甩，连沙子带水就弹到源吉的面颊上了。

“混帐东西！”源吉用给雨淋湿了的衣袖擦了把脸，估莫着方向抡起棍子，朝着大马哈鱼的鼻头挨去。

啪嗒一声，大马哈鱼尾鳍朝天，挺直了身子。不大工夫，尾鳍往下垂了，等尾鳍软瘫瘫地搭拉下来后，身子颤动了两下，接着就再也不动了。

源吉喊阿胜。待阿胜走过来，源吉一句话也不说，对准另一条大马哈鱼的鼻头就是一棍子。阿胜吓得心里噗通一跳，呆呆地伫立在那里。源吉闷声不响地笑着，用棍子挨个儿挨去。阿胜拽住鳃，把鱼拖走，装在船上的煤油桶里。一拽，有的哆哆嗦嗦颤动着身子，有的大概只剩一口气了，仅仅鳃还在动。

挨着挨着，源吉的心情变得怪狂暴的。每挨一条，他就咬牙切齿地骂一声：“混蛋！”“畜生！”“混蛋！”“畜生！”脸上绷得紧紧的，

忽而又抽起筋来。他象发狂了一样没头没脑地乱接。

后来他又一边接一边喊着平时痛恨的一些坏家伙的名字。他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越喊越来劲。

冷不防一股温吞吞的东西溅过来，沾在脸上粘糊糊的，挺恶心。原来是血。源吉每揍死一条就挨个儿数着，数到“七、八……”大鱼跳动的声音就逐渐少下去了。数到“十”，就只听到源吉近旁有一条鱼在蹦。源吉想走过去，却一脚踩在大马哈鱼那滑溜溜的身上。连他都猛孤丁地吃了一惊，只觉得象是深更半夜在铁轨上踩着了一个被轧死的人似的。“十一条——啊。”源吉说着，侧耳细听。再也没有声响了，唯有雨声突然传到他的耳际。他想：是十一条。

于是他对阿胜说：“齐啦，十一条。”

阿胜把鱼装在两只煤油桶里，为了便于背着走，把它们拾掇好。

“网和船咋办？”

“船吗？——就摆在这儿吧。早晨汽船打这儿过的时候，替咱们拖走。网我背去。”

“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加上水，好沉哩。”

“这点玩艺儿算个啥！”

*

*

*

他俩走上了田间小道。源吉没料到能捕这么多鱼，高兴得象个孩子似的。阿胜却总是提心吊胆的。回去的路上，会不会迎头碰见官员呢？他感到就象有人从背后掐住他的脖子似的。天还没亮，到处都黑洞洞的，牛在一旁猛地叫起来，阿胜差点儿喊出声音。

前面出现了灯笼。

“阿源，灯笼。”阿胜从背后向源吉打招呼。

“嗯。”源吉马上离开田间小道，走进庄稼地。走了将近二十米，就站住了。他俩就这样把灯笼躲过去了。到处是一团漆黑，极目望去，映入眼帘的唯有随着灯笼的移动，它所照到的部分——忽宽忽窄，忽左忽右。灯光在草丛上一晃，一会儿看到小道两旁庄稼地的一角，一会儿又是小道上的水洼子。

灯笼过去后，他俩又回到田间小道上。

“官员这家伙，还打着灯笼呢。”源吉笑道。

“不然就更可怕啦。非跟他撞个满怀，才知道他来了。”

“那就给他个厉害尝尝。”源吉说着，把半截身子扭到后边，将方才那根棍子伸到阿胜跟前。“这个！”

阿胜闻见棍子发着一股子血腥味儿，不禁感到毛骨悚然。

“别瞎胡闹啦！”阿胜结巴得连自己都觉得好笑了。

“在这个村儿里，咱们已经有三个月连一条鱼也没捞着吃。象话吗？到后头去看看河，那鱼儿露着脊背儿游啊游啊，咱们却三个月吃不上鱼。混帐！真是岂有此理！可你瞧，下游那儿，渔场那些有钱的混蛋们，足逮一气。妈的也不要什么执照啦！”

阿胜一言不发。

每逢提到这个碴儿，源吉心里就冒起一股无名的怒火。这时候要是碰上官儿，说不定他就会将打大马哈鱼用的棍子朝着那家伙的脑门子接去。

“要是认为我自己高兴干这种事儿，那就大错特错啦！”

阿胜知道源吉有那么一股子怪“可怕”的劲头，想到这里，不由得胆战心惊。但愿不要遇上官儿才好。他认为如果遇上了，源吉准会把官儿接死，那是确凿无疑的。

阿胜想起他所知道的关于源吉的一档子事。说来有好多年了，源吉他爹打内地来到这狗熊出没的北海道，一直象虾似的弯腰屈背地拚命干活

儿，好不容易挣下一份土地，却又押给一个财主了。到了期限，这块地注定归财主了。他爹颓丧得直嚷头疼。

财主啦官员什么的，噎噎地进来了两三个，让源吉爹在一份文件上盖戳了。他爹直发呆，进屋去取戳子的时候，象是忘了什么东西似的在纸拉门眼前打转转。

源吉爹刚一按戳子，那个低下身子专心致志地注意文件的财主，忽然暗了一声向后仰去。大伙儿惊跳起来。他们看见，当时刚十一二岁的源吉抱着财主的脚，咬住了他那没有毛的小腿肚子。源吉浑身痉挛般地颤动着，眼神都变了，狠狠地咬着。他爹和官员大吃一惊，怎样拉他也拉不开。大块头的财主活象上了圈套的兔子，满地打滚，鬼哭狼嚎。

直到那一天，源吉只字也没提到过庄稼地的事，就连他爹着急的时候，他也一如往常，举止安详，反倒比平时话少了。他却干出了这样的事！这事就添枝加叶地在村子里传开了，阿胜也听说了。

要是发生了什么事，源吉总是不动声色。别人会发表意见，或是互相谈论什么的。源吉却不是这样。别人只是乱吵吵，其实什么也不做；源吉则不慌不忙地径直走去，独自完成谁也料不到

的壮举，回来后也依然闷声不响——这种事例可多着哩。阿胜认为，源吉并不是由于迟钝才这样的，而是因为他是那个有远见的、坚定的人。

阿胜想起源吉从前咬过财主的小腿肚子那档子事，寻思要是一头遇上了官儿，源吉准会拿那根棍子干一家伙。这个念头就象一个可怖的蝎子螫在他的心上狠狠地螫了一下。

他俩默默地走着，只听见泥泞道上啪嚓啪嚓踉过去的声音。时而一脚踩进水洼子里，打个趔趄，才乱了脚步。阿胜边走边注意前边的动静（源吉当然也是这样）。阿胜来到自己家门口的时候，忽然感到浑身瘫软，一点气力也没有了，他这才发觉自己筋疲力尽了。他心想：这下可得救了。

“有一年没吃上啦。喏，让你妈高兴高兴吧。”

源吉说罢，就没了踪影。黑暗中只传来了他的脚步声，转瞬之间就消失了。大概是沿着草地上的一条路拐了弯。

阿胜绕到后门去，把背着的东西搭在门旁的堆房里。这时，听到有人沿着泥泞道走来的脚步声。刹那间阿胜感到自己简直吓呆了。

“阿胜！”

原来是源吉。

阿胜虽然明白过来，也仍然一时说不出话来。

“……是源吉啊。”

源吉嗯了一声，接着，身材魁梧的他就顺着阿胜声音的方向慢悠悠地走过来了。

“喏，天一亮，你就从这里到河堤上的那户人家，挨家挨户地发鱼——每家一条。就这么办。因为大伙儿都捞不着吃啊——你就说是买的好了。我呢，一直发到石田家。应该这么办！对不？”

“嗯哪。”

“明白了吧。那我就走啦。”

于是，源吉就回去了。

阿胜屏息静气地听着源吉离去的脚步声，心想：这个人每迈一步，是多么坚定而有力呵。

三

沉沉欲雪的天气，却又放晴了。

然后一连多少天就都是暮秋天高气爽的日子。

旱田、草原、稻田、树林，以及远远地呈现在西方的低矮山脉，都染成一片黄褐色，与万里无云的碧空形成鲜明的对照，无边无际地蔓延开

去，庄稼人仿佛觉得这是一副难得见到的新鲜景致。

为了迎接即将逼来的冬季，村里的人们到庄稼地里去着手准备。四五个姑娘一大早就背着杂粮，套上大车出发，要到有车站的镇子去，在那一带叫卖。阿文也一道去了。她们叽叽呱呱在大车上闹腾，每路过一家庄稼户，就从车上打招呼。天黑下来后，姑娘们回来了，扯了些做内裤和汗衫用的布。一路上几个姑娘用美妙的嗓子唱着，呆在家里的人马上就知道了：“哦，刚刚回来啊。”

山货店的小伙计不时骑着自行车从有车站的镇子沿着乡间小道跑来。在地里干活的庄稼人每次都伸伸腰看着他。小伙计路过的当儿还经常跟他们打声招呼。

准备腌菜的妇女们走下石狩河的堤岸，用绳头做的炊帚刷洗刚刚拔来的、裹着土的萝卜。河在这里拐弯，由于水流的关系，形成了沙滩。妇女们唱的各色各样的歌儿，一直传到在堤岸上干活儿的庄稼人的耳际。

汽船为了载运山里生产的农作物——主要是青豌豆，发出唧唧唧的噪音逆流而上。孩子们只要从远处略微听见这个声音，就沿着岸边小路一股劲儿跑去。然后就坐在堤岸上，悠荡着脚，等

待汽船经过。但凡是好天气，孩子们总是这样。溯流而上的汽船，光是听到声音，却总也不见踪影。由于河道弯曲，有时船隻反而会突然出现。孩子们高兴得直摆手，喊“呱呱叫”什么的。船上一个穿油垢的蓝衣服的人，偶而挥挥帽子。有时孩子们不管怎样喊，船上也没有人答理，于是他们就无精打采地默默目送着船的后影。汽船拖着载货的筏子，不停地嗒嗒嗒响着，使劲晃动船身，以几乎看不出是在前进的速度，打孩子们跟前经过。孩子们说：“哎呀，汽船出汗了，它呼哧呼哧地喘气哪。”

由儿把坐在旁边的那个伙伴的手抓过来按在自己的胸口上，说：“你看得出这里在扑通扑通跳吗？我姐姐说过，汽船嗒嗒嗒响，就跟人的心跳是一样的。”

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说：“是吗？”于是，一个个都把手按在自己的心上。然后又异口同声地说：“真的咧。”

汽船驶过去以后，孩子们为了去帮在地里干活儿的爹妈，一溜烟都跑掉了。

过了两三天，特地从镇上请来的和尚在小学校布道。这一带的地主为了增进庄稼人的道德修养，一年必然举办两次这种宣讲。上岁数的庄稼

人巴望着听，还感谢肯做这种事情的地主。地主让年轻姑娘也“务必”参加。因此，小伙子们有时也给拉去了。

到了那一天，干了几十年庄稼活儿，象包袱皮一样皱皱巴巴、犹如生了锈的弯钉子的老人，一早就互相吆喝着出发了。连出屋子去解个手都不方便的老太婆，也被认为非去不可，于是她们就由七八岁的小女孩或十七八的大姑娘搀着。人们身穿与黧黑的面孔不相称的、以红为主的漂亮衣服，在田间小道上走着。

源吉妈自打居了孀，没缺席过一回。每次她都想把女儿阿文也带去，可阿文就是不理这一套。作妈的说：“你这个天打雷劈的。”

学校里的教室把桌椅都搬开了。宣讲快开始的时候就挤满了人。这些聚集一堂的每个庄稼汉由于经年累月的艰苦劳动都成了残废——一个个都是畸形的。那些上了年纪的，宛如从土里爬出来的癞蛤蟆。尽管住在同一个地方，彼此见面的机会却不多。大家好久不见了，就东拉西扯地闲聊起来。也有拿出烟杆子来抽一袋的。一块儿来的孙男孙女们在淘着气，从老人的驼背上跳过去，吵闹着。教室里热气腾腾，发出那么一股馊味儿。

和尚照例是从离这儿四里来路的村子请来

的——那个村子比这个东村齐整一些。他有时就穿着僧袍骑自行车，有时在带篷子的大车里铺个坐垫搭车来。这回因为刚下过雨，他是坐大车来的。和尚四十开外，个子矮矮的，两眼落了坑，眉毛浓重，脑袋秃光光的。他总是用沙哑的嗓门儿大声讲道。他有个毛病，边讲边不断用那双凹陷的眼睛心神不定地四下里滴溜溜打量着——上次来的也是这个和尚。

和尚每说一句话，村子里的老百姓就念一声“阿弥陀佛”，同时还用满是皴裂、皮肤粗糙的厚厚的手掌掂着念珠。

“什么都是如来佛的旨意——什么都是如来佛的旨意。不要忘记，明白吗？”

“……‘决不可怨天尤人。’——这是如来佛说的。一切都是如来佛的旨意。凡是在现世——在尘世上受苦受难的人，只有到了如来佛身旁，才能享受极乐。到了来世，就能端端正正坐在莲花上，打心里念‘南无阿弥陀佛’了。对什么事都不可怨天尤人呀。”

和尚用熟稔的腔调这么说着。这一套，庄稼人过去已经听过好多遍了。可是不管听多少遍，他们总觉得很有道理。他们就仍象头一次听到似的低下头去，反复念诵“南无阿弥陀佛”。

上了年纪的庄稼人回顾一下自己那历尽艰辛

的漫长生涯。当他们弄明白自己的确不曾怨天尤人后，就如释重负。他们曾忍受过痛苦，快要熬到下辈子了，那时就能到如来佛跟前了。老人们满脑子都是这样一些念头。他们想：尘世间的事，样样都得忍受。和尚又举出如来佛苦难修行的事例，来比喻庄稼人受苦的一生。这使庄稼人由衷地感动。

和尚讲完道之后，就在最虔诚的人家里过夜，然后挨门挨户去讲道。有老人的庄稼户，布袜子破了对付着不去添置，也要请和尚。他们认为要是不这么做，说不定“下辈子”就要遭殃了。这是比什么都可怕的事——庄稼人多年来一直被迫干活儿，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如果死后还得干活儿，可怎么得了！这一辈子，每个庄稼人都不得不过分地操劳，他们简直腻味透了。谁不想逃离这种世道呢。对庄稼人来说，这档子事比布袜子啦、黄酱啦都重要得多。尽管没有明确的概念，庄稼人心里却总怀着盼“下辈子”的念头。

和尚要来的日子，源吉妈从早晨起就在厨房里做吃的，和尚到了就端出来。

冷天一到，源吉妈就闹腰疼，脚脖子疼。多年来过度的劳累，使她的身子骨逐渐吃不消了。妈老是逼着由儿替她揉肩揉腰。和尚好象煞有其

事一般嘴里念念有词，装模作样地念着经，喳喳喳喳地捻着念珠，又用它来搓搓阿关的肩膀，碰碰腰什么的。哪一家庄稼户都是这样。尽管看上去挺壮实，一到晚上，几乎个个都腰酸肩疼，睡不着觉。因此，和尚只要一家家地兜个圈子，单这一项就能捞着不少钱。

和尚呆上两天，每户都转完之后，怀里揣上不少钱就回去了。

源吉打地里回来的时候，遇见了和尚。和尚宛如狡猾的商人一般向他寒暄了一下，但是他气鼓鼓地没有吭声。再走一会儿，就碰见了校长。

小学校长有三七八岁，总是板着面孔，不大讨人喜欢。他既是校长，又是老师兼勤杂工。教室只有一间，里边排列着二十来张桌子。一年级到六年级的男女生都在一起。教室里既挂着地图，又摆着装着博物标本的柜子（里面有一只鸟的标本）靠近角落还有一架白色键盘业已经剥落了的风琴。校长最讨厌和尚了。谁也不知道这位校长是怎样到这个村子来的。尽管他绷着脸，不招人喜欢，据说却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因而备受尊重。也有人说，他是因为在城市的小学里跟校长闹翻了才到这种地方来的。教室对面，隔着走廊就是他的房间，里面堆满了书籍。

源吉对他说：“秃瓢回去啦。”他轻蔑地撇

撇嘴说：“是吗？应该把他扔到粪坑里去。他每到村儿里来一趟，老乡们就越发变蠢，麻木不仁了。——畜生！”

庄上的庙会恰巧赶上了这一阵子好天气。

这种事儿照例是由入升^①的阿菊和丸山的主顾带头办的。他们在神社前面竖起又窄又长的大旗，上面写着“奉纳”二字，在孩子们的帮助下，凑合着搭起一座舞台。就有身穿簇新的外褂^②、单把前面的头发留长一些、抹上了油的人，骑着自行车一会儿借来幔帐，一会儿又从有车站的镇子运来形形色色的道具什么的，东拚西凑的，总算有个庙会的样子了。四五个穿新衣服的孩子一早就在张罗着的小伙子旁边玩着。神社座落在学校旁边的野地里，三面都是稀稀落落的杂木林。一到晚间，卖汽球的商人就会背着打成包的商品前来，唱法界调^③的那帮人也照例从有车站的镇子前来，在这个舞台上唱安来调^④，还跳

①日本旧式商店，常用一个图案做标记。这里的入升，原文是“合”，“入”代表“入”，“冂”代表“升”（即“升”）。

②日本旧式工匠穿的一种在领子上和背后印出姓名、店名的一种外褂。

③十九世纪末流行的一种日本民谣，唱者头戴斗笠、身穿白色裙裤，边唱边拉着四弦琴。

④二十世纪初流行的日本民歌，发源于岛根县安来町，故名。

舞什么的。

为了逛庙会，阿文和妈做了些好吃的。她们一向认为庄稼人日子过得不论多么紧，也得这么做。

源吉躺在架着柴禾烧的大炉子旁边，用脚逗由儿玩。“嘿！”由儿紧紧抱住源吉的脚，一下就给绊倒了。

由儿不服输，脚底下使足了劲，扑过来；越扑就越乖乖地一骨碌给绊倒了。

“加油！”

“见鬼！哥哥，我咬你的脚啦！”

“傻瓜。”

妈从半明半暗的厨房里嚷道：“由儿，逛庙会去吧！”

源吉用脚逗着由儿，越来越松劲儿了。这样一来，由儿快赢了，就越发鼓起了劲头。源吉回忆起去年的庙会，就在那个夜晚，自己的意中人阿芳竟不辞而别，到札幌去了。打那以来，源吉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

“呀——哥哥输啦，输啦！”

由儿终于把源吉的脚按在铺席上了。

源吉突然醒悟过来，回了他一踢；不意用力过猛，由儿吃不住劲儿，栽了个跟头，脑袋撞在堆在炉边的柴禾上。由儿可着嗓门大声嚎了起

来：“哥哥讹人！哥哥讹人！”

源吉苦笑着，用大手掌替由儿揉揉脑袋：

“好硬的瓢儿。是这儿疼吗？——你听着，我给你念咒：盼咤啡啡啡唏咳啦妙之大明神。”

源吉反复念了好几遍，使劲揉着由儿的脑袋。由儿起初还老老实实呆着，一旦知道了哥哥是在耍把戏哪，就又哇哇大哭起来。源吉一把抓住由儿的头，摇晃着：“别哭啦！”

“瞧你这么大一个人，跟小孩子家闹腾个没完！”妈嚷道。

“哥哥，给钱，给钱。”由儿这会子这么说了。“给钱就成，给钱就成。”

“去你的，小滑头——拿到钱就好了吗？”

“给钱，给钱。”由儿兴头起来，跺着脚说。“哼，阿胜家的健儿拿到了一角钱呢。石儿也一样。——喏，哥哥，给钱，给钱，给我钱呀！”

源吉这回根本没去听由儿在说什么，他在闷着头儿想心事。他回忆起，当他听说阿芳到了札幌时，说实在的，从另外一个意义上也感到了“寂寞”。他想到：由于在村子里简直无法活下去。姑娘们只好进城去当佣人或是女工，连应该干庄稼活儿的男人也出去了。村子里人越来越少了。源吉心里很不是滋味。

“给钱，钱呀！”

由儿摇起源吉的身子来了。源吉不声不响地抽冷子一闪身，由儿一下子就摔倒了。这样一来，他哭得更凶了。

“吵吧，闹吧，脓包！”妈再也憋不住了，又嚷起来。

源吉不知怎地，只觉得心里一个劲儿地直冒火。

外面有两个孩子来喊由儿。

“喂，由儿，喊你哪。”

由儿一下子止住了哭声，用袖子把脸一抹，做出一副怪不好意思的笑脸出去了。

源吉仰卧着，呆望那被烟熏得黑亮黑亮的顶棚，寻思：今晚不去了。

到了傍晚，七八个人吵吵嚷嚷地从门外走过去了。他们是从有车站的镇子来的那伙跳舞的。背着鼓鼓囊囊的深蓝色大包袱、戴着有色眼镜的男人，脸上抹着粉、颧骨高耸的瘦男人，肩上吊着三弦、也戴有色眼镜的女人，厚厚地涂着粉的十七八岁的姑娘，还有约莫三个七八岁的女孩子。四五个庄上的孩子跟在后面。

源吉躺在那里发怔。阿文对着一面后边涂的水银已经剥落的镜子，挨着他坐着。她把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一只香粉瓶倒过来朝手心上甩，然后

抹在脸上。从刚才起，源吉跟谁也没说过一句话。

“这回不知道跳什么舞？”阿文目不转睛地盯着镜子问道。

源吉兴许没听见，没有吭声。阿文并不指望得到源吉的答复。她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却全神贯注在镜子上。她没期望听到回答，所以也就不曾理会源吉的动静。

“石田家的阿录说是要唱浪花调^①哩……”阿文说。

“阿录的浪花调不知咋样？一定挺可笑的。”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妈到哪儿去了呢？——”

源吉依然净看着顶棚。他翘起二郎腿，不时心不在焉地把脚趾尖扭动一下。

“我还想去逛庙会哪，可妈怎么回事呢？——真是的。”阿文嘴里这么说，还是盯着镜子。“哥哥，去逛庙会吗？”

源吉慢条斯理地掉过头来看阿文。阿文把脸伸得几乎贴着镜子，嘴巴歪成一副怪相，拚命想挤破长在鼻子旁边的什么玩艺儿。源吉把头转过去，依旧默不作声。

①日本的一种以三弦伴奏的民间说唱歌曲，类似我国鼓词。

“真糟糕。”这回阿文又用手巾揩起脸来了。“我打算邀阿春一道去，可妈要是不在家，就出不去呵。——哥哥，去逛庙会吗？”

阿文这才把脸从镜子前边挪开，看着源吉说。他们家好久才烧一次洗澡水，阿文刚刚在后院洗过澡，脸上白净光滑了。阿文被源吉瞥了一眼，脸上就有点儿羞红，怩怩地问道：“咋办？”

源吉又掉过头去，这才象是朝别的方向说话似的，答了声：“去吧。”

阿文到后头去，换上衣服就出门去了。

“哼，畜生！”

源吉站了起来。但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做什么。他隔着窗户朝外面望了望。屋里亮，外头一团漆黑，什么也看不见。源吉到厨房去，喝了两碗凉水。他回到炉边，拿不定主意是坐下好呢，还是干什么好。他在那儿茫然伫立了片刻。四下里万籁俱寂，油灯忽而亮起来，忽而又象被刮到什么地方去了似的暗淡了。挨着后门的马棚里的马都静悄悄的，既没甩尾巴，也没用蹄子叩地。这里离逛庙会的地方相当远，所以什么也听不见。源吉略感到莫明其妙的焦躁。有人从外面走了过去，不知在说些什么，起初源吉没有听清楚。

“瞧，星星飞过去了。”

“那儿有个窟窿哩。”

“那颗星星崩得粉碎，掉下来啦。——听说有时候还轰隆一声呢。”

对方不知回答了些什么。这当儿又传来十一二岁的孩子撒娇般地噘着嘴说话的声音：“要不快点去，舞就跳完了啊。”

“哎——催啥呀！”

“妈，迟到了哩！”

听那声音，都快哭出来了。

声音越来越远，一忽儿就听不见了，又恢复了寂静。

源吉发觉连自己呼吸的声音都听得见，这种奇怪的静谧使他感到畏惧。他想坐下来。这时偶然瞥见从化妆镜下面的小抽屉里露出半截信。他心想：大概是阿芳写来的吧。

信的大意是这样：“想到我当时的景况，你渴望到札幌来，也是情有可愿。……

“此地的生活却跟我原来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为了不使你失望才那么说的，请原谅。——说实在的，象这样讨厌的日子，有我一个人过，也就尽够了。

“当然，在此地，用不着象咱们那里那样整年肮里肮脏地拚命干活。……另一方面，却有许

许多多咱们那里怎样也不会知道的‘可怕的事情’。……

“总之，要是你打定主意非来不可，我也没办法，只好等着你。……我跟老板也谈了，他说人手不够，你来正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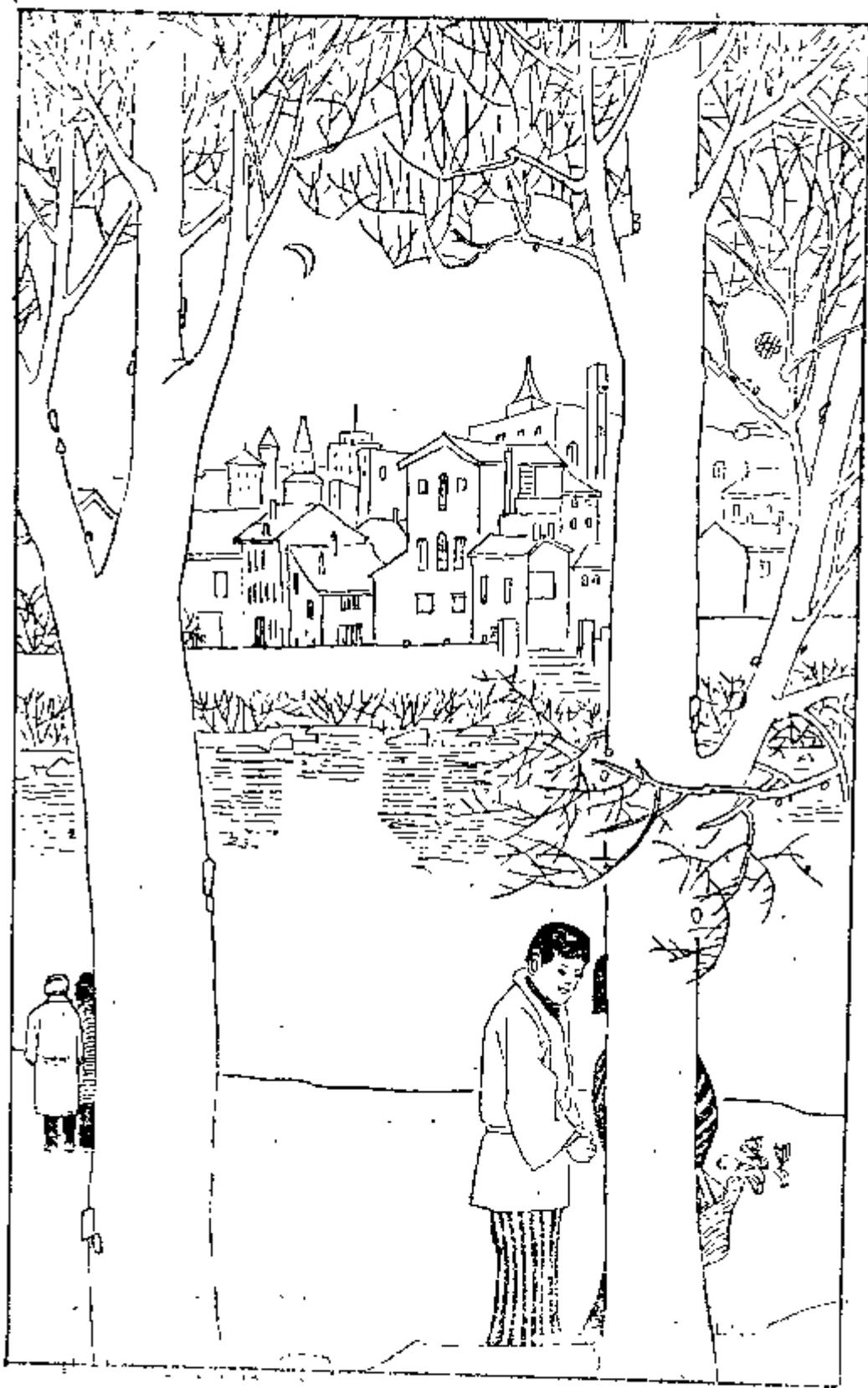
最后加上一句：“请务必向源大哥问好。”

源吉呆呆地又把它从头读了一遍。——“请务必向源大哥问好。”读罢，手里拿着信，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

妈回来了：“由儿他哥，下吗哪？去，逛逛庙会去。——俺刚才碰见阿文啦。”

源吉没有回答。他把信放回原地就出去了。妈在堂屋地上一连擤了好几把鼻涕，朝着源吉的背影说：“等散了，可把由儿带回来！”

源吉一到外边，迎面袭来一股冷气。天高气爽，繁星点点。他无心去逛庙会，但在家里也呆不住。走了一段路，左边出现了一排延续十来米的高大的树。从树与树之间可以望听见狩河的河面近在咫尺。天上虽然有星光，周围却黑得厉害，只有河面发出暗蓝色的光，清晰地衬托出跟前黧黑的树干。他定睛一看，河面上映出无数颗星星。空气凉飕飕的，他打了好几个冷战。每逢举办庙会，年轻的男男女女就都不到神社前面，却在这个堤岸上聚会。源吉想到他跟阿芳在这里



幽会过好儿回，就厌恶地朝着河畔了唾沫。

道路打了个弯，拐过去，远远的前方露出庙会的灯光。从这里也能够清清楚楚地看到灯光照亮的部分。忽然人声鼎沸，还听到在打鼓，一阵阵夹杂着汽球破裂的响声和笛音。半路上，一个老人站在自己住的农舍跟前，在看热闹。他在黑暗中向源吉打招呼道：“晚上好。”

源吉也回了一句：“晚上好！”

“逛去吗？”

“哦——”

源吉走过去后，他又说了声：“走好。”

庙会的舞台上点着十来盏灯，前面铺着粗席子。村民们坐在那儿看演出。主要是姑娘、孩子和老人。周围几乎笼罩在黑暗中，后边的道路两侧，排列着四个点着灯的卖汽球的摊子。卖棉花糖的不断用脚踩着机器，把糖裹在木筷子上，伸到孩子跟前，不知在唠叨些什么。

每个摊子前面都站着两三个孩子。神社后院有一个摔跤场，小伙子们在摔跤。源吉对什么都没兴趣。他双手叉在腰带上，离得远远地看着。舞台上有人在跳舞，一跺脚，板子就咯吱咯吱响。⁶这种跳法只不过是节奏地晃动着手脚罢了。因为离得远，脸和服装都看不出毛病，源吉觉得在灯光映照下跳得挺好看。跳舞的女人偶尔

喊道：“嗨！——嗨！”或是齐声插进一句歌：
“俺可不知道——哇！”

源吉心里烦躁起来，看了一会儿就觉得无聊了。他从汽球摊子后边走过，想穿到神社后院的摔跤场去。听到为摔跤伴奏的打鼓声。可是半路上他改了主意，又折回来，走出了神社。

四

又下起雨来了。天气渐渐变得阴暗了。寒云低垂，雨雪交加。大伙儿想，这下子冬天可真的要来了。早晨起来一看，积了水的沟里面结了一层冰。

庄稼人做好过冬的准备后，就钻进茅屋，在堂屋铺上席子，搓绳子，编草鞋。庄稼人整年弯着腰趴在地上干活儿，可还混不上吃喝。姑娘们背着豆子和其他庄稼，到有车站的镇子去卖。庄稼人种了各式各样的东西，自己也不知道是给谁种的，可是一半以上都一古脑儿给拿走了。佃户要给地主交租，自耕农要给拓殖银行^①交年息，这一项就够可以的了；此外还有肥料店和农具店的帐。庄稼人种水稻、豆类、玉米、茄子，可他们自己每天只能吃上干菜叶和白薯，别的吃不

^①经营开发土地的银行。

起。遇上吃米饭的时候，他们也舍不得净吃大米，就在米里兑上好几倍水，煮成糊糊，搀上白薯和豆子来吃。

夏天，庄稼人摘了老倭瓜就晾在房檐底下，一冬天都靠它糊口。因为天天接连吃老倭瓜，他们每个人的脸、手掌和脚就全黄了，连眼白都挂上了黄丝。

快入冬的时候，家里的老人就得补那些穿了一整年、已经破烂不堪的布袜子，打上好几个补丁，又凑合一冬。衬衣、汗衫、腰布都是这样。源吉妈从壁橱里拽出各种各样的破烂，在炉边堆积如山，把只剩下一个镜片的眼镜用线挂在耳朵上，就着灯光缝缝补补。

从秋收到入冬这段时间，好些个行商都指望从庄稼人身上赚些钱，一天几次找上门来。有时候叫花子也带着玩具一般的家什前来。然而庄稼人想到漫长的冬季眼看就要来了，连一片布也不敢轻易买。越中^①富山的卖药的也背着有许多小抽屉的桐木药箱来了。他们把药味扑鼻、画着马的广告单递给孩子们，这家人怎么说不要，他也坐在台阶上不动，然后撂下药袋就走。由儿把画着马的广告单珍藏起来，一有空就描摹。

^①日本幕府时期的地名，明治维新后改为富山县。

庄稼人好歹套上车，到有车站的镇子去，买回黄酱、酱油和旁的日用品。这程子，车站前面山货店旁边的电线杆上，拴着好几辆庄稼人的大车。多半是客马^①拉车。偶尔经过一匹儿马，那客马就嘶叫着乱扑腾。这当儿就有个醉得满脸通红的庄稼人从山货店里跑出来，把客马拉到一边去。山货店进门地方摆着两三把椅子，庄稼人把冷酒倒在喝冰水用的杯子里，撕开鱼干，就着它呷起来。

有的庄稼人在这儿喝得烂醉，嘴里嘟囔着：“不管咋醉，那家伙见了我也得发憷。”店里小伙计搀扶着这人，把他跟黄酱啦、酱油桶一道，象货物一样装上了车。被装上车后，醉汉还唱着年轻时候学会的歌儿，兴头儿正浓。马就自动地沿着来路把车拉了回去。

源吉可能是因为好久没喝酒，呷上两三碗就酩酊大醉了。他摇晃着魁梧的身子，象孩子似的比比划划地跳舞，又眯起眼睛怪声怪气地笑着，唠叨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八点来钟源吉离开山货店，走到那匹拴在店旁的马跟前，跌跌撞撞地抓住马脖子，把身子靠着它，一边抚摸马脸，一边喃喃地自言自语，身体一直晃晃悠悠的。他离开马，伫立了片刻，随后就

^①客马、儿马即母马、公马。

蹒跚地走起来。街上已经没有行人了。他把双手斜揣在怀里，象喝醉酒以后常见的那样浑身发颤，边走边兀自嘟囔着。

“不管怎么干活儿，又能干出个啥名堂来呢？脓包。”他反复说着这句话。不一会儿就来到一家屋檐低矮的小面馆跟前。源吉咕咚一声撞在面馆门口的柱子上。他干脆倚着柱子，连眼睛也不睁，问道：“是谁？畜生，是谁？”有个擦了粉的女人在里面说：“大哥，坐一会儿吧。进来喝一杯。”说罢就走出来了：“哎呀，好快活。”

源吉把自己的脸凑到那个女人的脸跟前，强睁开惺忪的醉眼，望了望女人：“这娘儿们长得满俊哩。”

“喏，进来吧，暖暖身子……”

源吉脚步蹒跚地走进了小面馆。

源吉的马套拉着长长的脖子，在山货店前面一直拴到第二天早晨。

漫长的秋夜，庄稼人把油灯放在堂屋，捶着稻草，编着草绳，回顾起自己走过来的一生。庄稼人就是这样打发秋夜的。他们低声哼小调来着，忽然不哼了，不知不觉忆起往事来了。

在内地那程子，他们只吃得起白薯。地里结

的东西不值钱，肥料和农具可贵一倍。租子欠多了，地主就扣押青苗，把地收回去。庄稼人寻思：要是到北海道去就好了。他们被迫背井离乡，满怀热望，到“有狗熊出没的”北海道来了。他们渡过津轻海峡，直奔北方。一家大小背着行李，在北海道那连月台也没有、极不象样子的露天车站上下了车，沿着漫无边际的雪道走了好几里——走到哪儿都是雪，到处都是一片平漠。风几乎连指头和脸上的皮肤都给刮掉了。等安顿下来一看，到处都插着橛子。能够弄到手的土地，连食盒的盖子那么一丁点儿也没剩下来。即便偶尔“弄到”便宜的土地，也没有本钱耕种，结果只好借款来种。过了两三年，荒地好不容易鼓捣熟了，却又抵了债，什么也捞不着——这里的日子也不好过。

“老家不知道咋样了？”

即使在北海道住上二三十年，这些庄稼人对内地也还是念念不忘。他们暗自想着，死也要死在内地的村子里，即使过去那里并没给过自己什么好处。他们时时刻刻都渴望着迟早要回老家去。他们在干活儿的间隙偶尔一开口，准会说：“老家不知道咋样了？”说也奇怪，每逢庄稼人勾起内地的回忆，总是伴随着一种特殊的魅力，把它想象成又美好又快乐的所在。豆腐店的某人怎么

啦，钩鱗^①的老金是不是还活着啦，角地的姑娘招了女婿啦，石店的老板到桦太^②去了什么的……他们把过去的自己跟这些片段回忆连结在一起，慢悠悠地谈论着。

这些庄稼人当初离开“老家”的时候，是想到北海道去大干一场，挣一大笔钱，回老家舒舒服服过日子。谁都是这么想的，源吉爹也不例外。然而没有一个庄稼人办到了这一点。闹了归齐，跟以前在内地没什么两样。可是他们完全不想弄明白这一点。说真的，他们“明明晓得”在现实生活里这终究是没有希望的，可心里的什么地方总是蒙蒙胧胧地想着要挣了钱回内地去。北海道的庄稼人都安然地这么想着。

偶尔遇到有人到内地去一个月（这是很难得的，除非是谁的家属生了急病，才兼程去探望），回乡就都聚到他家，托他给自己的亲戚捎个口信啦，带点东西什么的。还嘱咐他给打听一下村子里的情况。

据说源吉的爹妈乍一到北海道，在雪封的旷野当中走着的那次（源吉当时背在爹的背上），快进现在这个村子的时候，曾看到路旁立着一根

^①这里的钩鱗，原文是“𪛗”，“𪛗”代表钩，“△”代表鳞。

参考本书第48页注①。

^②库页岛。

木桩子。天擦黑了，木桩子在广阔无垠的野地里孤零零地立着。爹只当是路标，就在它跟前蹲下来，扒开雪，好看看还有几里路。只见上面写着：“××××死于此地，原籍越后国^①某郡某村。”爹把这事讲给妈听了，他俩顿时感到孤苦凄凉，浑身发冷。这档子事，源吉听爹妈念叨过好多次，他们还说：“不管怎样，也不愿落这么个下场呵。”

庄稼人就这样总是跟“故乡”的土地连结在一起。

农村逐渐进入了晚秋。

一到快入冬的时候，源吉妈就犯腰疼。她一边在堂屋地上搓草绳，一边叫由儿给他按摩腰背。由儿不愿意，想开溜，她就说：“给你一分钱。”由儿还不来，她又说：“那就给两分。”

由儿来到妈背后，按摩了两三下肩膀，马上就说：“拿钱来！”

“你这叫花子！”

“不是给你揉过了吗？”

“再揉一揉。”

“讹人，讹人！”

“傻瓜，妈说成了，才算数哪。”

“讹人，讹人，讹人！”

^①日本幕府时期的地名，明治维新后改为新潟县。

“旅包！”

娘儿俩认起真来了。

妈自己按摩着疼痛不已的腰，忽然说道：

“喏，源儿——今年冬天，俺想回老家去一趟哩——源儿呀。”于是神色阴郁地看了看源吉。

五

打从庙会的晚上阿文逃到札幌去了，源吉妈不免显得衰老了。干着干着活儿，她总是抽冷了念叨起阿文来，随后就自言自语地咕哝个没完。妈一提起这个碴儿，源吉就一声不响地站起身，走出房门。

那是秋天一个宁静的深夜。从房后流过去的河上，不时有鸟儿在啼叫。源吉和妈把油灯摺得低低的，在堂屋地上铺上席子，编起草鞋来。

源吉觉得好象有人在外面叫门，就尖起耳朵去听，并应了一声：“哎！”

“是我。”校长用身子扒开东倒西歪的门，进来说。“我太闷了，找你们聊聊。”

由儿没脱衣服就在炉边胡乱睡下了。油灯给拿到堂屋里去了，所以炉边暗得看不见。

“阿文呢？”校长猛孤丁地问了这么一句。

妈照例把说了多少遍的话重新讲给校长先生

听。源吉没有吱声。

“为啥不把她领回来？”

“不管俺咋说，源也不干。他不想去——兴许是害怕札幌那地方。”

“源吉，咋的？”

“不行。”源吉说。“就是领回来，她也还是会去的。”

“你听他说的。”妈带着无可奈何的神色看了看校长的脸。

于是校长谈起他在札幌时的事儿来。他是这么说的：——一旦尝到了城里的甜头，在乡下简直就再也呆不下去了。有电话，不管离得多么远，立时就能跟对方说话。有好多辆汽车，还有电车。女人什么时候都象洋娃娃似的漂漂亮亮地扑着香粉，穿起长袖子的和服走着。每天都演电影，也可以看戏，还有音乐会啦公园什么的。

——男人也打扮得跟外国电影里的人们一模一样，脚上穿着擦得锃亮的皮鞋，橐橐地走在街上。

“可了不起。”妈露出一副惊讶的样子。

“庄稼人咋样呢？”校长顿了一下。“一年到头埋在粪堆里，弄得黑不溜秋的，是男是女都分不清了。这一带的女人手上的皮呀，简直跟握布一样！起早贪黑还不算，深更半夜也得干。

——就这么着，要是能剩下一大笔钱，倒也罢了。你说呢，大娘？”校长怪笑了一声。“城里的阔人，只要在漂亮的大楼里随便做一点体面、上等的工作，就打发了一天，挣下好多钱。太不象话啦。”接着问源吉：“咋样？”

源吉没有吱声。

“敢情！”妈钦佩地说。“城里的大老爷嘛，那还用说！”

“源吉，你懂得这个道理吗？”

“……”

源吉瞥了瞥校长的脸，什么也没回答。他含上一口水，喷到稻草上，随后就用木槌敲打。校长抽着烟，沉默了半晌工夫，又象忽然想起来似的说：“哦，阿胜进了苗穗的铁道工厂，你听说了吗？”

这话一下子引起了源吉的注意：“真的吗？到底还是进了，本来就是那么回事呗。”

“阿胜家的人说：他有得苦吃哩。”

“阿胜那家伙，阿文就是他挑唆的！”妈气冲冲地说。

“喏，源吉，庄稼人一个人干活，不但能养活自己一家人，还能让地主过上奢侈透顶的日子，靠地主过活的那些家伙也是分享庄稼人给他们的恩惠，真了不起呀。只有农民和工人才能够

随意决定是不是叫人活下去。这话挺有意思吧。”

轻易不露笑脸的校长，笑逐颜开了。接着半真半假地说：“真了不起。这么说来，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农民和工人喽，哈哈哈哈哈。可是呀，源吉，就数这些农民工人穷，最脏，最让人看不起，活儿干得最多，多么荒唐呀！”

校长这个腔调把源吉引逗得不禁也笑了。妈泛出一付半懂不懂的神情。

“想到这些，就觉得挺有趣儿的。六月里地主不是把大家伙儿召集在一起，胡诌了一通吗？他说什么：“你们受穷是因为自己的罪孽，穷神是附不到勤快人身上的。你们大伙儿还点头称是呢。——可是地主无非是借此让庄稼人拚命干活儿，然后把油水都乖乖巧巧地榨光了，多有趣儿呀。怪就怪在谁都不知道自己上了地主的当，总觉得还没干够，还没干够，拚死拚活地干。地主那家伙在背后把舌头伸得老长，兴高彩烈哪！以前庄稼人也是清早四五点钟起来，一直干到晚上七八点钟；还只顾催逼着干，要是起得更早，收工更晚，象拉大车的马那样干，不出三天庄稼人就得累垮啦。哪有象庄稼人这样黑间白日不停地干活儿的呢？——什么干得不够才受穷，纯粹是胡说八道！”

“大先生，您扯到哪里去啦？”妈惊慌地

说。

“好，你们娘儿俩也多卖些力气吧。越干，地主那粮仓里的米袋就堆得越高，你们的肚子里就越没得吃的。”校长爽朗地笑道。

源吉象是被推得栽了一跤似的，尴尬地绷着脸，时面停下手里的木槌。

“我一向纳闷的是，大伙儿这么穷，为啥谁都不知道自己受穷的原因？源吉，你听着：地主编出了那么一套；和尚呢，拿了地主不少钱，就说啥都是如来佛的旨意。庄稼人本来就不明白，听了他们的，脑袋瓜儿越发成了糊涂浆子啦。顺着藤儿一摸，就啥都清楚啦。说不定太清楚了，庄稼人不知道咋办才好，反倒为难吧。”校长说到这里又笑了，喃喃地加上一句：“嗯，为难呀。怕为难……就装作不知道。”

校长看了看源吉，似乎在等待他能有所答复。可是源吉还是板着面孔，双眉紧蹙。

“哎呀呀，大先生。您这话要是给地主老爷听见了，可就闯大乱子啦。”源吉妈说。

校长沉默了片刻，把话碴儿转了。睡在炉边的由儿象是被什么惊吓了似地跳了起来，站着发呆。大家都朝他望去。

“由儿，睡糊涂了咋的！”

由儿两眼滴溜溜地瞅瞅周围，一个劲儿摇晃

着身子。他身上长了虱子。

“瞧，校长先生来了。”

山儿看到校长先生，就鞠了个躬。随后就一声不响地在炉边坐下来，膝盖顶着下巴，蜷作一团睡着了。

“给梦魇住了。”

过一会儿，校长先生搔着光头告辞了。他拉开房门，说声：“唔，好冷！”就把手揣到和服袖子里。关上门以后，听见他在房屋旁边解手的声音。

“晚上好！”有人打了声招呼，走过去了。

校长一边解手，一边照例嘎声说：“啊，晚上好！”

干完了活儿，妈把削好皮的土豆放在一口大锅里白煮。煮熟以后，捞到箩筐里，撒上盐，娘儿俩坐在炉边吃。这么一煮，香喷喷的土豆上面就“挂了一层霜”。妈盘腿坐在源吉对面，娘儿俩呼呼地吹着热腾腾的土豆，大口大口地吃着。过一会儿，妈打起盹儿来，往嘴里送土豆的手不听使唤了……那手刚一耷拉，妈又醒过来，好歹把土豆送到嘴里，可是嚼着嚼着……又顾不上咽了，含着满嘴土豆就打起瞌睡来。

添在炉子里的柴火一阵阵噼噼啪啪蹿起火星儿。这个声音使妈时而稍稍醒过来。源吉默默地

吃土豆。他好象在想什么心事，只是机械地吧嗒着嘴。

挂钟缓缓地打了四下。妈吓了一跳，这回真正清醒过来了。于是把蜷缩成一团睡着的由儿摇醒了。由儿睁开眼睛，不高兴地扭着身子。

“瞧，校长先生！”

由儿大吃一惊，朝四下里望望。

“扯谎，扯谎！——扯谎！……”由儿终于认真哭起来了。

“这小子，快点儿到外面去撒泡尿。”

由儿怎么也不肯起来，催了三四遍，才走到门边，把门拉开一道缝，伸出小鸡头，哗哗地把尿撒到外面去。

“又不肯出去。瞧你这坏毛病。——撒完尿，臊死啦！——又不是小娃娃家。你等着瞧吧，呆会儿让你哥哥狠揍你一顿！”

“外边，我害怕。又冷。”由儿带着哭声说。

“好，好，就那样撒吧！”

妈铺开三副被窝，边铺边说：“喂，源儿，校长先生准是那个——没错儿。他说的话多可怕。你可别当真听他的。嗯？”

源吉吃够了土豆，就拿起火筷子凝视着炉火，用火筷子忽而把烧成炭的柴火摆成各种样

子，忽而又扒开来，鼓捣了好一会儿。

由儿和妈睡下了。

源吉把炉边的柴火添进炉子里。他象一座烟熏火燎的青铜像一样坐在那儿，直到一炉旺火着完。灯里的煤油也光了，灯焰逐渐细微下来。

“源，还没睡哪。可惜了儿的柴火……快睡吧。”

妈醒了，从枕头上略抬起脑袋，看着这边说。源吉发觉炉火已奄奄一息，自己身上也冷起来了，他就嗯了一声，站起身来。

后窗上映出了源吉巨大的身影。他听见妈在喃喃地念诵着：“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六

漫长的冬天来到了。庄稼人必须把当年的歉收找补上。

源吉跟村里的五六个人约好，只要一下雪就进朝里山深处去打零工，剥菩提树皮。到二月底这个活儿就干完了，再到余市的渔场去打鲢鱼，然后大约在四月底回村。庄稼人差不多都是这么干的。——这样才能勉强糊口。

一连好多天，风雪交加。这些日子，庄稼人

一步也出不了屋。扒着窗户往外瞧，一片银白，什么也看不见。有时候连房子都忽悠悠悠悠直摇撼。雪好不容易住了，一开门，堆积在门口的雪一下子就坍到屋里来。

雪后的石狩平原，四外一望，一片白茫茫，越发无边无际。农舍埋在雪里，稀稀落落地只露着屋顶。平时觉得很远的邻居，如今看上去清清楚楚，显得那么近，仿佛打个招呼都能听见似的。天空上残留着暴风雪的余威，低垂的乌云密布，与银白的大地汇合在地平线上。那边一片昏黑，大雪好象下得正紧。一阵阵的风，呼啸着，扬起如烟似雾的雪花，打着旋儿从远处卷过来。旋风忽而在一个地方滴溜溜地转，一眨眼的工夫飞快地卷走了，一下子又转了向。风把雪刮到房屋拐角的地方，积起了一大堆。

寒气一重，更深夜静的时候，屋子里就会有一种嘎啦嘎啦的响声，宛如什么东西裂开了似的。年迈的庄稼人马上就觉得腰酸背痛，不能动弹了。

传来了一阵阵马铃声。那是被堵在家里断了粮的庄稼人到有车站的镇子去买东西的。清脆的铃声在仿佛凝冻了的空气里萦回了好半天，一直到走得老远还听得见。只见那雪橇在茫茫的雪原上弯弯曲曲地一溜烟疾驰而去。

雪已下了十来天，庄稼人渐渐盘算起怎么过冬来了。庄稼人见了雪，马上就转起这些念头来。即使揭不开锅了，也不能去动给地主的租粮，到镇上去买吧，钱又没了。庄稼人一见面就念叨起各自的日子，说总得想个办法才是。大伙儿都发愁，不知不觉地这些话就传开了。

阿胜爹到对岸的村子里去办事回来，见到源吉，说对岸也在议论这些事。石狩河上了冻，可以随便走到对岸去。由于交不起学费，小学生去上学的骤然减少，庄稼人说，还能花钱去让他们整天玩吗？

哪家的孩子都无精打采，有气无力地歪坐在炉边发怔。婴儿呢，肚皮象装满了沙子的口袋一样胀得鼓鼓的，一个劲儿哇哇地哭。就连还不懂事的婴儿也成天愁眉苦脸，唯独脑袋大得出奇，脖子直不起来，身子朝哪边一歪，脑袋就咕咚一下朝哪边耷拉过去。入冬以前，庄稼人在房檐底下挂起干菜；如今就拿它来熬酱汤，简直就跟清水没有两样。一连四五天——三顿饭都这么对付。此外就是老倭瓜和土豆。米饭呢，每天大概只能吃上一顿。干菜酱汤越吃越没味道，嗓子眼儿里直恶心。

庄稼人渐渐认真起来。

事情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有了眉目。源吉听

说校长先生正在背后活动呢。但是直到村里有个庄稼人被地主逼着退了租以后，大家才突然积极起来。

从河对岸来了个小伙子，说要是让他们也参加进来，就更好对付地主了。于是定了个日子，在小学校开一次会，商量怎么办。

那一天风雪交加。旋风乱刮一气，把飘下来的雪花卷得一忽儿跟地面成了平行线，一忽儿从下边倒卷上来，一忽儿又形成斜线。结果，咫尺之间一片银白，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要一离开大道，雪就一下子没到膝盖。大衣的每一道缝都钻进了雪花，手背和指尖什么的，都疼得钻心。住得远的，离小学校有小一里地。

每一个庄稼人刚进来的时候都是一身白，恰似从面口袋里钻出来的。他们把两只冻僵的手放在嘴边直哈气，胡子、眉毛、甚至眼睫毛都冻成一根根白冰碴子。没有大衣的庄稼人头上蒙着用线袖过的褂子就来了。有的穿着几十年前当兵时穿过的、已经熏得发黑的土黄色大衣，有的穿着破破烂烂的和服外套；还有穿窄袖子大衣的，什么样的都有。一进教室，因为生着洋炉子，毕竟暖和一些，眉毛、胡子上结的冰碴子就都化成水珠，顺着腮帮子往下淌。

庄稼人个个都好象刚患过感冒，脸上浮肿得

厉害，皮肤黧黑，毫无生气；有的弯腰驼背，有的身子骨倒还壮实，可就是说不上哪儿有些不匀称。有的须发乱蓬蓬的，有的脑袋都秃光了，一年到头晒太阳，简直晒成了个红葫芦；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他们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只顾谈着各自的事。也有的老农用厚实的手掌托着烟袋锅里磕出来的烟灰，兀自闷头想心思。还有朝着五六个人指手划脚的，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时间一长，屋子里就满是农民集会常有的那种说不出来的汗臭味儿。

在一个角落里，有五六个人鼓起掌来，于是在场的也跟着鼓掌。也有人一声不吭，呆呆地望着。鼓完了掌，有个姓石山的庄稼人走上了讲台。他是校长先生的亲戚，有二十五六岁，身材魁梧，眉毛浓浓的，一脸连鬓胡子茬。

“我代表大家说几句！”石山这样开了场。他口齿清楚，说话有条有理，这在庄稼人是很难得的。（当然，他也使用了一些庄稼人表示郑重的时候常用的蹩脚汉语。）他接着说：“咱们从来也没偷过懒，可是咱们过的日子，连猪狗都不如。这是为啥呢？”于是他浅鲜易懂地向大家说明，庄稼人不管怎样死命地干呀，干呀，可还是穷得什么也混不上，实际上这都是地主造成的。最后又说：“象现在这样，还给地主交租，就

意味着‘咱们自己要饿死’。此外，咱们这些种地的还受高利贷的盘剥，拓殖银行也来逼债，让咱们吃尽了苦头。饶着这样，又得上税！地里的收成，还不够买肥料和添置农具的。咱们已经被逼到这个地步，还能再闷声不响吗？所以决定把大伙儿请来，商量出一个主意。”说完就下了台。庄稼人每逢遇到没听惯的词儿，就望着石山，仔细琢磨着。石山指出了庄稼人的生活实际上有多么苦，庄稼人听了，“恍然大悟”，只觉得他把他们自己的惨状和盘托出，摆在眼前给他们看了似的。石山一下台，大家马上就嘁嘁喳喳起来。会场上到处议论着石山方才讲的那些话。石山下来的时候，听见坐在最前边的一个老农嘟嘟囔囔地说：“可了不得，他咋说这么可怕的话！”

石山下来后，紧接着又有个人走上台去。看上去只有二十一二岁，身体瘦削，留着短短的刘海。他简单干脆地说了几句，那声音意想不到地有力。大意是赞成石山的话，直截了当地提议马上全体签名，向地主“请愿”，要求减租。这个小伙子姓斋藤，是从部队复员回来的。

接着，又有那个喝得酩酊大醉的、四十来岁的庄稼人，刚一上台就比手划脚，醉眼乜斜地望着大伙儿，光说些什么“俺们……”“因此……”“就必须……”“应该……”之类的话。大伙儿

全笑了。有人嚷：“把那家伙拉下来！”“下来！”那个庄稼人在台上亮了个相，就东倒西歪地走下台来。他以前参加过跑江湖的戏班子，一喝醉就表演一番旧戏，大家都认识他。

有个年老的庄稼汉上台说了一通。从牙缝里每迸出一个字，都发出嘘嘘的声音：“刚才听了大伙儿发表的各种议论，都是些‘不忠不义’的话。你们年轻人别忘了地主老爷跟咱们这些人，就象父子一样。冒犯地主老爷，可是万万使不得的。要是把地给你抽了咋办？”这时候后边有人嚷：“老爷子，知道啦！”老头儿说罢下了台，会场上又是一片嘈杂。

直到这时为止，大家都挺齐心，会议进行得很顺利。这个老农一席话却把大伙儿弄得犹如从暗处牵出来的牛，一下子又踌躇不前了。在这方面，庄稼人就跟牛一样。

“简直他妈的混蛋！嗯，畜生！”刚才那个醉汉又跌跌撞撞地上了台。“你瞎说些啥？老糊涂虫！照你那么说，咱们这份穷日子哪天才能熬到头？”

有人说：“对，对！”也有的嚷：“下来！”“可不是嘛！”……

这时候石山又站出来了，说：“咱们该咋办，已经决定下来了。不然的话，明天就没米下锅，

咱们就只有死路一条！谁要是觉得咱们这些人简直还不如死了好，就请举起手来！”

嘈杂声安静下来了。石山挺身站了一会儿，又说：“谁也不想死，那末咱们就得活下去。咱们就按咱们的办法干！此外再没有别的路子！”

石山这种斩钉截铁的口气，又把大伙儿的情绪鼓动起来了。

石山把“斋藤方案”提出来，打算进一步讨论。他说：“谁对这档子事有意见，请举手，说一说。”

会场又活跃起来。有的骂地主，然而也有在某一点上拥护地主的，彼此乱哄哄地争论不休。还有人没头没脑地激动起来，舌头也不灵了，说话结结巴巴的。看来庄稼人尽管众口纷纭，但还是闹不清“到底该咋办”。石山就那么站在台上，一声不吭地听大家讲。他看见校长先生在尽后边靠板壁站着。接着，又发现身材魁梧的源吉抱着胳膊站在不远的窗边。人群里，有个姓片冈的，起劲地打着手势说着。以前地主小姐到这儿来玩的时候，曾经摔进石狩河里，片冈跳下去救起她，自己差点儿送了命。大部分庄稼人却呆呆地张着嘴，入神地听别人挨个儿说。

“谁还有啥想法？”石山拉开嗓门儿问。

于是又安静了一会儿。接着，有个人说：

“干脆一点儿也不给地主交租！”

可是，这个意见马上遭到大家反对。庄稼人都认为，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也不该那么干。

“那末，大伙儿的意见是减租，请愿吗？”石山问道。

下边又乱哄了一阵子。

“反对这个意见的请举手？”

谁也没有举。

“没有吗？”

稍停了一会儿。

谁也没有举手。

“那末，是同意‘斋藤方案’喽！”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似举不举地举起七八只手来。

“难道这样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庄稼人的贫困吗？”不知谁在后边粗声粗气地大喊一声。正赶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大伙儿就一齐回头看——原来是源吉。

“喏，源吉兄，你看咋办？”石山问。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把地从地主手里夺回来！”

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了。紧接着，源吉的意见根本没站住脚，却让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给顶回去了。

打那以后，源吉再也没吭声，一直那么抱着胳膊呆着。

章程先定下来了。接着就合计该怎么办。因为两三天之内，地主手下的管家就要跟往年一样上这儿来，大家就决定把情况向他讲清楚，马上和地主办交涉。这时候，又有人提出来，说跟地主谈判期间，租米该怎么办。这又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意见很难一致。而且庄稼人不可能预料到事情的一切后果再去把握十足、万无一失地干下去。于是就去征求校长的意见。校长先生认为最好是把各自的粮食一古脑儿卖给镇上的粮商，然后背水一战跟地主打交道。但是只有在两种情形下才能这么办：第一、跟地主的第一次谈判谈崩了；第二、一旦谈崩，估计地主会强行扣押粮食。校长还说，粮食要是一家家地放着，一下子就会给扣押了，而且还有可能因而破坏团结。就是为了防备这一手，也有必要采取这个办法。对庄稼人来说，不下最大的决心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但大家已经被逼得走投无路，以致把这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定妥的计划由什么人去执行，以及细节、具体办法等等，说好由三四个带头的人（校长先生也在内）定下以后马上通知大家。那天的会就散了。

庄稼人仨一群俩一伙地边议论着今天的会，

边往回走。外面风还没住，庄稼人拱着宽厚的肩膀，把脑袋缩进大衣领子往外走。

源吉正要走，刚伸胳膊穿大衣，校长的孩子跑来了，非要他进去玩不可，一把拽住他还没穿好的大衣将他拉到里屋去了。源吉没办法，只好陪他玩一会儿。源吉经常嘻嘻哈哈地跟孩子们玩，所以孩子们都喜欢他。可是他现在却丝毫没有那种招小孩爱的、无比爽朗而天真烂漫的心绪。他心中焦躁，坐立不安，应付了一番就出来了。他推开教室的门正要走出去，只见留下来的四五个人正在那里磋商呢。

“源吉兄，别走，一块儿商量商量怎么样？”有个小伙子说。

源吉嘴里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就出去了。他心想：现在哪里是搞这些名堂的时候！

源吉寻思，也难怪大家对自己所出的主议论纷纷。在他看来，庄稼人活象退缩不前的牛。明摆着的道理，也轻易说不动他们。他想道：那种没魄力、不彻底的办法顶什么用！为什么不能再前进一步呢？

源吉从小就模模胡胡地有过这种想法。当年，他爹携家带口来到北海道。那时节，到这儿来简直就跟朝死路上走没什么两样。他们在雪原

上顶风冒雪，茫然不知去向，“死里逃生”，好不容易才给自己找到间小屋，住了进去。当时，狗熊就在附近大模大样地转悠。马不断丢失，庄稼也给践踏得乱七八糟。有一回源吉爹去洗马，半路上看见狗熊在石狩河河边上逮大马哈鱼呢！吓得他失魂落魄地跑回家来。狗熊最怕火。一到夜里，因为狗熊要出来找食，庄稼人家家家户户都把火烧得旺旺的。源吉还记得小时候一到晚上就觉得狗熊在扒着窗户朝屋里偷看，吓得他直打哆嗦。——源吉爹这些人一直拚死拚活地劳动了将近二十年。

源吉听妈讲，那程子，爹经常深更半夜拉开防雨板到外头去。起初妈只当他是出去解手，可是老也不回来，有时候甚至一两个钟头也不见转来。妈逐渐感到纳闷，就问爹。爹笑笑说：“下地去啦。”此外再也没说什么。

有个晚上，妈觉得太奇怪了，就跑在后面。只见爹大踏步进了黑咕隆咚的庄稼地。当时，妈只觉得身上一哆嗦。她蹲下来，透过黑暗望过去，只见爹站在庄稼地里一动也不动。过了十分钟，二十分钟。于是又到紧挨着的自己那块地里，还是那么站了老半天。接着，又踱到离这块不远的自己另一块地里去。妈简直闷在葫芦里。

后来，妈到底还是问起那晚上的事来了。

“傻瓜！”爹笑着说。“俺呀，是心疼俺那庄稼地，真心疼，俺是怕庄稼地着凉呵！”

随后他就一本正经地说：“你呀，你要是醒了，不是也怕阿源、阿文着了凉，给他们盖被子吗？”

可是，曾几何时，他这命根子一样的庄稼地却到地主这家伙的手里去了。尤其是临死之前，爹真是满肚子牢骚，嘴里光唠叨这档子事。源吉虽然还小，可是每当听见爹念叨，就更加理解爹的心情。当年，源吉并不是盲目地抱着地主的脚，狠狠地咬住的。源吉虽然还没有逐字逐句明确地认识到“土地应该归农民所有”，可是根据爹的长期经验，他从十一二岁起就已经在这么想了。

其实，源吉也和别的农民一样，对这个问题只是懵懵懂懂的，根本谈不上考虑过。但是，那个懵懵懂懂的想法现在却由于源吉的亲身经历逐渐成形了；而把这个问题再推进一步，那就如同校长先生所说的了。这样简单而且明了的问题有的农民要经过一辈子才懂得，或者还没来得及懂得就死去了。而且是没有懂得就死去了的居多。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把地从地主手里夺回来！”——源吉说这话，并不是摆大道理；他觉

得爹的心情在促使他这么说。源吉一边走着一边想：随你们的便！我还是干我的。他打心里生那些庄稼人的气，他们既不明白这一点，自然也就不愿意干到这个地步。

七

源吉开了半截会就醉醺醺地回来了。上札幌去的阿胜来了信。

信上大意说：“札幌也下了雪，还是那么冷。我们最难熬的是冬天。早晨六点钟到工厂去。冬天的早晨六点钟，就连我们这些年轻人也冻得浑身关节痛。戴上油污、冰凉的帽子，缩着脖子，拎起饭盒就出了门。前前后后也都是这样的伙伴，无精打采地赶路。在工厂里，慢慢腾腾是不行的。从早晨六点到晚上五点，精神得象弓弦一样，绷得紧紧的。打我来了以后，已经有两个年轻工友被机器绞进去了。从滚筒里出来的人变成了一大片撮布般的肉饼。

“后来听说其中一个人的妻子只好靠卖身来养活子女。

“工厂里，大机器轰隆隆响着，刚去的一个星期左右，即使回到家，脑袋里和耳朵里还是嗡嗡地响，就象在厂子里一样。连张报纸也看不下

去。我想：照这样下去就会变成傻子了吧。

“到下午五点（现在已经天黑了），汽笛一响，就可以离开吃人的机器回家了。这时候，整个身心一点气力也没有了，累得连家也不想回，巴不得就地坐下来。我觉得，农民的生活虽然比在这样的工厂里干活儿的人还要糟糕，无聊，悲惨，可是在田野里劳动，不管多么劳累，空气还是新鲜的，就跟清水一样干净，连半点灰尘也没有。咱们一边劳动，一边还可以唱歌。中午，仰面朝天地躺在田里，望着天空发怔，也能歇个晌。可是这里怎么样呢？我想让你了解这个厂子里的情况，然而我简直不晓得该怎么说好。好比是在郊外的一个肮脏的‘大垃圾箱里’干活儿。工厂里又黑又臭，尘土飞扬，心中发闷，震耳欲聋……真是没法儿！人们干完活出来，脸上漆黑，只剩下眼珠子还有点光，就象醉汉一样晃晃悠悠的。

“当个农民，虽说穷点，身子骨倒还结实。在这儿干活的人，脸色苍白，身体孱弱，老是不停地咳嗽。我一想到这些，心里就是一片黑。近来我总是发那个老牢骚：‘在石狩河的大平原上倒还强些哩。’其实我也知道，那里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我在村儿里的时候就跟你不一样，怎么也

安不下心来。我一向认为会有不同于目前这种日子的、更好的、理想的生活。我也不知道那究竟是怎样一种生活，可老是这么想。如今我才明白，不管咱们走到哪儿，天下老鸦一般黑。是我的经历使我明白过来的。你一定要笑话我这么说。笑就笑吧，我也没法儿。可是我来到这里才开始晓得，我们大伙儿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做着什么样的事，在这个社会上担负什么任务，又得到什么样的待遇。这些事，也应该让农民们知道。这里，有人在偷偷地研究这个问题。我自从跟他们略微有过接触以来，也模模糊糊地开始懂得了一些。于是我大吃一惊。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个社会是由可怕的大骗局构成的。每明白一点，脑袋就开一点窍。

“关于这个问题，我打算改日再写信详细告诉你。你们那里过得怎么样？敬候来信。

“你妹妹也在抱怨不该到札幌来。我不愿意让你妹妹去当女招待，我打算给她找个地方去当女用人。”

源吉正在厨房喝水，从外边进来的由儿看见他就说：“哥哥，听说阿芳回来了！”

源吉留了第二杓水，刚要往嘴里送，听了这话，停下手来，“嗯？”的一声回过去。他的眼睛闪出了锐利的光。

“你问问妈就行了！”

“嗯？”源吉依然端着一杓子水，两眼恍恍惚惚的找妈。“上哪儿去啦？”

由儿朝后门走去。一开门，雪一下子就刮进来。源吉还把杓子举在嘴边，呆呆地站着。

“不在。到哪儿去了呢？”由儿回来说。

源吉好象忽然想起什么事来，嗓子眼儿里咕嘟一声，把水喝下去，就出门了。

可是还没过两分钟，他却回来了，站在堂屋，两眼惺松地凝望着。他又朝房门看看，似乎拿不定主意该怎么辨好。接着就咋了一下舌头，进里屋去。他从壁橱里拿出一件脏得发黏的棉袄，连脑袋一蒙就睡下了。躲在屋角的由儿吃惊地望着哥哥。

晚上，妈说阿芳的事儿“让人吓一跳”。这时，源吉又象平时那样沉默寡言了，一边吃饭一边悄悄地听着。

阿芳在札幌跟一个有钱的北海道大学的学生发生了关系。那个学生刚一知道阿芳怀了孕，就出了个花招，把她甩掉了。那个学生的家里是在内地有很多土地的地主。

阿芳曾经多次去找那个学生，结果那人却说：“谁知道是哪个的孩子！”这当儿，由于怀孕，在咖啡馆也呆不住了，就挺着十个月的大肚

才回了家。

实际上十天以前阿芳就“悄悄地”回来了。她爹不许她进家。对穷庄稼户来说，她只不过是个吃闲饭的累赘罢了。何况不久就又要添一口，实在开销不起，爹坚持说，家里不能收留这么个不正派的“骚货”。阿芳被踢了一脚，从里屋滚到堂屋，她瘫坐在地上，哭着央求：“给我个堆房角儿也行呵！……”

有一回，阿芳爹碰见了源吉的妈阿关，阿芳爹说：“那丫头把身子骨养得娇娇地回来了。手也小了，白白嫩嫩的，再也干不动庄稼活儿啦……真是添了个饭桶——这都是当爹妈的造了孽。”

源吉妈一边听，一边哎唷、哎唷地感叹。

阿芳爹问道：“你有啥好办法吗？”

源吉妈问他指的是什么。

他说：“那胎儿……”

源吉妈吃了一惊，说：“你呀！”

这么一来，阿芳爹慌了神，嘴里含含糊糊地说：“我简直不知道咋办好了。”双手抱着脑袋，不停地摇晃着，回去了。

妈对源吉说：“可别闹出啥事儿来才好。照这样下去，是要出乱子的呀。”

源吉既没回答，也没作任何表示。

妈又压低嗓门说：“俺仔细一打听，阿芳并

不是死乞白赖要到札幌去的。”

源吉瞅着妈的脸，问道：“嗯？”

“据说，阿芳留在家里得多一份嚼裹儿，她家又没那么多地好种，所以她在家里呆不下去了……”

“是真的吗？”

“阿芳家隔壁那个人，叫啥来着？——老石吧？——对，是老石。老石说是这么回事。”

源吉听到这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又扭过身去不说话了。

“怪可怜见的！没钱请产婆——再说挺丢人的，有钱也不能请呵！……阿芳兄弟说，她每天往札幌写信，邮递员快来了，就站在门口等着，可是一封回信也没有。”

妈慢慢吞吞地说着，她每念叨一句，源吉心里就感到一下一下地刺痛。

源吉乍一听说阿芳回来了的消息，很生气，紧紧地攥着拳头，心里骂着“混蛋”，甚至想一狠心跑出去。

可是听妈那么一讲，源吉自己也说不上是憎恨她还是怜悯她了。他可以想见面容憔悴的阿芳站在门口等候邮递员的那副样子。阿芳那疲倦的、若有所思的眼睛，总是在源吉眼前晃。还挺着个大肚子……想到这里，源吉就痛苦不堪，他

紧紧地闭上两眼，心里别提有多么烦躁了。

第二天，风传阿芳勉强喝药了。那药，开头她是死也不肯喝的。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写信，竟连一封回信也没有，考虑到今后的一切，才喝的。源吉心里很乱，只觉得象是自个儿的遭遇似的。可是他默默地忍受这痛苦的折磨，只说了句：“瞎说的吧？”

“是真的咧！”妈宛如亲眼看见了一般地说：“可怜呵！含着一包泪喝的呢。可怜见的，一喝下去，就一头扎在被窝里，偷偷儿哭起来啦。”

源吉莽莽撞撞、粗声粗气地骂了句“混蛋”，气势汹汹地从妈身边走开了。

吃晚饭的时候，源吉随口问道：“孩子打下来了么？”

妈默默地看着源吉的脸，呆一会儿才问了声：“啥？”

源吉意识到自己问得没头没脑，就红了脸，慌慌张张地说：“阿芳啊！”

“阿芳？——哦！阿芳呀！”妈懂了。“还没打下来，但愿她别把身子搞垮就好了。”

※ ※ ※

庄稼人虽说开会作了决定，可是临到跟地主以及管家打交道，步子就多少有点乱了。不知不

觉地就要打退堂鼓，心想：好歹忍忍算了。由于庄稼人过去已经习惯于长期在贫困的深渊里挣扎，说不定这样也能自自然然地把那种日子照旧熬下去吧。源吉更加沉默了，他在炉边盘腿坐着，心里嘲笑道：瞧吧！看你们搞个啥名堂出来！

住在河边的老泽由于交不起地租，眼瞅着就要被逼着退佃。过了两三天，地主的管家终于到他家来了，说是要处理他的地，等雪化了以后就得腾房。老泽给老婆孩子呜呜哭得六神无主，就去找原来一起开会的人念叨这档子事。带头的庄稼人马上就哄了起来，马上到学校碰头，象个新鲜事儿似的，又跟上次一样重新商量开了。

一个老年人说：“难道非干不可吗？”另外一些带头的庄稼人听到如今还有人这么说，非但不以为怪，反倒一起歪着脑袋沉思起来。于是大家决定：“啊，只好这么办了。”

随后又说了一些车轱辘话，决定“坚决干起来”，好不容易才散了会。

听说地主管家为今年地租的事已经进了村，住在本村的头面人物、略有积蓄的丸山家。带头的庄稼人当中年纪最轻又有股子冲劲儿的石山拿着“请愿书”就去了。这份“请愿书”是在校长先生授意下写成的，汉字多得很，措词和意思连

石山本人也看不大懂。

管家一边吃着饭一边听石山红头胀脸结结巴巴地反复说着同样的话，随后就从袖筒里掏出眼镜，用袖口一个镜片一个镜片地仔细擦着，说：

“干啥来啦？想蹲警察局吗？”

接着，他花上十来分钟把“请愿书”看了一遍，大骂：“混蛋！给我滚出去！”一下子就把“请愿书”朝石山膝头上扔回来。

“不知啥时候这些庄稼汉神气起来了。”丸山一边把指头伸进嘴里抠牙缝，一边插嘴说。

石山一听这话，说也奇怪，马上恢复了平素那股子冲劲儿，朝着丸山大喝一声：“你等着瞧吧！”

丸山皮松肉紧地说：“哎，种地的嘛，可不能那么着。地主是爹，咱们是儿，凡事忍耐着点儿，安分守己干活儿才是正经！你回去跟大伙儿这么说说。我替大家向管家老爷好好儿说说情！”

“瞎扯淡！”石山就那样走出了大门。

他走了几步，忽然发觉把帽子忘在那儿了。当时怒气冲冲地停下来，却并没回去，就撒开腿跑到等候结果的带头的人们那儿去了。

这么一来，庄稼人当中“好象终于出现了”一股子愤懑情绪，这种情绪自然而然地从带头的人们那里一个传俩、俩传仨地传开了。庄稼人尽

管谁也没说什么，可是也有的为了听听结果，特地跑到石山家来。平时不爱言语的庄稼人，也愤怒地说上那么一两句儿就回去了。

已经冰封雪冻，到了源吉他们进山的时候，可是这档子事不了结是脱不开身的。而且现在群情激昂，谁也顾不上这些了。尤其是有些年轻的庄稼人，聚在石山家里，听大家讲这个讲那个，就开始掌握了理论根据，懂得了“地主不讲理”。那些起初还觉得“未必吧”而犹犹豫豫的人们也大骂起“坏蛋”来了。等人聚多了，校长先生就打着手势，摇头晃脑地给大家讲起“佐仓宗五郎^①”、“茂左卫门^②上磔刑”之类急公好义的故事来。他的话深深打动了身体象岩石一样壮实的庄稼人的心。接着，校长先生半开玩笑似地说：“哪怕一个也好，要是能从什么地方出个‘北海道的宗五郎’，倒也不错哇。”淳朴的庄稼人一本正经地沉思起来了。

大家明白了，跟管家交涉，反正也是白搭。再加上管家那付傲慢的态度激怒了大家，于是一个个鼓起劲头，决定立即去跟地主谈判。校长先

①佐仓宗五郎（1604—1645），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里正，因带头为贫苦农民向幕府请愿，而被处磔刑。

②杉木茂左卫门（？—1682），日本江户时代前期的农民，因代表苦于苛捐杂税的贫苦乡亲，准备向幕府请愿，而被处磔刑。

生表示希望出现“北海道的宗五郎”，提得很及时，竟有三个庄稼人主动承担这项重任。

于是，另加上两个带头的，总共五个人，动身到坐落在有车站的镇子上的地主家去了。然后，留下来那个带头的就跟两三个庄稼人到村子里挨家挨户串连，讲明到目前为止的情况，让大家紧密团结起来，一道跟地主拚，一个人也不许出卖大伙儿。

老婆婆只要一见到他们，就把他们拉住，向他们倒陈年老辈的苦水，并且央求说，对“地主老爷”，手下可要留点情。在另外一个人家，他们劈头盖脸地给嚷了一通：“别叫俺家的儿子参加那些会，告诉他马上回家来！简直不学好！”在这种地方，怎么说也没用。也有人对大家做的事抱着怀疑的态度，说：“另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还有人说：“要是失败了，就吃不上饭啦。”

他们当中有个人到了相好的姑娘家里，当着姑娘的面，被骂道：“二流子！”弄得他灰溜溜的。也有相反的情况，另一个人到了这样一位姑娘的家，就借这个碴儿在台阶上一坐，闲扯了半天其他的话，别提多高兴了。——总之，回到石山家来的时候，大家都弄得筋疲力竭。

到地主家去的人，连台阶都没坐一下就象轰

野狗一样被赶了出来。

大家走出来的时候，地主恨不得用大棍子揍他们一顿，跟在后面骂道：“这些混蛋，老子象串糖葫芦似的，把你们都串起来交警察局！——让你们尝尝挨饿的滋味！我带着官儿，把你们的家当一个个全他妈的没收！”

五个人把这经过诉说给大家听的时候，激动得满眶眼泪。

带头的庄稼人和校长先生商量了一番，决定及早把情况告诉村里的老乡，等群情极度激昂起来，就势如破竹地去干——这叫“趁热打铁”。同时，要紧的是让校长先生马上到镇上去交涉卖粮。

“团结！团结起来！一个不剩地团结在一起！”两三个庄稼人用从校长先生那里听来的“团结”这个字眼高呼着。

八

那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本村和对岸的庄稼人就把杂粮装在雪橇上了。

源吉把冻僵了的手放在嘴边哈着气，从马棚里拉出套着皮鞭具的马。马甩着尾巴走了出来。它轻轻地拍打着身子，皮鞭具沙沙作响；大概是

因为冷，刚一走到外面，就三番五次往回缩，马蹄在地板上哒哒哒地蹭着。源吉拽了拽马嚼子。马光把长长的脸往前伸，身子却一个劲儿向后退，卷起舌头嘶嘶叫。地板咯嗒咯嗒响着。

源吉把马套在雪橇上，准备就绪后，进屋去等大伙儿。妈一面用手背揩拭那烂了的眼边儿、挂了血丝的眼睛，一面在厨房收拾饭后的碗筷。由儿站在炉旁，隔着敞开的门往外边看。

源吉一进去，妈就用快要哭出来的声音说：“俺寻思，这种事儿可别去干啦。”

自从决定下来之后，妈每天一有机会就念叨这句话。不论重复过多少遍，她还是当作新鲜事儿似的说：“顶撞地主老爷，干这样可怕的勾当，没啥好下场！”

几年——甚至几十年来，不论发生了多么大的事，不管名符其实地出了“什么事”，老农们也只是认为“没法子”。

因此，他们连想也不会想到要去干这种无法无天的事。

源吉却并没有跟他妈顶嘴，也没做什么不顺她心意的事。他只是闷声不响。自从这档子事发生以来，源吉的话比平时还要少多了。妈明白，只要源吉沉闷得厉害，准没有好事儿。干什么大名堂以前，源吉就象铁块儿似的默不作声。妈老

是想：要是别这么做就好啦。因此，她又照例唠叨起来：“从前就没有过这种花样，真要干出可怕的事来呀。”

源吉在台阶上坐下来，烦躁地使劲搔脑袋。

源吉他妈接着说：“不会有啥好下场的。”

由儿冲着火叉开腿，瞅着妈和哥哥。他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准不会有啥好下场的。”源吉他妈抽搭着鼻涕说。“真会闹得混不上饭吃啦。”随后就断断续续地嘟囔道：“源儿，可别太冲到前边去啊，嗯？”

源吉盯着老妈妈的背影。满是污垢的乱蓬蓬的斑白头发下，露出皮囊松泡泡的、干巴巴的脖子。背完全驼了，腰也弯了，扎着一根细绳子来代替腰带。整个身子看上去仿佛只有拳头那么大。源吉好象刚刚发现似的，想道：“可真老了啊！”

源吉对这次的事并不主动。相反地，他甚至想，结果搞成这样极不彻底的局面，瞧着吧。

过一会儿，从远处传来了马拉雪橇的铃铛声。

“喏，哥哥。”由儿尖起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说。

源吉挺吃力似地抬起腰来往门外走去。

他妈叹了口气，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她直直腰，往外边望，朝着源吉的背影说：“可小心点儿呵。”

源吉回头瞥了他妈一眼，就带上门出去了。

听到了源吉拉缰绳时噜噜噜地吆喝马的声音。他跟后来的伙伴们谈着话。疾驰而来的马挺立起来，高高地昂着脖子嘶叫。陆续听到了铃声，好象停下了十二三辆雪橇。由儿巴着窗户往外看，逐一告诉妈来了几辆雪橇，都有哪些人。外面越来越热闹了。马嘶声，铃铛声，庄稼人呼喊般地跟前前后的伙伴们聊着，这些声音汇合在一起，回荡着。由儿高兴得把脸紧紧地贴在窗户上，拚命望着外面。他妈自言自语地说什么“天打雷劈的”，“真是二流子”。她没有到外面去看。

不久，雪橇一齐出发了。在冷得好象空气都冻僵了似的寒空上响彻着清脆的铃声，听上去让人浑身打哆嗦。庄稼人呵叱马以及用皮鞭啪啪抽打的声音，还有马嘶声，听上去仿佛立即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了不起的大事似的。好几辆雪橇过去了，有人朝源吉家打招呼。源吉妈这才打开门到外面去。这时人已经快走光了，铃木家的阿石望着她说：“喂，老大娘，俺们走啦！”

只见辽阔无垠的雪原上，好几辆雪橇排成一

字长蛇阵，沿着蜿蜒曲折的道路雄赳赳地疾驰而去。从远处传来了雪橇上那悦耳的铃声。有时呼呼地迸起雪花。一会儿后面的雪橇把前面的挡住了，一会儿道路朝相反的方向拐去，前面的雪橇又出现了，小得跟玩具一样。那个行列活象是一根忽长忽短、忽直忽弯的黑线，清晰地浮现在雪原上。叮玲玲的铃声时远时近地传来。老妈妈象是失了魂似的呆呆地伫立在那里，凝望着。她忽然清醒过来，就念诵了几声“南无阿弥陀佛”。

已经约好，带头的庄稼人将在有车站的镇子上等候大伙儿。漫长的雪道越来越细，尽头就是一排防雪林。从这里可以看到好几根电杆象铅笔一样竖立着。炊烟缭绕，细得犹如香烟。快到了。

“咋样？挺威风吧？”源吉前面的老房回过头来问。“会顺当不？”

源吉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

不论哪一匹马。嘴啦，套着轭具的地方啦，都噗噗地淌着肥皂沫般的汗水。它们把舌头吐得长长的，张大了鼻孔，瘦骨嶙嶙的腿象柴火棍儿似地挪动着。庄稼人没把它们喂饱。源吉的马已经筋疲力竭，只要一下子把脚往雪道里踩深一些，好象就会有气无力地栽下去。源吉心里想，过不上多久就得把马处理掉了，譬如卖给人家什

么的。

在光天化日之下，十二三辆雪橇穿过覆雪的旷野，一齐响着铃铛，前前后后互相呼应着，竭尽全力，堂而皇之地、飞快地跑啊跑啊。说也奇怪，本来眼光短浅的庄稼人，越来越豁出去了，不管是对付什么人，出什么事，都不怕了。连年近半百、平时挺老实的老房都大声对源吉说：“地主那家伙，要是出什么坏主意，咱大伙儿就围上去把他狠揍一顿！”

虽然心照不宣，这股子劲头已经使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了。要是有什么家伙跑到他们跟前来捣乱，不管那是谁，说不定他们也会一下子把他干掉——就象一支骑兵的队伍闯进敌人的阵营当中去，纵马横冲直撞一样。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

穿过防雪林，就是铁轨的道岔。

走在最前面的庄稼人一面拽住昂首摇鬃的马的缰绳，把身子使劲往后挺，一面向扳道夫打听火车几时来。

“好家伙，这么多！咋回事？火车还来不了哪，过去吧。”面熟的扳道夫拿着一面卷在杆儿上的白旗，走了出来。

“那末就过啦！”

刚刚停下来的雪橇又一辆挨一辆地向前移

功。越过道岔，沿着铁轨旁的路走了七八百米，就到了镇上。从前面一个传一个地捎来了这样一句叮嘱：“喏，可要拧成一股劲儿干呀！”

庄稼人看见，镇口站着七八个人。看不大清楚，走在最前面的就大声吆喝，还摆摆帽子打招呼。镇口那七八个人似乎在朝这边望着，也许没理会庄稼人朝他们打的招呼，看来什么表示也没有。

过一会儿，那些人好象一齐朝这边跑过来了。领先的两三个庄稼人不约而同地哎呀了一声。于是猛地刹住了马。后面的马吃不住劲儿，前腿碰在前面的雪橇上。后面的人问：“咋回事呀？咋回事呀？”坐在雪橇上的人们向前栽倒了，有的纵身跳到雪堆上，朝着前边嚷道：“哎哟哟！”

“糟了，警察来啦！”

“哦！”

大伙儿吃了一惊，刹那间一声不响，呆若木鸡地伫立在那里，朝前方看。——没错儿，是警察！

警察怎么会来的呢？庄稼人不习惯于跟警察打交道，他们真正地害怕起来。十三个庄稼人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就乖乖地由警察在两旁押着，扭送到派出所去了。那些带头的庄稼人已经

被押送到那里了。坐在椅子上的地主一看见大伙儿进来，就放开嗓门大笑起来。庄稼人被关在派出所后边的小屋子里，一直关到当天晚上，冻得浑身发抖。有三个警察在场，所以彼此连话都不能讲。时而从外面传来好几匹马的嘶叫声和用蹄子刨地的声音。大伙儿把两臂深深地斜插在怀里，缩着脖儿；怕脚趾尖冻得失去知觉，就象鹭鸶似的轮流用一条腿站着，另一条腿紧紧贴在这条腿上。

庄稼人一个个被叫出去受审讯。隔着门清清楚楚地听得见啪啪地打耳光的声音，以及魁梧的身子被推倒后直接撞在什么东西上所发出的钝重的声音。还有低低的呻吟和老鼠被踩着时发出的那样的尖叫声。每逢听到这些声音，大伙儿就不由得屏住气，但是他们唯有相互交换个不安的眼神而已。门粗暴地打开后，给折磨得站都站不稳的庄稼人，象是被推了一把似的跌跌撞撞地进来了。

有的庄稼人满脸淌着鼻血，宛如被火车轧死的人又站起来了一般；也有整个面部青肿，翻着白眼儿的；还有的进来时，嘴巴直抽筋。大伙儿一方面挺直了身子，一方面反而怀着极为茫然的心情等着轮到下一个。

源吉觉得他是突如其来地在脸上挨了一拳。

他感到自己的身子转瞬之间象皮球一样地缩小了。

“是你这家伙煽动大家的吧！”

源吉不由自主地用双手捂住了脸。接着又是一拳。鼻子痛得刺骨，只觉得象是嗅到了烈性药水……一屁股坐在地下了。他头昏眼花，双手扶着地板，支撑着自己的身子，温吞吞的鼻血滴落到手背上。

“想不到这帮家伙都这么顽固！乡巴佬还敢这么狂……”

站在一旁的警察边说边用插在腰上的未出鞘的短剑，将源吉乱揍一顿。于是其他两三个警察也凑过来，连踩带踢。——源吉神志都有些恍惚了。警察稍微松弛了一下，问道：“怎么样？”

源吉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眼皮耷拉下来，眼睛几乎睁不开了。整个脸上都仿佛涂上了什么粘土，用手按上去发木，好象是在抓旁的东西似的。

“你得招认是你煽动大家的！”

他觉得警察这句话也是从隔得远远的什么地方传来的。

“块头倒不小，这家伙！”

话音未落，源吉的身体就腾空而起。“唉！”——警察在运气。源吉被摔在地下，哼了一声。

他感到肺急剧地缩小，气闷得难受。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一个劲儿地往地板底下沉……接着就失去了知觉。

庄稼人在派出所蹲了三天，到了那天傍晚，放了十二三个人，他们就出来了。带头的庄稼人还留在里面，要被押送到札幌去。

马匹系在派出所拐角的地方，雪橇里业已空空如也。大伙儿弓着背坐上去就出发了。挨揍的地方给寒风一吹，火辣辣地痛。正刮着的暴风雪，一到镇郊就施展出淫威了。大伙儿在大衣外面披上席子或草帘，尽量蜷起身子。在黄昏时分越来越凛冽的严寒之中，雪橇一辆接着一辆，响着铃铛，无精打采地回去了。谁都没吱声，连彼此的脸都没看上一眼，也根本无心去看。

走过道岔，前方给暴风雪刮得茫茫一片，挡住了视线，仿佛拉上了一块巨大的白幕。黑暗从东边一点点地逼过来。平原里那唯一的道路早已看不见了。从防雪林旁边经过的时候，劲风卷着雪片刮上去，那里发出凄厉的呜呜声。天地苍茫，朦朦胧胧地可以看到或浓或淡的防雪林，枝梢和树身都朝着同一个方向摇啊晃的。来到一无遮拦的平原上之后，唯有源吉的雪橇远远地落在最后面。源吉却仿佛连这一点都没理会。

他气得咬牙切齿。可恨哪！真是可气！恨

啊，恨得不得了。他这才第一次明白自己这些“庄稼人”究竟是什么。他想：那帮混蛋！我就是死了，也得……他明白了谁是自己的敌人。是敌人！就算是把他们咬碎，用斧头将他们开了瓢儿，用镰刀在他们脸上乱戳一气，也解不了恨。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样的敌人，也看清了他们跟警察这帮人勾结在一起的骗局！唔，可恨哪！混帐地主！源吉狠狠地咬着牙齿：“等着瞧吧！”

雪忽而从正面刮过来，忽而又从左面、或是从后面刮来。马浑身都白了，蹶起象老农那样骨瘦如柴的屁股，挪动着脚步。尾巴有时啪啪地打在身上，有时又顺着风甩过去；复盖着白雪的鬃毛也随风摇曳。由于暴风雪的关系，只能看见两三辆走在头里的雪橇；再前面的，一会儿出现，眼看着又消失了。铃声也随着风向的转变，时而完全听不见，时而又意想不到地听得格外真切，仿佛近在咫尺。整个平原骇人地呜呜叫着，说不上是打哪儿发出来的声音。天色越来越黑了。

“等着瞧吧！”

严寒隔着草帘子袭来，穿透下面的外套、衣服、衬衫，直接刺进皮肤。巴在外套上的粉末般的雪，闪闪发光，凝成一个个小小的结晶体。手指尖和脚趾头冷得发痛。鼻孔辣辣的，不论嘴、耳朵还是鼻子都冻僵了，只要稍微动弹一下，就

刺痛得象是要裂开来一般，简直受不了。大伙儿的雪橇来到了杂木林绵亘的地方。那树林子沿着石狩河的河边。庄稼人这才知道他们没有迷路。有时从镇上回来，半路遇到暴风雪，走迷了路，差点儿送了命，第二天早晨才发现走的是完全相反的方向。因为到处都一样平坦，摸不清方向。

杂木林发出就象是有人故意装出来的尖叫声，颤悠着。声音一停，就听出风夹带着雪，怒吼着，朝着平原中央席卷而去。紧接着，更强烈的风袭来了。走在源吉前面的那辆雪橇旁边，暴风雪象龙卷风那样形成了可怕的、大理石般的圆筒形大漩涡，一眨眼就跟另一个方向刮来的烈风汇合在一起，越过雪橇而去。那个庄稼人披着的草帘子一下子就给刮得腾空而去。狂风恣意地越刮越猛。

“等着瞧吧，混蛋！”

源吉的心犹如暴风雪般翻腾个没完。

源吉朝前面望去。看到在雪橇上蜷缩作一团的、犹如一个个包袱似的庄稼人，他觉得从这里就看出了他们的全部生活。他看得很清楚，这些日子过得象蚂蚁、喽蛄一样悲惨的庄稼人，过去并不了解螳螂般的敌人，也不想去了解。可是如今，就连他们也明白了谁是敌人，敌人都是什么样的畜生了吧。被打趴下去的这些善良的庄稼

人，还能咬咬牙再一次——这一次可要拿起镰刀和镐头——站起来吗？还能朝着敌人的脑袋瓜儿狠狠地砍进一镐头吗？

源吉想道：不行，不行，兴许不行吧。可是，哎！多么气人！“等着瞧吧！”源吉咯吱咯吱咬着牙齿。他象是喝醉了酒一般，懵懵懂懂的。

九

回到村里以后，源吉躺了两天。

村子宛如这儿那儿丢在雪里的垃圾箱，显得那样怯弱而疲倦。这场飞来横祸使大伙儿都发呆了。源吉心情激动得躺也躺不住。他妈把饭端到他枕边来，照例唧唧囔囔地诉一通苦，然后象是忽然想起来似地说：“阿芳来过哩。”

“那种玩艺儿，就欠接死她！”源吉连脸都没转过来，粗暴地说。

“她好象有啥话要跟你说哩。憔悴得厉害，脸上青肿，站都站不稳啦。”

“谁叫她巴结有钱的白面书生的……”

“她到这里来说会子话，简直都得用手扶着门支撑着身子……”

于是，他妈断断续续讲起阿芳的事儿来。

阿芳并没有完全死心，还指望大学生会来信呢。她有时梦见信寄到了，不由得喊了一声，把自己吵醒了。等信的心情却逐渐不同于过去了。以前呢，首先还是想念那个男人，所以才等他的信。可她一旦知道了那个人怎样也不肯回信，就开始为婴儿——为那个不管怎样吃药、念咒也打不掉，非要生下来不可的婴儿而盼信了。

阿芳临月还拚命干活儿。开始阵痛了，就跑到堆房去，象大虾米似的蜷起身子哼哼。因为有一次她在屋子里时突然阵痛了，她按着肚子扒在那里哼哼，嫂子就骂她：“丢人现眼的！”有时正干着活儿，就开始发晕，只觉得房子歪了，忽拉一下吊到半空中，简直是天旋地转。阿芳替一家人准备饭，做熟，摆好，自己就一动不动地坐在角落里。等大伙儿吃完，如果有剩的，就悄悄地打扫几口。

那是个寒冷的日子。正在干活儿的阿芳停下手来呆呆地想心事。这时候嫂子从外而拎进满满一桶水来。十冬腊月去打水，是件苦差事。嫂子一进门，看见阿芳在发怔，就抽冷子往她身上浇了一杓水：“呸！吃闲饭的浪货！”

“你干啥！”阿芳气冲冲地转过身来。

“浑身软古囊囊的，还能干啥活儿？饭桶！”

……源吉听他妈谈着阿芳诉说的那些话，反

而怀上了一股子仇恨，想道：这还是轻的呢！他一向对阿芳的那番情意一古脑儿都消失了。

“找我干啥？”

“她问你啥时候回来。俺说不知道，她啥也没说就回去了。”

源吉一个劲儿地想：得先把阿芳干掉！他感到脸上还是又肿又痛，不象是自己的脸了。她不折不扣是个叛徒，偏偏把自己的身子卖给自己的敌人啦！得把那个淫妇赤条条地倒挂起来，把她当根麦芽糖那样拧死。首先干掉她！

过了两三天。

村里流传说，由于发生了这次的事件，地主要退平素不听话的庄稼人的佃。看来管家在到处散布这个消息。庄稼人一度给狠狠地揍趴下去，惊魂未定，弄得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要是再给收了佃，那可就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了。按说是应该团结起来，对抗地主。可是带头的庄稼人已经给押起来了，又遭到了残酷的打击，乡亲们完全束手无策了。

阿芳在半明半暗的屋子里洗碗。家里的人都出去了，有的到镇上，有的到邻居家守灵去了。

阿芳在回味她爹临出门时说过的这句话：“去守夜嘞，大伙儿净议论你，弄得俺没脸见人。”

“唔，好疼！”阿芳不由得屏住气，绷紧着脸，撇撇嘴。她一想到又疼起来了，心情就沮丧起来。她把洗的碗放下，强忍着，扶住厨房的一角，弯着腰直哼哼。每逢一阵阵地作痛，她就感到头晕目眩，黏糊糊的汗顺着额头淌下来。阿芳用胳膊托住前额呆了一会儿。疼痛完全没有要消减的样子，而且一阵比一阵加剧。

“啊——嗯，嗯——嗯。”阿芳下半身已经麻木了，不由自主地坐了下来。她清清楚楚地觉出胎儿在肚子里蠕动着。刹那间，她有了预感。她惊慌得象个瘫子似的拚命满厨房爬。由于痛得厉害，黑眼珠儿直瞪瞪的，她连自己身边的东西都看不清。

“啊，好疼——嗯——啊，好疼。”阿芳咯吱咯吱直咬牙，就象痉挛似的。她从厨房爬到紧挨着的堆房去。

堆房里漆黑一团。一堆堆稻草的甜酸甜酸的气味，上豆和豆子的味儿，和那象是腐烂了的腌萝卜和腌鲱鱼所发出的一股子茅房般的臭味儿混在一起，阿芳真想呕吐，恍惚觉得老鼠窸窣窸窣地从她身边跑过去。阿芳就象被丢在那儿的毛毛虫，蜷起身子，等着把疼痛挨过去。过去的好多事儿走马灯般匆匆地在她的脑海里转。……

不久，阿芳的哥哥嫂子打着灯笼沿着夜晚的

雪道从镇上回来了。房门半开着，家里一个人也没有。他们知道爹到人家守灵去了。按说阿芳是在家里的。嫂子咋了一下舌头，露出“真叫人没办法”的神色。九点来钟，爹回来了，问道：“阿芳咋啦？”

“俺们七点来钟回来，她就不在了。”

“七点来钟……”

三个人都感到不安起来，就在家里到处找。还点上灯笼，一道到茅房去找，也查看了马棚。都没有。由于冷，又因为有一种不寻常的预感，嫂子的牙齿直打战，紧紧跟在另外两个人后边。

除了堆房以外，其他地方都找遍了，因此打开堆房的门时，三个人不禁感到毛骨悚然。他们把灯笼伸过去，往地下照了照，光圈落在地板上。没有。那里堆着腌菜桶啦稻草什么的。

“再往里一点吧？”

爹这么说着，刚一走进堆房，就一头撞上了吊在那里的什么沉甸甸、软乎乎的东西。

“哎呀！”他一句话也没说，活象是猛孤丁挨了一记耳光一般呆立在那里。因为只顾把灯笼往地下照，上半截空间就看不清了。三个人挤作一团，就象是被别人猛力推了一把似的，蹒跚地退到门外去。

哥哥和嫂子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隔壁去，又

托那家人去通知别的乡亲。过一会儿，就聚集了十二三个村民。

源吉也来了。大伙儿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点上了好多灯笼，走进了堆房。

阿芳是在离门口不远的地方上吊的。可能是由于她爸刚才撞着了一下，悬挂着的沉重身子在空中沿着垂直线缓慢地画着看不见的弧线，一左一右地摇来摆去。

庄稼人都捂着嘴，只把灯笼伸过去看着，由于尸体微微晃动，引起了他们的恐惧。阿芳的脸上发紫，完全脱了象，身上沾着好多稻草末儿。

后来在家里找到了两封大概早就准备好的遗书。一封是写给她爹妈的，另一封是写给源吉的。想不到再也找不到第三封了。阿芳没给跟她发生过关系的那个大学生留下信。听到这个消息时，源吉感到心上一阵发紧。

信上写道：“我对财主怀着满腔憎恨而死。……我有时曾想过，我活着不对这帮财主报够了仇，就死不瞑目啊。我认为自己想得很对。然而我是个女人（仅仅这一点倒还没什么），又是女人当中最下贱的叛徒。看来我是报不了仇啦。我要是跟你在一起，该有多么幸福啊——事到如今，我悔恨自己为人卑鄙，做错了事。……”最后一句是：“我朝着札幌那个大学生啐口唾沫

再咽这口气。”

阿芳也跟我们是一样的。受骗上当的毫无例外地都是我们！——源吉想到这里，只觉得浑身激动不已。

十

源吉终于打定主意要动手干了。警察的事件和阿芳吊死的这档子事，使他这个念头比过去更坚定了。尽管警察的严刑拷打把庄稼人吓得发抖，另一方面他们却从骨子里看穿了警察是在怎样折磨他们。这是一点也不含糊的。如果能有个意志坚强的人不容分说地不断鼓动庄稼人的情绪，他们就可能再一次——而且比以前更顽强地挺身而出；因为庄稼人在他们的命根子——土地的问题上，如今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现在带头的庄稼人不在，起初源吉想自己揽下来干。要是干得顺利，该有多么了不起呵。他想：那样一来，我才不会做得那么不得法，那么不彻底呢。自从发生上次那件事以来，他就打定了主意：放火烧掉地主的房子，把那些吸别人的血喂肥了的虱子般的家伙——不，就是“地地道道的虱子”——活活地打死！

然而源吉等不及把局面开展到这个地步。他

明知道那样比自己一个人干会更有效果。然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源吉觉得连那样做也是不痛不痒。严格说来，源吉并不去想将来会怎样。连他自己要干的事，甚至于干得成干不成都不知道，他就准备去干。上次偷偷儿去打大马哈鱼也是这样，大伙儿两三个月都吃不上鱼，正饿得够呛，源吉不管三七二十一，就痛痛快快地自己把鱼打来了。“爹和阿芳的遗言，还有我的主意——我就凭这三点来干。”

另一方面，源吉并不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徒劳的。他甚至想象到：自己毅然决然做出的事，一定会给呆在黑暗中迟钝得象牛一般的庄稼人一个震动，这就开了个头。大伙儿就会很快地把劲儿拧成一股绳，“干呀！干呀！”地喊着，拿起镐头和镰刀站起来。那样一来，说不定咱们庄稼人就能干脆把土地完全夺回到自己手里。可是，多么可恨哪！源吉边抚摸那还有些肿、隐隐作痛的脸颊和身子，边喊道：“畜生，等着瞧吧！”

当天晚上，源吉把装水果糖那么大的洋铁罐里装上煤油，用破棉垫子一包，就出去了。他对妈说，要到石田家去商量进朝里山去剥菩提树皮和开春打鲑鱼的事。那是个漆黑的夜晚，天上连颗星星都没有。雪道冻得硬邦邦的。源吉浑身不禁微微发颤，上牙床一下子就不由自主地咯吱咯

吱磕着下牙床了。源吉急匆匆地赶路。他走得怪不耐烦的，心里焦躁不堪，就终于小跑起来。凝冻的空气分成两股向后边流去。他来到空旷的地方。不知什么时候，他已恢复了平时的速度。回头一看，黑魆魆的平原上，几点稀疏的灯光微微地闪烁着，好象马上就要熄灭似的。源吉突然若有所思似地撒腿就跑。呼吸急促，冷气直冲鼻孔。过一会儿，他又走起来了。

在夜路上，他没有遇见任何人。

遥远的前方，暗得犹如拉上了一块黑幕，影影绰绰地可以看到有车站的镇子上的电灯光。走到这里，源吉忽然站住了，他感到精神振奋，象是要猛地对抗什么似的。

进了镇子，源吉谨慎地避开大街，专挑僻静的小巷子走。路上已没有行人，家家户户几乎都熄了灯。源吉小心翼翼地沿着积雪堆成马背似的、狭窄而凸凹不平的路走去。有时咯嗒一声门拉开了，在座落于平原中的、万籁俱寂的街上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巨大回音。

源吉好几回给这种声音吓了一跳。

有人大声喊叫着，慌慌张张地跑过大街。两三户人家的大门咯嗒咯嗒拉开了。

邻居们用手按着棉袍的前襟，互相打听着：

“啥呀？”突然间，街上一片嘈杂，有两三个人一边喊着：“着火啦！着火啦！”一边直奔向车站。

站在街上的居民们一齐朝那边望去。黑暗的天空略微透出些亮光。一眨眼的工夫，喷起了一丈高的火柱，还传来了噼噼啪啪着火的声音。转瞬之间，全镇的房屋和树木，半边都被摇曳的火光映照得红彤彤的，轮廓鲜明。从街上跑过去的人们那一张张紧张的脸，就象泼上了红墨水一般。

全镇的人都从家里跑出来了。妇女和孩子牙齿咯吱咯吱直打战，肩挨着肩，站在那里望。

“是哪儿呀？”

“唔——车站吧。”

“车站的话，方向不对啊。还要靠右边一点儿呢。”

“哪儿呢？”那个人向住在对门的人问道。

“是地主吧？”

“兴许是的……”

“哎哎。”

他们问了问正在跑去的人。那个人边大声嚷着：“地主，地主！”边跑去了。

“地主的话，就别去管他啦。”有人悄声说。

“现世现报。”



“可不是嘛。”

“……是放火吧！”有人情不自禁地大声说。

人们沉默了片刻。

“哎呀，可要闹大啦。”

报火警的吊钟突如其来地在大家的头顶上发出破裂了似的报警^①的声音。空中的回音阴森可怖，人们不由得脊梁发凉。

地主家和车站之间有一段距离。那一带热得发焦，边烧边发出耀眼的白光，连消防人员和站着观看的人们脸上每一条皱纹、每一根胡子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每逢火车开进车站，就长长地拉汽笛，活象是动物临死时发出的不祥的悲鸣。地主家的房子是花不少钱盖的，很讲究，因为不屑于跟镇上那些俗气的、快要烂掉了的房屋挨在一起，是特地离得远远地盖起来的，而且又没有风，没有延烧的危险。

消防人员说，火着得太快，全家人大概都烧死了，没看到谁出来。

当那栋堆得满满的粮仓——前不久从北滨村

^①日本民间发生火警时敲钟不对着钟敲，而是擦着钟敲，声音破碎难听。

的佃户手里没收来的杂粮也在里面——被烧掉时，大伙儿不禁喊出声来。粮仓发出惊天动地的声音烧塌下来后，熊熊烈火和恶魔般的浓烟旋转着，咕嘟咕嘟地喷上天空。

从冰封的河里引来的水已经起不了作用了。消防人员和青年团^①的人们嚷嚷着，打着灯笼跑来跑去。

“已经烧了一大半，没办法可想的时候，说是从房子里传出了一阵喊叫的声音，一听就让人发抖，那、那——简直没法形容！听到的人说，那个声音总是留在耳边，真糟糕，声音就象是勒鸡的时候，喉咙里一边流血一边还使劲勒那样。”有个妇女悄悄地告诉站在她旁边的那个看来跟她认识的人。

对方用更低的嗓门说：“准是活报应。”

于是，他俩都沉默下来了。

源吉神不知鬼不晓地一直跑到铁路沿线那排防雪林那儿。火光把防雪林照亮了大半边。回头一看，整个天空都染红了。闹火灾的房子对面的房屋，和站在房顶上似乎正摆着手的人，还有电杆什么的，每一个黑影都看得很清楚。不知怎么一来，喧嚣的人声听起来仿佛离得很近。警钟宛

^①战前日本政府御用的青年组织。

如呻吟一般，遥远地嗡嗡响着。

“这还是轻的呢。”源吉喃喃地自言自语着，在黑魑魑的石狩平原上迈开了坚定的步伐。

“妈的，这还是轻的哪！”

1928年4月26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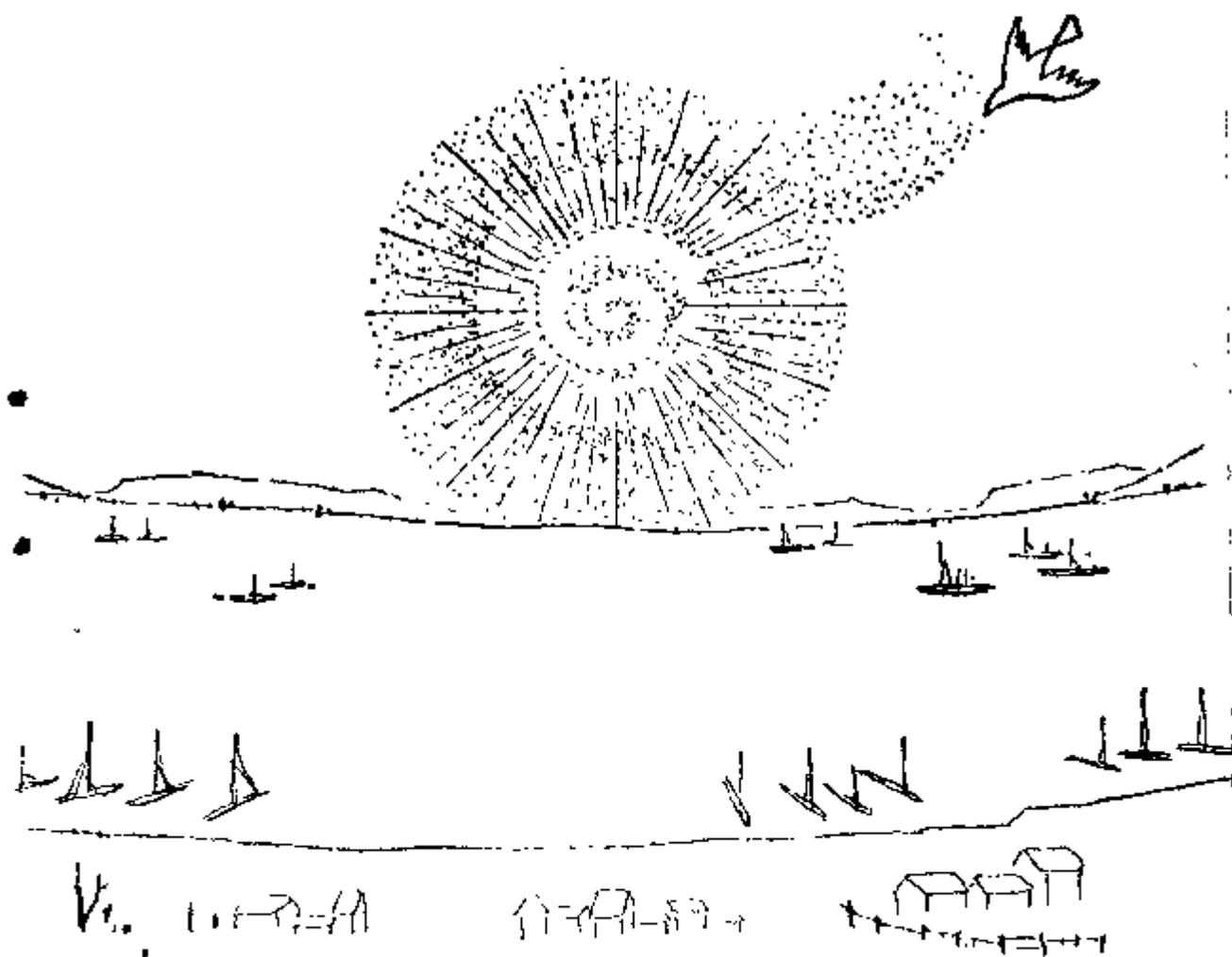
•

•

•

活下去

山田歌子 著
文洁若 译



•

•

•

•

一 凄凉的送殡队

记得那是深夜约莫两点钟的时候。我两手拿着平常得不到的苹果和点心，加上全家那种连小孩子也体会得到的异常的兴奋，使我心里十分快乐。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苹果在漆黑的玻璃车窗上映出的红颜色。这次坐车，是我们一家人生活告一个段落的“深夜逃跑”。



昭和十三年^①九月底，我们一家为了不使邻居们觉察，急急忙忙，但却不声不响地偷偷离开住了多年的藏王山脚，往S市去，到那里的时候，

^①昭和十三年是公元一九三八年。

太阳已经快出来啦。

车站前面不远就是海岸。沙丁鱼堆得高高的。往哪儿看都是山一样的鱼堆，在晨光里闪出了冷冰冰的银光。从今以后，我们就要在这儿过活了一一我的小心坎裏也感到一种新鲜的快活。就在这时候，我不知不觉说了一声：“唉，好腥气呀！”

在这个到处都是鱼腥味的S市里，我们租下的房子在市郊的山顶上。出了车站往右走不多远，拐角上开着一家在这一带算是挺大的卖黄酱和酱油的铺子。从那儿起就是人烟稀少的山路。爬完陡坡，接着就是斜坡，左边的杂草丛里还有一座荒凉的小庙。半山坡上并列着一家卖盐、杂货的店铺和一家米店，前面装着一个这一带十几家公用的水龙头。盐店是我们的房东。米店和盐店夹成一条狭窄的巷子，巷子深处是用粗石块胡乱垒成的几层石阶。石阶顶上矗立着悬崖，再上面就是山了。石阶左边是一片狭窄的平地，这里参差不齐地盖着一些连檐房。这些房子因为盖在山背后，所以后面不通风，也不见阳光。不用说这一带连檐房，就是附近一带的屯里，住的人也多半是从外乡流落来的。他们是被生活所迫、漂到这儿来的无根浮草。

我家住的是顶头第二幢房子，顶棚和地板都



破破烂烂，一片污黑。家里一共是六铺席和四铺半席的两间屋子，外带一间有名无实的厨房。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和我，还有三个弟弟，我们一家十口人都挤在这里一起睡觉。门口迈出一步就是邻居，房子后面有一条沟，上面紧接着山，走上两层石阶有一个厕所。一下雨，脏东西就溢出来流到地板底下^①。房子的前檐紧挨着一个马房的屋檐，马房是隔壁赶马车的人的。每当马不知为了什么狠狠地踢着蹄子的时候，稻草和饲料的屑末就从板壁缝飞进我们的屋里来。到了梅雨季节可更惨了。房后头溢出来

^①原文是“缘下”，日本式房子，地基与地板之间留有约二尺高的空隙。

的脏水和马房里流出来的脏水汇合在一起，我家的房子前面不用说，这一带整个都成了一条沟。因此，男男女女就随便在这里解手，到处充满了难忍的热气和恶臭。快到冬天了，这地方的蚊子和苍蝇还到处乱飞。那时候我在上小学四年级，我就总是找着母亲麻烦，说：“咱们还是回到空气新鲜的S村去吧。回去后，我一定也拚命地干活挣钱，好吗，妈妈？”不过，渐渐地我也懂得了：父母是在S村过不下去了才出来的，S村已经不再是我们的故乡了。

父亲的身体很弱，一直在咳嗽，大家都说他有“气喘病”。他既然不能干力气活，就在海滨路的桥头摆了一个“烤甜饼”的摊子。我放了学，就赶快背了书包跑到父亲那儿去帮忙，这已经成为我每天的工作。在寒冷的暴风雪的夜晚，生意还不错，主顾多半是渔夫。他们嘴里喊着：

“冷啊！”站住脚买了一个就走。一个烤好的甜饼，搁上许多糖，卖一分钱。有时候碰上高兴的年轻小伙子走来说：“来一块钱的！”那我们就忙得团团转了，东西一下子就都卖光了。可是假使糖搁得不够，甜饼马上就会卖不出去，这也叫我们没有办法。我们父女两个拚命地干，可是赚头不大，所以干了三个月就收摊了。

父亲总是咳嗽，在家里闲着。父亲既然呆在家里，就只有靠母亲干活来养活一家。母亲在繁华区附近街上的一家鱼类加工场做工。她一天到晚跟鱼搅在一起，工资只有四角钱。虽然这样，母亲还是拚命地干。一家人吃的那一点可怜的饭就由爷爷和奶奶料理，母亲把挣来的一点点钱全都交给了爷爷。哥哥在高等科^①毕业以后到公司里去当听差，可是也仅只够他一个人糊口的，结果，我们一家九口就靠着母亲的一双手来养活。生活是很苦的，我们每天都过着挨饿的日子。

我上五年级的那年，父亲到鱼市场搬运组当脚夫去了。这个搬运组专管把鱼搬上岸，可是他去了刚一个月，搬运组就垮了台，把人都解散了，父亲又没活干了。后来别人帮忙，父亲又到碎铁批发店去当脚夫。他的工作是把收破烂的人拿来的旧金属器具，用大铁槌或铁棒敲平，收拾成一定的分量和形状，这工作对父亲病弱的身体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早上咳得更厉害了，眼看着瘦了下去。父亲干了三个月左右就辞了工。

父亲在家呆了一个短时期，后来又到一个小规模的小罐厂去做工。母亲也到那个工厂去干活，家里生活比以前略微好了一点，可是不久，

^①日本旧制小学是八年，寻常科（即初等科）六年，高等科二年。

母亲因为要生产，歇工了。她在歇工后的第二天就生下一个女孩儿，宽宽的额上长着稀稀落落的一撮头发。这样，一家变成了十一口人。母亲产后不能安安逸逸地在家里坐月子，不久，就又到鱼类加工场去干活。不管怎样拚命地干，家里总还是很穷。爷爷和奶奶为了减少吃闲饭的人，到远处的姑妈家去了。

“春夫，要是生活过得好一点，就马上写信来！我们这么大年纪了，也不愿意老靠别人家养活。”

两位老人家一遍又一遍地嘱咐幼小的弟弟，一边滴下了眼泪。我望着奶奶提了一个小包袱的后影，不禁大声喊道：“奶奶，不碍事的，我们一定多多挣钱，早早给您写信。”

奶奶回过头来带着高兴的神情笑了一笑，接着又象快要哭出来的一样。我也感到一阵鼻酸。

老人家走了以后，做饭就成了我的事。早上，天朦朦亮我就起来烧饭，煮酱汤。随后母亲到加工场去，我把书本文具等包在包袱里，背着娃娃去上学，弟弟们也吵吵嚷嚷地上学去了。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在念完小学六年级以后，也马上到罐头工场去做工，住在工场的宿舍里。只有父亲因为身体不好，还起来一阵躺一阵地呆在家

里。为了给娃娃吃奶，我得一天两次把娃娃带到母亲那里去，所以在学校里一般只能上一两个钟头的课。母亲在混凝土地面潮湿的角落里，把鱼箱之类的东西翻过来坐在上面，不好意思似的缩做一团喂娃娃吃奶。娃娃舒舒服服地含着奶头，她一睡着，母亲就用指尖触她的脸，想让她赶快吃。



因为季节关系，加工场的活现在也闲了下来。这次又该到松山上去干活了。从家里出来，朝学校方面爬上山去，再向前走，爬上山路又爬下来，就来到了一片叫作“洼地”的沼泽。那里都是些大大小小的池沼，有赤锈色的，也有绿

色的。一到夏天，孩子们就到里面去游泳，大夥一起下去的时候，沼底的泥搅混了，水就变成了一窝泥浆。走过这些池沼，再向北爬上一小段陡坡，就是长着一片松树和杂木的山丘。到这里来干活的男男女女共有十多个，男人们砍大树，我和母亲她们就把松枝理得整整齐齐，捆在一起，叫做“打捆”。打一捆挣两分钱。我们把大树枝上的小枝子用弯刀砍断，或者用锯子锯下来，然后再砍成适当的长度，放在摊在地面的绳子上，把两头系紧。对于女人来说，这是相当吃力的活儿。而且绳子还得自己预备，干一整天，顶多捆上二十五捆到三十捆。

我下午一点钟放学，沿着这条从家里走来要花二十分钟的路，背着娃娃上山。我跟母亲一起用弯刀和锯干活，先用带刃的工具在树枝上砍一道切口，然后站在树枝上，用尽全身的力量一踩，树枝忽然受到压力，就从切口那里沉重地嘎叭一声折断了。这时候，用细绳子拴在离得不远的树脚上的小娃娃，看到我滑稽的面孔，就出声笑起来了。

到了傍晚，我把自己捆的木柴和母亲捆的放在一起，由监工来点数，记在本子上，这使我很兴奋。于是，我拚命干，想着哪怕多打一捆也好。在晴朗的日子里，大家一面听着不知名的小

鸟啼叫，一面一声不响地干活。有时候遇到顺风，还听得见驶出码头的船发出的悠扬的汽笛声。那晴空万里的景色，那弯弯曲曲的海岸线，那远处白色的灯塔和绿色的岛屿，都在我们的眼前展开。还有遥远的朦朦胧胧的水平线，大海就象活的东西似的不断在闪着亮光。这一切使我感到非常愉快。

傍晚，我比母亲早一个钟头回家。回去的时候，背上背着满满一大捆乾树枝和碎枝子。把娃娃放在上面，让她的两隻小脚搭在我的肩上，两隻可爱的手捧住我的头，我再用手扶着她的手，



免得她掉下去。连檐房里的人们总是夸奖我，可是孩子们却嘲笑我说：“瞧，山婆子来了！”孩子们还拿娃娃取笑，说她是“小猴子，小猴子”。这样，家里就积存了够烧半年的柴禾。

哥哥不甘心老在公司里当听差，就到附近的车站去做事，当了铁路职员。大概也是因为刚进去的缘故，薪水非常少。

父亲的病仍然不见好。有一天晚上，哥哥说最好请个好大夫来看看。这也是我自己以及全家人的心愿，可是父亲一句话就拒绝了。

“饭都吃不上，请医生来看又有什么用！”

可是接着他又有气无力地说：“这大概不是什么大病，不过是气喘罢了”，说完就用被子把头蒙了起来。父亲是个胆小的人。在待人接物上，他很老实，完全是个好好先生。相反地，在家里他却非常任性，喜怒无常。每逢父亲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发脾气的时候，孩子们都躲到屋角，缩做一团，屏着气息望着。父亲因为身体坏，自己觉得痛苦。他想干活干不成，家里又穷，所以脾气不好——我就这样劝慰自己，竭力想原谅父亲的粗暴。母亲呢，简直柔顺极了，不管父亲对她怎样粗暴，她都默默地忍受着。

有时候父亲又怪母亲一点不表示反抗，所以

很生气。“你这个没骨头的东西，要你向东，你就向东，一直待到天黑，”他一边说，一边就动手打。

有一天早晨，母亲这个老实人在上工的时候坐到父亲的枕旁，轻轻掀开肮脏的被子说：“爸爸，很对不起，请你干点什么活吧。”话刚说完，父亲的手掌就飞到母亲脸上，没轻没重地打了她一顿。——母亲默不作声，拿起包好了的饭盒上工去了。从此以后，她再也不提这个愿望了。

我一边干活，一边指望再过一些时候，也许到了明年，生活会变得好一些，可是实际上生活却是越来越坏。为了家，为了父母和弟妹，我什么活都干。春天挖田螺，摘芹菜、荠菜和白蒿，秋天拾核桃、捡柴等，凡是孩子能做的事情我都做，而且做得很好。核桃是谁都眼馋，谁都要抢着拣的。我拿了哥哥值班用的手电筒，夜里去敲核桃树，然后把核桃捡起来。到入冬的时候至少可以存下五升，多的时候可以存下一斗左右。柴禾就到学校后山上去捡。我用绳子在长竹竿头上牢牢地绑上一个码头脚夫们使用的“手钩”——一个前面弯成很大的钩子的铁家伙，把它勾在满是乾叶子的树枝上，然后拧转竹竿，背着树枝伸展的方向使劲拉。费不了多大工夫树枝就折断了。这时候我就往旁边一闪，望着树枝落下来。

树枝叭喳一声轻轻地落到地上。以后很简单：只消用弯刀砍下小枝子，折成适当的长度，捆在一起背回去就是了。山上没有活儿干的时候，我就这样替家里搬柴火。

大海也给沿海的人们带来了好处。每当潮水退后，到处就残留着裙带菜，我用一根长木棍的尖端把它们勾住，扒了过来。毫不费事地就可以捡满一小筐子。附近的渔村还用人工培养紫菜。人们为了免得陷到烂泥里，穿上一种叫作“橇子”的又厚又大的木板（上面装着麻线编的带子），把流过来的紫菜装在筐子里。紫菜可以用来作汤或者放上酱油和糖煮着吃，是大家喜欢吃的好菜。还有拾蛤蜊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无论什么样的日子我都在干活。干活。

对我来说，学校决不是快乐的地方，也决不是有趣的地方。我上四年级的时候，级任老师是男的，五年级和六年级的时候，级任老师是女的。我干起活来不比别人差，可是读书的时候记性却不好。尤其因为总是背着娃娃去上学，所以几乎念不了什么书。有时候正在上课，娃娃哭了，使我慌得很，也就不愿意再留在座位上。所以我只上一两个钟头课，就回家了。

学校方面几乎不管有没有我这么一个人。老师特别照顾的多半是有钱有势人家的子弟，不然

就是功课好的孩子。有时候，偶然遇到母亲歇工，我就不带娃娃去上学。好几天以来我头一回想安下心来用功，可是我一点功课也不懂，因为不懂，同学们就笑我，老师也生我的气。我觉得学校真没有意思，我开始讨厌学校了。

老师经常生我的气。也许由于这是个滨海的市镇吧，女老师说话也粗鲁得很。“歌子，站起来！”“歌子，你这猪，站着！”就这样老罚我站。大概我在挨骂的时候脸上看来也是含笑的，于是老师更生气了，说我不正经。因此，还常常罚我站到教室外边的走廊上。我拚命做出一本正经的脸来，不过看着还象在笑……我抱怨自己的脸长得又胖又扁。可是，罚站我并不大在乎，——怕什么？我念书不行，干起活来总不比别人差哩！——我听到了从心窝里发出的这个强有力的声音。是的，我干活是能够干得很出色的！

我读六年级的时候，有一天上游戏课。我们要随着《追兔子啊，那座山呀！》这支歌，把右手弯起来高高举在头上，身子向左边弯过去，做一个舞蹈姿势。老师在大伙儿的行列中间一排排地绕着看，到我的面前站住了。“歌子，你这是什么姿势，手简直象根棍子！”我被老师从行列里拉出来，在旁边看着学大伙儿跳舞的姿势。这

又是照例的“罚站”。对小孩说来，我干的活太吃力，所以身体已经变得僵硬了。我长得虽然矮小，可是骨节却粗大结实。我一边挨罚站，一边觉得有点悲哀，可是，在悲哀下边，却产生了冲散这悲哀的一种乐观心情：说我跳舞跳得不够柔和又算什么，身子不灵活又有什么关系，我连大人干的活都能干得很出色呢。

这样，我觉得自己在学校里虽然很可怜，可是在宇宙中，在人世间，我却是个顶天立地的、有价值的人。每当这种时候，我的耳旁就好象听到爷爷奶奶象口头禅一样对我讲过的一句话：

“歌子呀，女人没有学问也不要紧，只要能做一手好针线，拚命干活，会过穷日子，那就好得很了。”不知怎的，老人家说的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

为了减少吃闲饭的人寄居到远处姑妈家去的两位老人家，过了半年多回来了。这时候山上的活儿已经闲了下来，我们就干加了场的活。我们从庄稼人那里买进许多稻草，编成拴沙丁鱼用的绳子。在黑洞洞的屋子里，爷爷和奶奶仔细地编着草绳，小弟弟们就把绳子捆在一起，母亲抱了许多捆带到加工场去，编两根可以得到一分钱。我们每天大清早就干，一直干到夜里十一二点

钟。我背着娃娃去吃奶的时候，也跟他们一起编。薄薄地覆着一层盐的沙丁鱼山渐渐矮了下来。编绳的动作也快得叫人看了眼睛发花。我跟大人一样，编得很快。

在这个捕沙丁鱼的季节里，天气是非常寒冷的。晚上我跟母亲互相依偎着走回家的时候，路上那家小小的中国面馆的灯光很吸引我。“歌子，肚子饿了吧？”母亲搂着我的肩头，一起走进面馆。两个人吃的东西总是固定的。五分钱一碗的面，热腾腾的非常可口。母亲的爱和面的热气，使我心里感到温暖。母亲，母亲，我深深地感到母亲是世界上最好的人。

电车站旁边有一家大面包房。遇到额外干了活的日子，我们就在那里买五分钱一个的大甜面包，带回去给弟弟们和大夥儿吃。

不久，沙丁鱼的季节过去了，爷爷和奶奶因为没有编草绳的活干，又走了，说是要在远处的儿女家里住到过年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是：家里少了两口人，生活多少就会松动一些，同时，他们在儿女家里得到的一点零用钱和东西，还可以存下来带回家，这也就算尽了老人家的一点心。

母亲每天去干活。娃娃长到能够吃一点饭了，可是母亲不在家的时候还是常常要哭。娃娃一哭，我就把米饭揉成小团，蘸上点盐或是黄

酱，给她捏在手里。娃娃把饭团往小嘴里一送，就不再啼哭了。这样，她一哭就给她饭团吃，再哭再给。过了些日子，有一天，娃娃不管怎样总哭个不停。母亲一回家，我就把这情形对她讲了，可是第二天，母亲还是满脸愁容照样上工去了。这天，娃娃的样子跟平时完全两样。晚上，母亲回来后，整夜没有睡觉，一会儿背着娃娃，一会儿又让她睡下。第二天，母亲歇了工。娃娃发高烧，母亲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到了傍晚的时候，母亲就背了娃娃去看大夫。

过了一会，母亲一边哭一边走进门来。我一看，吓了一跳。背上的娃娃两隻眼睛吊起来，身子硬邦邦地向后挺着。母亲断断续续地告诉父亲，大夫说已经耽误了，急性消化不良症已经发展到脑子里。到第二天，娃娃就死了。平日一声不响的温顺的母亲，紧贴着娃娃的尸体，嚎啕大哭起来。她这种深切的悲恸是无法抑止的。阴暗的房子里，只听见母亲的哭声，高一阵低一阵地向连檐房的小巷子传送出去。我也很难过，可是我更害怕。父亲要把娃娃的眼睛阖上，可是不管他用手指摸多少次，她的眼睛还是睁得大大的，黑眼珠还是向上吊着。那样子好象在埋怨我。唉，要是我当初稍微注意一下她的饮食的话……十三岁的我就这样被悲哀和恐惧、不安和懊悔的

心情威胁着。

以后，母亲一直哭了整整一个月。她站在脏水槽前面的时候哭，把干活时带的饭盒包进包袱里的时候也流眼泪。我觉得十分对不起母亲，很想安慰安慰她，使她提起精神来。一天晚上，我提了水桶到临街的公用水龙头去打水，这时候，邻家的大娘们也在那里淘米。“真是太可惜啦——不过，她也不是光有这一个孩子。就当她用死来报答了父母吧。死的人也没法救活了，可是活的人总该保重身体呀……”她们彼此这样谈着。对呀，就这样安慰妈妈吧——我把水桶往厨房里一摆，马上就把这些话对母亲说了。母亲突然低下头，簌簌地掉下了大滴眼泪。“不管多么穷，对孩子总是一样疼的……”母亲呜咽着，对自己的贫穷感到悲痛和悔恨。从此以后，我尽量不再提起死了的妹妹的事。

然而那时候我们还是幸福的。一到晚上，三个弟弟和我，四个人就听母亲讲民间故事。母亲轻轻地给我们讲：三姐妹中间最小的一个怎样嫁给深山里的猴子来孝顺她的父母，又讲不听父母的话而被狼吃掉的羊的故事等等。我们不听故事就不肯睡觉，所以母亲把故事都讲完以后，又把讲过的故事一遍遍重复地讲。虽然这样，孩子们听了还是十分满意地去睡觉了。

不久，我小学毕业了。参加毕业典礼后的第二天，我就到镇郊附近的罐头工场去做工。那里一共有四十来个男女工人在干活。我每天的工资是五角五分，工作是把装好鱼的罐头放在箱子里，送到下一道加工——封罐头盖子——的地方去。这里做的主要是出口的鲑鱼罐头。因为搬运的罐头里都装满了橄榄油和食盐，所以不论穿上多么厚的围裙，油总会透过围裙，渗到挨近皮肤的地方。我是工人中间年纪最轻的一个，到中午休息的时候总是被人支使出去跑腿。大伙托我给他们买豆沙包啦，白薯啦，所以午间我几乎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干了三个月左右，工场因为修建房子歇工一个月。我是一天也不能闲着的，所以在家只呆了三天，又由街坊介绍去当女用人。哥哥那时候看到军需工厂非常繁荣，就不顾父母的反对，辞去铁路上的差使，到川崎的工厂里去干活了。我和母亲、弟弟们一起到车站去送哥哥，然后我就跟着介绍人到雇用我的那一家人家去。

那一家只有一对中年夫妇，没有孩子。主人是经营小型造船工场的，来来往往的大半是造船木工和别的男工。我是生平头一回离开家，感到非常寂寞。尤其到了晚上更是想家，想母亲。可是我想，既然已经出来干活，就要坚持下去。主

人夫妇因为自己没有小孩，对我很好。我早上五点钟起床，晚上十点钟睡，每月工资是五元五角。我家的房租正好是五元五角，这样，工资就全拿来交付房租，我手里连一分零用钱也剩不下。我偶然得到五分或一角钱的时候，也总是存起来给母亲。孟兰盆会那天，主人给我买了一件漂亮的衣服。这是我懂事以来，人家头一回给我买的衣服。我高兴极了，睡觉的时候也放在枕头旁边。

到了秋天，我对家务活也干惯了。一天傍晚，弟弟突然来找我。听说刚过中午的时候母亲晕倒了，我吓得脸上变了颜色。我赶紧跑回家去，这时候，母亲已经略微平静了一点。父亲说，经大夫诊断，是轻微的中风。母亲躺在磨破了的竹席子上，盖着薄被子，她虽然睡着了，却不时地惊醒过来。我一动不动地坐在母亲身旁。母亲的脸上——额头，眼角，面颊到下巴颊——全都布满了皱纹。多年劳累刻划出来的几条深深的直皱纹，在她眉间微微颤动着。可怜的妈妈！被生活所迫，夜里不睡觉还干活的妈妈！眼泪顺着我的面颊簌簌地落在膝盖上和手背上。哎呀，可不能哭，要是妈妈醒了，一定会以为自己病得很厉害——我只好肚子里憋足了劲，竭力不哭出来。

到七点多钟，母亲的病好得多了。街坊们都说葡萄汁对母亲的身体有好处，我就揣着人家给我的积下来的九角钱，顺着黑下来的街道向镇上走去。我问过了好几家铺子，可是由于战争，食品店的货色越来越缺，我要的葡萄汁哪儿也买不到。我回到家的时候，母亲正在小声说着什么。她的舌头有点不大灵活，可是我松了一口气，觉得不要紧了。我把刚才一直紧紧地捏在手里的九角钱轻轻放在母亲手里，让她拿去买点什么喜欢吃的东西。母亲的眼睛湿润了。

母亲的病好得比我们想像的快。可是，我一离开母亲，就非常惦念她。母亲只请大夫看过一次病，现在还是躺在那里，我十分担心。要是有钱就好了——我真想弄些钱来。可是，一个小孩子，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我把十一月份的工钱拿回家的时候，对父亲说：“不管怎么穷，我还是愿意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每天出去干活。”

到了年底，母亲的精神恢复过来，能够干一点活了。过年前两天，母亲突然到我这里来，她替我向主人夫妇请求辞工，说是觉得我怪可怜的，想让我回家去过年，以后就跟父母住在一起，每天出去干活。主人说了许多好话，要挽留我，可是我还是想回到母亲身边去。于是我就接受了主人夫妇的好意，跟他们一起过了大年夜，然

后赶回自己的家。

年初，我在家里只悠闲地玩了三天，接着就托人介绍到鱼市场的搬运组去干活。工作很轻松，每天的工钱是六角，还总能得到很多的鱼带回家来。可是，一同做工的人们一天到晚老讲无聊的话，这叫我比什么都讨厌。运到了大量沙丁鱼的时候，我也到鱼市场去，跟男工一起用铁锹一车一车地铲冰鱼。这时候我的身体累极了。干卖力气的活我倒从小就习惯了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在鱼市场上跟男工们混在一起干活，我总觉得很不好意思。然而我一想到干什么活都是为了挣钱，就又提起了精神。

离我们搬运组待工处不远的斜对面，并排开着三家大型的冷冻公司。靠边上最远的一家最大，母亲就在那里做工。我们下班的时间早晚不同，可是有时候我也等着母亲一起回家。

母亲干活的工厂像是个冰窖，里面纵横伸展着许多铁管，管子里是从大型电气冷冻机里送出来的阿莫尼亚气体。人们在冷冻室里穿着防寒衣干活。由于鱼的行市的关系，公司拨出大量的鲜鱼来冷冻。许多人动手把鱼装进大大小小的冷冻箱里，放在冷冻室的架子上。这种架子是用好几根铁管做成的，分成好几层，一直架到跟高高的屋顶一般齐。冷冻室用软木把外界的温度隔绝

了，软木上面还包着一层洋铁皮，铁管上不用说，室内各处都覆着厚厚的一层白冰，手指不论碰到什么地方都好像被磁石吸住了似的。冷冻过的鱼，就连同冷冻箱一起取出，放在大水槽里，将冻得硬邦邦的鱼从冷冻箱里取出来，然后堆到冷藏室里去。在这种人工的低温度中干活，身体很吃亏。冷冻室里是零下二十度，里面出入的全都是男工，可是工作忙的时候，女工也照样被喊进去干活。母亲跟大夥儿一样，带上手套，穿上干活时候穿的棉号衣^①和好几条破旧的束腿裤，上面再披上叠成双层的草席子。母亲时常头痛或腰痛，可是仍旧干下去，不肯歇工。

到了秋天，父亲到市公所去做事了，那是他几年来头一回出去正式工作。大家精神上也松了一口气，认为以后生活会好过一点了。可是不久，母亲说身体难受，就躺了下来。两三天后的一个傍晚，我什么都不曾理会，兴冲冲地喊了一声：“回来啦！”就拉开了门。爷爷搭拉着脸申斥我说：“吵什么，安静点！”我一看，在暗淡的灯光下，奶奶、姐姐和弟弟们围着母亲的被窝悄悄地坐着。父亲抱着两隻胳膊，沮丧地守在枕头旁边。

我吃了一惊，一骨碌坐了下来，奶奶流着泪

^①原文作“半纏”，是工匠穿的一种印着字号的短褂。

说：“歌子，妈妈快要死了。”母亲在那里昏睡，只听得鼻子里呼噜呼噜地响。

父亲说：“叫一声妈吧。”弟弟们大声叫了。我叫不出声，眼前一片漆黑，就象野兽吼叫似的呜呜哭了起来，一直哭个没完。

那天，我出去干活之后不久，母亲试着要爬起来，可是就在那时候跌倒了。大夫来看过，说是脑溢血，大概保不到明天早上。我哭着问父亲，为什么妈妈倒下后不马上送个信喊我回来，他回答说因为家里穷，少耽误一天活也是好的……既然这样，我还能埋怨谁呢。母亲的病尽管到了这个样子，可是因为心脏很强健，还是挨到第二天，等川崎的哥哥赶回来、远方的亲戚也到达的时候，才断了气。她死时不过四十三岁。那个晚上，我没有睡，一直在母亲的尸首旁边哭到天亮。要是去年秋天她病倒的时候就找大夫看的话，她本来是不至于死的——去年看了一次，临死的时候看了一次，这样一共只给母亲看了两次大夫就随她死去，这是我无论怎样也都想不开的。而且这又是父亲几年以来头一次出去做事以后，头一次领薪水的第五天。

想到母亲被生活所迫，强支着干活，没有快活过一天就死掉了，我的心痛得象在绞一样。邻居的大娘们替母亲梳洗、打扮好了。

“你嫁了我这么一个人，算倒了霉！让你吃尽苦头，真是对不起。”父亲也不顾当着大家的面，象对活人说话般地对母亲唠叨着。棺材里放进了一双装着漂亮趾祥儿的新木屐，那是父亲用初次挣的薪金买来的。

在秋日下午阳光的照耀下，凄凉的送殡队顺着连檐房的小巷，默默地走上了坎坷不平的山路。

二 烂 田

我因为不能老歇着，一星期后就出去干活了。尽管我想母亲已经不在世了，可是回到没有母亲的家里却仍然一天比一天感到寂寞，这心情几乎是痛苦的。十五岁的我，还想念着母亲的怀抱。在没有母亲的家里，无论什么时候总象被风吹透那样地感到冷清。

我一天不歇地干活。差不多每天都跟相熟的渔船讨来很好的鱼，一到傍晚，爷爷为了把鱼做出来赶晚饭吃，总是早一点来取。有一天，爷爷跟平常一样来了。那天刮着猛烈的北风，下午又飘起雪花。爷爷说他“好象着了凉”，我就叫他早点回家去睡觉。可是等到我回到家里一看，爷爷似乎正发着高烧。他夜里咳嗽得很厉害，我只好

去请大夫。大夫说是急性肺炎，给打了好几针。到了早晨，爷爷痛得更厉害了，烧也不退，又去请大夫来看，说是因为上了年纪，病恐怕不容易好。我们马上通知了应该通知的人家，亲戚们也都赶了来。第三天，爷爷终于在悲惨的贫穷中去世了。那是一个冬天的日子，海上正刮着风暴，整夜都听见大海怒吼的声音。时间是十二月三日的晚上，离母亲的死不过两个多月。

爷爷的手很大，手背上暴起青筋。“这两只手不分白天晚上地干活，可就是不走运，”这句话是有一回爷爷在烧得很旺的灶边烤着手，感慨很深地对旁边的我讲的。

爷爷因为是次子，年轻的时候只分得一点点田就分家立业了^①。可是要靠这一点田养活接连生下的六七个孩子可真不容易。所以爷爷给人家帮工，当筑路工人，做瓦工，拼命干活。像收购蚕茧，给山里的掮客当跑腿一类的事，哪怕只能挣一点点钱，他也勤勤恳恳地干。奶奶一边抚养好几个孩子，一边还做手工，像打草鞋啦，搓绳子啦，编草席啦。她做了这些还不算，另外又在房子周围种苕帚草，做成了几把苕帚就带到镇上去卖。尽管爷爷奔波了一辈子，一方面也是由於

^①过去日本家庭中，产业大部分由长子继承，其他儿子只能分得少数财产另立门户，或给人家入赘。

父亲从小身体就不结实，结果还是失掉了田地和房子，离开了村子，流浪到外边来。爷爷好像打心里把这件事认作是一个耻辱。他总是说：“要能听听收音机多好……”爷爷没有看过一次电影，没有吃过好东西，在这种生活里，他唯一想望的就是收音机。可是爷爷终于连收音机也没有听上就死了，死的时候脸上带着乐天知命的神情，好像认为受苦是命里注定的。

才两个月的工夫，家里就接连死掉了母亲和爷爷。过了好多日子以后，我们才习惯了家里的这种暗淡凄凉的气氛。可是我们不得不去努力干活。我在鱼市场的搬运组当招待员，干了一年光景，搬运组工人中间年轻的一个个都应召入伍了。困难的战争环境使生活一天比一天苦。常常新工人刚来，可是不几天又应召入伍或被徵用^①走了。在这片战争的气氛里，人人都走投无路，工人待工处的角落里就常常摆开赌摊聚赌。他们总是喝着廉价的酒，喝醉了就用印着组名的号衣把头一蒙，倒下睡觉。有时候他们还拿我这样的小姑娘开开玩笑。一碰到这种事情，我就尖声叫喊着到处跑，大伙就都哄然大笑。

这种时候，有一位老大爷总是挺身而出保护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强迫人民到工厂或农村去从事劳役。

我，责骂那些年轻小伙子。人们管这位老大爷叫“老留翁”。老留的老伴已经死了，独生的儿子也在中国事变^①发生后不久在战场上送了命，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过日子。他虽然已经过了当苦力的岁数，可是他生来很豪爽，又喜欢帮助人，所以大伙都信任他，跟他要好。有一天，在没有渔船入港的一个寂静的下午，老留在待工处里对我说：“歌子，你多大了？十六啦？这不是姑娘家长久干下去的地方。”

即使老留不提，我一想到自己眼看着就要到十八九了，心里也在害怕起来。给他这样好意地一劝，我就决定尽快到附近的一家制绳工场去做工。

老留说：“象你这样手巧的姑娘，可以挣好多钱呢——那里是干多少活给多少钱的。”

我靠老留的帮助，开始去上工了。制绳工场就在离市镇西郊不远半高的山岗上，工场就是一间简陋的木屋，里面四周高高地堆满了稻草，中间放着一架打稻草的滚子、五台编绳机和两台加工机。每个人管一台机器。按规定，由新上工的工人打稻草。站在那儿弯着腰打稻草是一件非常吃力的活儿，我的腰酸痛得简直直不起来。后来

^①指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对中国发动大规模军事侵略而制造的芦沟桥事变。



过了一个月光景又来了一个新工人，打稻草的活儿就交给这个人干，我就去编绳子了。我想既然管，就管最快的机器吧，我管的一台是因为转动得太快谁都不愿意管的机器。用手指捏着一定数量的稻草塞进这架飞快地转动着的机器里去，它就会把稻草拧在一起不断地编出绳子来。我双手片刻不停地操作着。工资是按出品多少来计算的，所以我每天大清早就去，一直干到傍晚五点半左右才停。普通一个成人每天能够编出七八十斤绳子，合七角钱左右。七个工人中间，我年纪最小，可是挣的钱最多，一般每天可以挣到一圆到一圆二角，所以干得很起劲。父亲的薪金虽然很低，好歹总是在市公所工作，姐姐也在罐头工厂

里做工；家里有三口人干活，生活也比以前稍微宽裕点了。

仗越打越厉害。我干了四个多月的时候，稻草因为要供应军马和稻草工业品等军需方面的使用，价钱飞涨起来。这样，制绳没有了什么赚头，工场也就关门了。好不容易才算能够多挣点儿钱，可是这下子又得去找别的活儿干了。

刚巧这时候乡下的一个熟人捎信来说，希望我给庄稼人去帮忙。原来我的饭量很大，每顿饭吃两三碗还不够饱。因为战争关系，粮食越来越缺乏，所以信上说的“做的活儿相当重，可是饭可以管饱”这句话很使我动了心，于是我马上动身到乡下去了。

那是S河畔的一个村庄，可以望到附近的藏王山。村里正开始除二道草。每天早上不到五点钟就起床，傍晚从田里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下来了。我在除草空闲的时候还要采桑叶喂蚕，喂小蚕还要把桑叶切碎。每隔一天，还得在地里摘青菜，然后骑着送货车走一里多地，送到镇上收青菜的铺子里去。每天还要把桶装在送货车上去取肥料。一天在这条路上来回走六趟，活儿非常吃力。尽管我劳动惯了，可是每天早晨还感到手脚的每个骨节都是酸痛的。村里有劳动力的人都

已经应召入伍，所以大多数庄稼人都感到人手不够，到处都找我去帮忙。到了夏天，该是除第三道草、照看夏蚕的时节了。逢到下雨天，就编蚕结茧子时候垫的稻草席，或者编装木炭用的草袋等，家家户户都一刻不停地干活。我虽然从小就劳动惯了，可是看到农家的这种生活，也感到十分惊讶。人们没有一点乐趣，晴天干，下雨天也干，每天就是忙着干活，干活，像被活儿追逼着似的干。

我觉得这一家的媳妇真是了不起。男人们、婆婆和姑娘们吃过午饭都在廊子上或地板房^①里睡午觉，媳妇却还要收拾碗筷，刷锅洗碗，照看婴儿，洗衣服，转来转去忙个不了；晚上就在暗淡的电灯光底下缝缝补补，总是最后一个睡觉。她对我说：“一年里有一两回放我回娘家去住，那就是我唯一的快乐了。”

我在一株株长得很壮实的稻子当中，一边走，一边薅稗子和杂草，背上晒得像烤焦了似的发烫。浅泥水里的泥鳅看见来了人，吓得慌忙溜掉。我马上伸出两手一捞，把它抓住，丢到腰里拴着的小篮子（样子好像鱼笼）里。这一带的田里泥鳅和鲇鱼很多，所以下田干活的人，腰里大

^①原文作“板之间”，意指铺地板的房间。日本人的习惯，在地面上铺硬草席，也有铺地板或泥地的房间。

多拴了装着竹叶的小篮。从田里上来的时候，捉到七八条算不得什么稀奇的事。

稻子开了花，只等收割了。这时候，每年照例要举行一次“濬河”的工作，就是把那条从村边流过的小河堵住，挖出河床的泥，以免河水变浅。这一天，家家户户都抢着把大条大条带叶的竹子割下来，拴了一些重东西倒插在河里。河水逐渐流尽，里面的鱼被夏天的阳光晒得闪闪发亮，都挤到比较阴暗的竹叶下面来。这时候，大伙就吵吵嚷嚷地连鱼带竹叶一齐抓起；买不起鱼的老乡们，就趁这次濬河的机会捉到许多泥鳅、鲇鱼和小鱼，足够吃半年的。

在开始割稻子以前，那一带的村子都要举行老乡们最感兴趣的节会。一天傍晚，我也跟我帮忙那家的姑娘一起，到隔着一个村子的另一个村子里去过节。那时候，那里正在动工修河堤，人们把流过村子的小河附近的一座山炸开，用挖下来的土筑堤。山里有许多狐狸，有时候甚至会跑下山来把鸡或是小猪叼走。现在每天都在爆炸，轰得它们嗷嗷地叫个不停。那天晚上，我们走过山上开的坡道，也听到后面传来凄凉的嗷嗷的狐狸叫声。

许多人从附近的村子来过节，直到夜里还很热闹。我们玩得把时间都忘了，等到想起来该往

回走的时候，村路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刚巧又是没有月亮的夜晚，我们跑着走上山间的坡道，只听得山里狐狸的叫声阴阴森森地回响着，叫得人脊梁上直冒冷气。我们两个人就没命地跑。

这条村路有两处分成岔路。我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走错的，竟直跑到东邻的村子去了，怎么走也找不到熟悉的地方。“唉，可别给狐狸迷住了。”夜晚的空气越来越冷，两个人最后竟哭了起来。这时候，我们看见后面有一线灯光。“唉呀，狐狸追来啦——救命呀！”我们简直吓坏了，没命地往前跑，可是后面的灯光也跟着追赶过来。

“怎么啦，怎么啦，不是小妙和歌子吗？”我们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同村人家的儿子。到家的时候已经一点钟了。我们挨了大伙一顿责骂，他们发觉两个姑娘半夜还没回家，都闹翻了天，近处的年轻小伙子都分头出来找我们。

秋天，养秋蚕和收谷子的时候到了。我帮一家人家割完稻子，马上又去帮另外一家。下乾田还算好，那些当地叫作“烂田”的稻田可糟透了。割稻子的时候，腰和肚脐都要泡在水里。

有一天大伙去割烂田，我觉得很为难，不知道怎样回绝。我那天正来了月经。大伙都说：“下来割呀。”我不好意思对大伙讲明白，於是

磨蹭了一会儿，不知道怎么办好，最后还是豁出去，碰到泥水里去了。当天晚上，我从脊梁到腰部都发痛。打那时候起，每次月经来的前几天我就腰痛。

家家割完了稻子，就该用打谷机脱谷了。我干的是搬运稻子的活儿。打谷机是村里农社置下的，轮流着用；可是由于战争，汽油的配给量减少了，打谷机到每一家来轮流，得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老乡们就用磨子——就是用手推转沉重的石磨来打谷，这不但比机器慢得多，而且还非常吃力。

稻子割完后，村里又为徵购粮^①闹得一团糟。我帮忙的那家人家请得起帮工，在村里算是中农，所以大米被徵购后还够自己吃的，可是有些人家不但没有大米可以卖到黑市上去，就连自己家里吃的都没有剩下。村长到处通知说，谁家不拿出徵购粮来，就把他们赶出村子去。管磨坊的老大爷因为拿不出派下来的徵购粮，急得精神错乱了。

割净的稻田上降了厚厚的一层霜，秧田里结了冰的时候，村里到处都开始说起亲事来。因为男人们大多应召入伍，说媒的事情也就渐渐少了；即使这样，人们还是时常提起姑娘们的名

^①徵购粮是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以低价强制收购农民的粮食。

字。姑娘脾气坏一点，头脑笨一点倒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条件是：身体要结实，能像牛马一样地干活。人家说我干活干得好，劝我嫁给农家，可是我觉得当庄稼人实在吃不消，天不亮就起床，一直要干到晚上星星出来。庄稼人整天在地里弯着腰转来转去。打的粮食能剩下够自己吃就算好的，连好点的青菜都得拿到市上去卖，自己只吃些粗糲的东西。我觉得这实在不是人过的生活，更不用说给这种人家当媳妇了……

我想，不管多么吃力都行，我还是愿意到城里去找活儿干。这样，我在快到正月的一天，硬把事情辞掉了。八个月的农村生活使我认识到：我以前过的劳动生活还没这么苦呢。作为报酬，我得了五十圆、五升大米和一匹布，就这样离开了农村。

城里已经完全是过年的气象。因为战争，平时铺面上摆的东西都不见了，可是行人走在盖满雪的路上，脚步还是显得很匆忙。自行车穿来穿去，车铃发出刺耳的声音。我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一家人还跟从前一样，在暗淡的灯光下吃晚饭。奶奶看见我回来很高兴，她那满是皱纹的脸上淌下了热泪。跟八个月以前不同的是：到川崎去干活的哥哥已经回到家里。他割了盲肠

又生了脚气病，休息了一个时期，因为没法勉强干活，厂主叫他回老家去休养，他就这样被打发回家了。

过年的时候，一家人团圆在一起，尽管很穷，可是过了个快乐的年。我只在家里逍逍遥遥地过了几天新年，不久又得去干活。战争越打越厉害，有不少人在南边阵亡了，政府大概为了补他们的缺，不断地徵兵。单单我们住的那一排连檐房里，就已经送走了五个壮丁，被徵到军需工厂去工作的更不在少数。

我想到自己早晚也会被徵用，就决定不如到离S市三站电车远的T镇的海军军械弹药工厂去做工。履历表是请写得一手好字的哥哥写了交去的。跟我一块儿进厂的人都受了一星期的训，然后分别安插工作。三十多个人当中，连我一共只有五个人被留在办事处当事务员——当的是位置最高的事务员。我吓了一跳。大概因为履历表上的字写得漂亮，再经过了面试，就这样录用了。我知道这种情况以后，更着了慌，可是到了现在也不便吐露这是哥哥代写的，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为了要我们熟悉一下工作，厂里让我们在办公室见习三天，什么事也不干。我一想到自己是生平头一次离开苦力的活，来做这种叫作事务工作的高级工作，就使我坐立不安，又不惭愧，

又是担心。我连“县”字都写不对。最后，我壮起了胆子说：“我实在有点儿怕，没有把握做这个工作，给我换到别的部门去吧。”

在屋角桌子上办公的一位中年负责人好像有点诧异，可是他还是马上把我派到机械车间去担任现场事务员了。这个办公室显得很杂乱，墙上和柱子上贴满了“一亿一心”^①、“灭私奉公”之类冠冕堂皇的标语。我的工作是从发出机枪的零件和材料，每天核对票据，盖图章，搬出笨重的铁材付给县领人等等，很是忙碌。虽是这样，我还是偷空一个人悄悄地练习写字和珠算。

我进厂的第二个星期，火工部发生了爆炸。那正是午后工人刚刚上工的时候，只听见猛烈的爆炸声，同时远处郊区的火药库也一个接一个地爆炸起来。硝烟的气味臭极了，大约炸死了二十多个人，还有许多人受了伤。我这车间的领班是一个姓小田的技工。他是个头发花白的中年人，为人和蔼可亲，对我特别爱护。我们这个工厂跟军队一样，规矩繁多，一有点什么事情，马上就给带到特务班去。那时候，特务班有个姓铃木的人，十分凶恶，大家都说“他会把咱们送到军事法庭去受审的”，所以非常怕他。这个小田技工在我转到食堂当管理员之后，因为把一只装一斗

^①“一亿”是指日本全国的人。

石油的空罐子拿回家去，被查了出来，挨了一顿毒打，结果发了疯，听说不久就死了。我永远不能忘记他那副温和的笑容。

过了两个来月，有一千多个男女学生动员到厂里来工作了。这些学生做的事大体上跟我一样，可是我每天的工资是七角，而学生呢，即使比我岁数小，也挣一圆。我又一次深深地懊悔自己没有能好好念书。我想学什么都行，只要是学会一种专长就好——正在这样想着的时候，遇到了在工厂食堂工作的一个朋友。我想到自己既没有文化，又不会缝纫，至少也该学会做一手好菜，就对车间的领班透露了自己的希望，厂方第二天就批准我调工作。

这次我是在高级军官食堂工作。以前，我一直以为校官级的军官很了不起，难以接近，可是经过每天的接触之后，才知道他们也是平平常常的人。其中有些人爱挑三剔四，满脸的不高兴，自以为了不起，但也有些人是好好先生。食堂工作跟事务工作不一样，上班时间很长。每天早上五点钟我就得坐头班电车去上班，总在晚上八点以后才能回家。天冷的时候，四点钟爬起来赶去上班，实在是苦，不过在工作时间以外干活还有加班费，多做可以多拿钱。

我干了一个月，挣了三十二圆的工资。我想

到挣的钱比以前多，要早点回去让奶奶和父亲欢喜欢喜，就把薪金袋裹在包袱里，向车站跑去。电车像平时那样挤得水泄不通，费了好大劲才挤上去。快下车的时候，我无意之中把手伸到包袱里去摸摸薪金袋，可是摸不到了！唉呀，这下子我可慌了，左摸右摸就是摸不到。好歹到了S站，下了车。我蹲在站台上打开包袱一看，薪金袋的确不见了。我绝望得一下子坐在地下，头直发昏。“怎么啦？怎么啦？”站上的人凑过来看。我这才恢复了神志站起来，这时候，夜晚的车站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我迷迷糊糊地向前走，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已经站在家门口了。一阵悲伤涌上心头，刚一开门，我就倒在地上放声大哭。

奶奶吃了一惊跑过来。“从早到晚那么辛辛苦苦地干了一个月挣的钱——”我一遍又一遍地向奶奶和父亲诉说，可是诉说了半天又怎么样呢？结果，除了当作意外的灾难自认晦气以外，一点办法也没有。

不久，我的大弟弟念完了高等科二年级，被征用到T工厂去工作。这时候粮食更缺了，每天做四五个饭盒的饭真不容易。尽管大伙都干活，家里却只够买一点点黑市米或别的粮食，凭你怎么拼命干，总归还是穷。

那一年秋天，哥哥接到了征召令。住在同一排连檐房的邻居们为了给他送行，家家都勉强凑点钱，买了礼物。哥哥出发的前一天，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人决定同看一次电影，作为临别的纪念。S市的末轮电影院正在上演叫作《湖畔之夜》的片子：一个漂亮的青年因病死了，他那美得叫人发冷的情人怀着悲哀的心情沿着湖畔不住地徘徊，她低声唱的调子悲惨极了，深深地打进了我的心坎。我觉得连哥哥出征的悲哀和生活的贫困等等一切烦恼，都被它冲淡以至於消失了。

第二天早晨，哥哥出发了。这条臭气冲天，到处是脏水和沟里的淤泥的偏僻小巷里的连檐房，在欢送出征军人的早晨，气氛跟平常很不一样。镇长、街道组长等人也都堆着作客的笑脸来了，照例说了一些鼓舞人心的话，人们也跟着喊万岁。

正在这个时候，一直在厨房哭泣的奶奶忽然拖着木屐滚也似的跑了出来，一下子抱住哥哥，抽抽噎噎地哭道：“傻儿呀，就是去打仗也千万不要死啊！不管怎么样，好歹要活着回来呀！”大伙都吃了一惊。刚才送行的人和被送的人还在说什么“为国捐躯”啦，“誓死报国”啦等等的话，这一类话所造成的气氛，一下子都给吹得烟消云散了。

父亲带着困惑的表情安慰她说：“奶奶，知道了，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我自己当着许多人，也感到很难为情。奶奶不肯放开哥哥，我和姐姐前拥后抱地把她搀回家去。这时候哥哥的眼睛里也有了亮晶晶的泪珠。为了不叫外面的人看见奶奶在哭，我把纸门拉上了。一群人簇拥着哥哥，垂头丧气地顺着坡道向镇上走去。



那时候，阿图岛^①全军覆没的消息已经传来

^①阿图岛在太平洋北部阿留申群岛的最西端，属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一度被日本占领。

了，南边，在瓜达尔卡纳尔岛^①也打了败仗，人人都为了这些消息感到痛心。听说东京也遭到好多次的空袭，每一趟列车都挤满了难民。敌机甚至也飞到奥羽上空来轰炸。由于空袭，上下班的电车常常随便在哪里就停了下来。有时候乘客突然被赶下来，全都进入车站附近的防空壕去避难；也有时候电车误了点，人们不得不步行，就在步行的时候，也会遭到航空母舰上飞来的飞机的机枪扫射，只好跑到附近松林里去躲避。上班的时候也是这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发出警戒警报，或空袭警报，谁也不能安心干活。尤其这个T海军工厂，是个重要地方，占的面积又很大，尽管伪装了起来，仍然是轰炸的目标。所以我在早上离家的时候，心里总是有点不安，不知道今天还能不能平安无事地回到家里。

敌机一连两三天没有来。有一天下午，大伙正在松一口气的时候，厨房里的扩音器突然报告说：福岛县有敌机十五架来袭。紧跟着天空里就有大约十五架飞机飞过来了，大伙嘴里还在说什么：“日本的飞机真快呀。”正在看的时候，哒哒哒哒来了一阵猛烈的机枪扫射。扩音器在嚷着：“全体躲避！”食堂里的人们因为就在头顶

^①瓜达尔卡纳尔岛也叫基拉尔岛，在大洋洲美拉尼西亚英属所罗门群岛中的南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一度被日本占领。

上打射，不能跑了。远处的火工部，好几千名工人都带着钢盔，排着队在逃。我们也都急得了不得。近处的会计部左边传来猛烈的哒哒哒哒的声音，把我们几乎吓得半死。食堂里待不下去了。大伙都争先恐后地跑进了冷藏库。每一次爆炸的时候，一个准尉就把门关上。人人都吓得面孔发青。还有人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不及逃跑的人都躲在蒸气锅底下或者趴在窗脚下，可是准尉还在嚷：“那里危险！离开！趴下，趴下！”有一阵子扫射的声音变得很猛烈，接着“轰！轰！”响起了可怕的声音，马上又静下来了。原来敌机已经飞走。大伙好不容易清醒过来，慢慢地聚在一起。这才知道会计部和仓库都中了炸弹。会计部炸死了一男一女两个事务员。那时候要是火工部中了一颗炸弹的话……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浑身发抖。

刚刚缓过一口气，敌机又来了。这一次大伙赶紧逃到离开火工部很远的防空壕里去。即使是在炎热的仲夏，人们也都严严实实地穿着防空服到工厂去上班。这里的港口在战时修建了一座规模宏大的船坞，因此也是很容易遭到空袭的危险地带。每天在车间里，大家谈论的尽是日本全国各地都被炸得一塌糊涂之类的话。明天会怎么样呢？大伙的前途都是渺茫的，一面干活，一面准

备逃警报，日子一天一天就这么过去了。

七月九日夜晚，近处的大都市S市遭到可怕的空袭。S港也投下了照明弹，照得像白昼那么亮。S市整整烧了一夜，满天都红了。第二天到工厂去的时候，所有住在S市来上班的人全都缺勤了，后来还听说跟我一起工作的伙伴里有一个人死了。各处的车间都死了好多人。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大伙倒很安静。因为神经太紧张，连死这件事都引不起强烈的反应。

大家正感到日本已经完全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突然停战了。车间的人们本来灌输了满脑子“一亿玉碎”^①的决心，结果事先没有得到一点消息就停了战，大伙也没有心绪干活了。工厂各部门的老爷们成天只是喝闷酒，大吵大闹，也有一些大尉和少尉板着面孔开始整理文件和物资。不久，车间的气氛显得更嘈杂了。大伙想到工厂早晚要关门，都在为今后的生活着急。

美军快要进驻的时候，厂方发表了第一次整编的通告。在礼堂召集了那次动员学生时候进厂的一千多名女学生，由一个少尉训话。“日本打败了。美国不久就要来占领，也不知道他们会干些什么事。诸位是日本的女性，要活得体面。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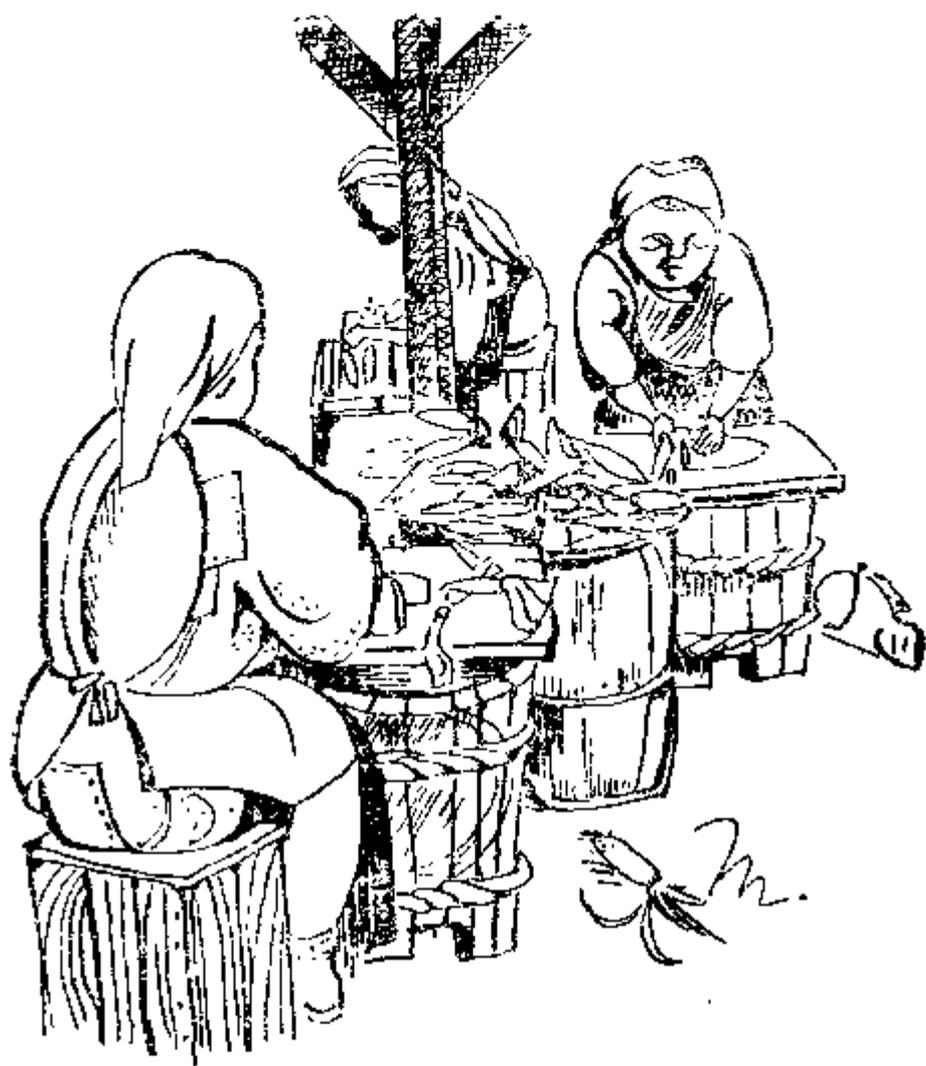
^①意思是：“与国家共存亡”。

果体面受到损害，就应该当场自尽，”他一边讲一边流泪。可是，女学生们一个两个地走开，不知什么时候一个也不剩了，只有我一个人站在后面呆呆地望着。看见那个战争结束后仍然以指导者自居的少尉，在没有人的屋子里高谈阔论的滑稽样子，我不由得嗤的一笑，也走了出去。

我和弟弟在第一次整编中就退了职，得到八百圆和一具作为纪念的白色降落伞。后来听到传言说，上头那些老爷们大规模地隐匿了物资。

离开工厂的第二天，我听朋友说起，就到港口附近的加工场去做工。那是个腌乌贼的工场，有女工六名，男工三名，加上老板一共十个人干活。那时候正赶上战后什么都缺，粮食又困难，腌乌贼的销路很好，再怎么赶着加工也会马上销完。老板从北海道买进大批咸乌贼，乌贼用盐腌过，硬邦邦的，泡在水里以后就会膨胀。我们把乌贼剁碎，老板加上大量的水把它弄稀。虽是这样，还是卖得非常快。

这个工场的旁边，是日本水产公司的冷冻工厂，归美国使用，专门冷冻美军的食品。那里昼夜都有美国兵，三个人一班，轮流监视着。一天傍晚，有一个人喝醉了，东倒西歪地走进我们的工场里来。当时大伙都已经回去了，只有我们两三个人在干活。这个美国兵手里拿着装满了酒的



玻璃杯，向我扑过来。我終於给他抓住了。我既不懂英语，对方又是个蛮悍的大个子，尽管我对那个呆在屋角里的老板叫喊：“老板，救救我吧！”可是他装作没听见。这个美国兵拿酒硬往我嘴里灌。我一生气，猛地用身子朝他一撞，想把他撞倒。我有男人一样大的气力，对方又吃醉了，他就踉踉跄跄地往后退，咕咚一下撞在混凝土上的壁脚上了。

我乘机赶快跑开，一边还骂了一句：“混蛋！”他听见这句话，猛地站起来，一面说：

“混蛋？混蛋？”一面逼过来。我心想：你自己不讲理，凭什么还要生气。我也很生气，可是他却扳着手枪的扳机来恫吓我。我吓了一跳，赶快编了个谎，指着老板打手势说，我骂的是他呢，这样他才晃晃悠悠地走出去了。街道上已经有好几个人站在那里看热闹了。我马上责备老板和一起干活的人，骂他们是胆小鬼。他们解释说：“要是男人出面，事情会闹大的。”可是我还是狠狠地瞪了他们几眼。

腌乌贼的工作告一段落以后，该制鳕鱼了。工作的程序是先把鱼头和脏腑去掉，切成三片，然后用盐腌起来或者晒成乾鱼。老板似乎赚了很多钱，不久就在附近修建了一所住宅。

有一天，我正在准备回家的时候，老板对我说：“有空到我家里来玩玩吧。”我就绕一点路拜访了他的新居。当我站在那个木头还发着新鲜的香味的大门口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穿的破旧的束腿裤和用奶奶的旧和服改做的标准服的样子，觉得真有点难为情。在起坐室里，老板给我沏了茶。他的妻子正在厨房里忙着准备晚饭。於是，老板就悄悄地对我说：“阿歌呀，我送你一万圆，你给我当姨太太行不行？”我大吃一

惊，两眼盯着老板。老板又追了一句：“一万圆不行，那么给两万圆，马上就给。”

我简直冒火了，责备他说：“我是穷人，从小什么活都干，一点不怕吃苦。要是有人当小老婆的念头，我早就当艺妓去了。不管人家怎么穷，你也不应该把人看得太下贱呀。”我一边说，一边气得直流泪，马上站起身来要回家去。老板在背后说：“不愿意也没有办法，可是这事情千万不要对别人讲。”说着，他拿了一张百圆钞票往我手里塞，我一下子甩开他的手，像逃走般地跑开了。

我照旧去干活，同时想：要是老板故意刁难，那么我只有不在这里干了，可是此后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的事。在工作上我最受老板的信任，他甚至叫我管理别人的工作，可是薪金一点也不给加。由于战后通货膨胀，我们连饭也吃不饱。我虽然满心想要求增加工资，可是又不愿意让他钻空子，所以一直张不开口。原来跟我一起做工的几个女人，差不多都换掉了。

不久发生了一件糟糕的事情：在罐头工厂做工的姐姐据说偷了公司的一箱罐头，公司方面逼她写了悔过书。我下班的时候，姐姐正在跟父亲拌嘴。“既然自己没有做这种事，讲清楚了不就成了吗？”“可是东西是在我的包袱里找出来

的，怎么说也没用，”姐姐气愤地哭着说。这箱罐头大概是什么人偷了之后包在姐姐的包袱里的，可是那个人为什么要干这种事，那就知道了。也许是很偶然的，那个人把姐姐的包袱皮也偷去，就用它来包了；也可能是男工里头有恨姐姐的人。可是结果公司还一口咬定是姐姐偷的，非要她写悔过书不可。

姐姐是个不大说话的老实人，虽然不精明，可是为人很正派。第二天早晨，姐姐说她不去上班了，不管父亲和奶奶怎么劝说安慰，她仍然执拗着一句也不听。我也拚命劝她说：只不过是写了悔过书，又不是被开除，可是劝也白劝。我感到非常难过：父亲对人对事太厚道了，不中用；公司方面又不会把我看在眼里，要是哥哥在家，那多好呢。

这件事发生以后，姐姐每天呆在家里，并且显然变得轻佻了。尽管有人给她在旁的地方介绍工作，可是怎么劝，她也不肯去。她有时候晚上还出去玩，好像交上了男朋友。

大弟弟在工厂里歇工以后，就到近处的占领军兵营里做工去了。父亲的气喘病好一阵，坏一阵，常常躺在家里不能到市公所去上班。姐姐又不工作，我只好拚命地干。在上班的空闲时候还捡柴禾，想办法去弄到白薯和南瓜一类的食物。邻

家的生活也都很困难，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面熟的姑娘们都穿上了花花绿绿刺眼的洋装，原来她们一个个地都当了“伴伴儿”^①啦。在这一带，当“伴伴儿”既不稀奇，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

在一个暖融融的春天的下午，姐姐慌慌张张地跑到我做工的工场里来找我，说父亲吐血了。我吓得马上赶回家去，看见父亲微微睁着眼睛躺在那里。被头上和枕头边上还沾着一片黏糊糊的血渍。父亲对心惊胆战的我们说：“因为气喘，咳得很厉害，咳出了血痰，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想这话也有道理。我一直以为患肺病的人都是面色发青、瘦骨嶙嶙的，所以作梦也没有想到体质相当好的父亲也会有肺病。

父亲说，只要静养几天就行，於是躺了几天，他就说精神好了，又去上班了。

不久，哥哥阵亡的公报送来了。父亲一直想勉强支持到儿子回来的时候，这样一来，就沮丧得连晚饭也不吃就睡下了。奶奶紧紧地捧着公报，哭得死去活来。我也一下子泄了气。哥哥出发那天早上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说也奇

^①“伴伴儿”是美帝国主义者占领下，日本一种专门接待美国兵的妓女。

怪，耳朵里却隐隐听到离别前一起看过的那个电影里的美妙的主题歌。

大弟弟自从在占领军那里做工以来，渐渐地学坏了。他好像开始在跟一些二流子交往。听到哥哥阵亡的消息后，他有时候一连三四天不回家。后来闹到连父亲的话也不听了，一家人谁也没有办法。

姐姐又是姐姐的一套，她常常在夜里出去玩，附近的街坊们都在交头接耳议论她交男朋友的事。我的心情坏透了。有一次弟弟一连五天不回家，我和碰巧在家的姐姐两个人顺着黑漆漆的路去找弟弟。凡是二流子可能去的酒店、舞厅、租船处等等地方都找遍了，可就是找不到他。有时候正在找着找着，他却又突然回来了。

街坊们都知道了弟弟的事情，父亲也惭愧得说没有脸见人。就在这当儿，姐姐突然失踪了。可以猜得出她一定是跟什么男人在一起，可是此外就一点头绪也摸不到了。家里只有姐姐随身用的一些东西，用两个包袱包着，乱丢在壁橱里。

我在工场里拚命干活，可是一想到这些就觉得活着真没有意思。正在操作的两手就会不知不觉地停下来，一个劲儿地想。想到母亲、爷爷和哥哥都已经去世，家里出了丢脸的姐姐和弟弟，这真比受苦受累还痛苦得多。父亲一直对别人瞒

着姐姐出走的事。家里一天比一天变得阴暗了。

有一天晚上，我出去找几天没有回家的弟弟。我在黑暗的路上徘徊，无意之中来到了港埠桥上。港湾里流着深深的黑糊糊的海水。我倚在桥栏杆上凝视着流水，心里的痛苦渐渐减轻，头脑也清醒了一些。我的身心快要被流水完全吸引住的时候，忽然我听见三四个男人在讲话，声音越来越近。我仔细一看，其中就有弟弟。弟弟！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就在路上严厉地责备他。弟弟一时好像自知理亏，就跟朋友分手，同我一起回家了。

我哭着劝导弟弟。弟弟很难得地乖乖听着，父亲和奶奶也都和善地规劝他，当晚就睡了。可是到了第二天，弟弟的态度又完全变了，他硬要了些钱，拿了两三件母亲的衣裳，满不在乎地走出去了。

十月里，哥哥的遗骨运回来了，是父亲去领的。那时候，人们对美军有顾虑，不敢公开去迎接遗骨。这次虽然同时运到了二十一具遗骨，却仅仅在车站听了市长几句简单的致词，然后各家马上就都领走了。哥哥就这样变成一具小小的白木箱，回到了弟弟也不在的阴暗的家里。

姐姐走后一个多月的一天晚上，家里来了个不相识的五十来岁的女人。虽然是初次见面，她

说话却很不客气。她破口大骂说：她家的宝贝儿子给我们家的姑娘拐跑了。后来我们知道这个人就住在鱼市场附近，那个儿子是她家的老三。她恶言恶语地要我们把儿子还给她，闹了一阵子又鬼头鬼脑地回去了。

这种日子可不好熬。我去上工的时候常常一路想着：大弟弟上小学的时候成绩很好，他曾经要求想法让他进中学，可是没有能达到愿望，念完高等科就做工去了。我后悔当初没有按他的意思让他升学。要不是因为家里穷，姐姐本来也许还能够辩解说，她没有偷东西。这样一想，我就盼望找到能挣更多钱的工作。家人一个个地死去了，姐姐和弟弟又不走正路，我们家就这样好像快要垮台了。对，明年春天一定要把最小的弟弟送去上新制高等学校^①，把他培养成一个健全的人，我这样下了坚定的决心。

当时，我做工的那家加工场的老板有个朋友，有时候到工场里来，他是开肥料工场的。他大概看到我干活干得好，就问我想到他的工场去做工。当时老板不在场，我觉得在情理上似乎有点说不过去，可是那边的薪金比这个工场高

^①战后日本的学制改为中学校三年（相当于我国初中），高等学校三年（相当于我国高中）。

一些，所以我的心就动了。我想了一夜，第二天就对老板提出了辞工的要求。老板似乎有点觉察出来了，虽然表示不愿意，可我还是硬辞了下来。我一直拚着命给老板干活，可是一旦辞工，老板却一分钱也不多给，连多干了四天活的工钱也不给算。

肥料工场是制造鱼肥料的。大堆大堆质量坏的咸鲑鱼运了进来。每天傍晚在大锅里烧上开水，把二十来条鱼放在竹篓里下锅煮上三十多分钟。这时候要用篦子似的大木板不断地搅动，免得煮糊。煮完之后，用策篱把鱼都捞到桶里。然后，在上面放上盖子，用力往下压。一个人不能把鱼压硬，所以由男女工各一人为一组，“唉呀，挤呀！唉呀，挤呀！”地吆喝着压。这个工作一定要干到半夜才完，一到夜里身体就疲乏得不得了。可是加班加点可以多得工资，所以我还是拚命干。第二天早上，把压硬了的鱼肥用机器搅碎，放在太阳下面晒两三天。这件工作也是很吃力的，就是从早到晚不停地干，有时候也还干不完。

老板最会支使人，逼着工人干活。工人干累了，刚要歇一口气，老板就马上跑出来大声嚷。这个老板身子足有一百八九十斤重，面孔长得像个大马猴。他的妻子是个歇斯底里的女人，工人们刚刚耽搁一下没有把肮脏的工场打扫干净，她

马上就尖声尖气地大发脾气。丈夫在妻子面前连头都抬不起来，妻子说什么他都唯唯诺诺。工人们在疲乏的时候，吆喝声不知不觉地就变为：

“大马猴嘿！宋美龄^①嘿！”这样，大夥就嘻笑着，一直干到早上三点钟。这种时候工人们就在工场里过夜。

在这个工场里，我跟一个同岁数的名叫千代的姑娘很要好。她也非常穷，我们俩买不起长统靴，只好光着脚干活，脚每天都要被鱼刺扎着。回家的时候，两个人都一瘸一拐的，彼此不觉看着发笑。晚上睡下以后，脚就又痛又痒。千代是一个性情温柔快活的人。她的肤色较黑，可是眼睛又大又亮，有着轮廓鲜明的面庞，灵活小巧的身材，干起活来又麻利又快当。可是后来她一句话也没交代就不到工场里来干活了。有一次我偶然在街上碰到她。看见她穿了一身漂亮的洋装。她说：“我跟卓^②在一块儿过呢，到我家来玩吧。”她说得很坦然，很亲热，口气里一点也没有什么怕人知道的意思。

分手以后，我几次回过头去看她，深深地叹了几口气。这个工场的工资虽然比较高一些，可是得没完没了地干活。刚一有点闲工夫，老板就

① 蒋老板的老婆，并且影射老板怕老婆。

② 卓是美国名字约瑟夫的简称。

叫我们编蒸笼，或者做箱子。他买了材料来叫我们做，比买制成品要便宜得多。

姐姐跑了以后，秋天也过了。三个月后，初冬的某一天——这一天是我难得的假日——家门口来了一个警官，说姐姐和一个男人在浅虫温泉的旅馆企图自杀，现在还由那个旅馆照看着，叫家里人赶快去接回来。这件事来得太突然，把我给愣住了。可我还是到父亲的办公地点去通知了他，父亲就到警察局去问明路途和事情的大概经过，他当天晚上就坐火车赶去了。两天以后，父亲把姐姐领了回来。姐姐一句话也不说，光是在屋角里睡觉，父亲也什么都没有说。不过显然已经看得出姐姐怀孕了。

父亲认为事到如今，再没有旁的办法，只有让他们马上结婚。看来父亲已经到男方的家里去过了，以前来过的那个气势汹汹的女人——男方的母亲——又来了。那是在晚上。姐姐却始终没有从那两扇破纸门背后走出来，那家的母亲就用四邻都听得见的声音气冲冲地嚷道：“你家的姑娘把我的儿子毁啦。”听她的话，才知道姐姐他们在浅虫的旅馆里欠下了好几千圆的账，另外还在别的地方也欠下了债。男方是在想尽办法把这笔债推到我们头上，所以说话的时候口气更加来得粗暴。那家的母亲走后，父亲思索了很久，自

言自语地说：“只好先把债还清，然后再办喜事。”

两三天以后，父亲带回来一万多圆。他也没有讲这笔钱是从哪里弄来的。几天以后，算是替姐姐举行了结婚仪式，跟我们交往很密的一位邻家大娘当证婚人，我怎么也不能原谅姐姐，所以我始终没有跟她讲一句话，只是狠狠地瞪着这个太任性的姐姐，感到说不出的气愤。

可是，等到男家所不欢迎的姐姐的结婚仪式终于决定在我们这个阴暗的家里举行的时候，我又可怜起姐姐来了。我把纸门和裱榻上的破纸稍微修补了一下，自己还下厨房去做菜。

男家来的是穿着国防色学生装的新郎，还有一个已过中年的女人（大概是他家的朋友），他们跟我父亲、姐姐和作证婚人的大娘，一起围着那几十年来被手垢弄得污黑的饭桌边坐下。大娘穿着她仅有的一件好衣服——硬挺挺的提花缎褂子。不知道她从哪里弄来一升糙酒，於是大夥敬起酒来，才使冷清清的席间稍微热闹了一些。姐夫年纪还很轻，我从厨房里一眼一眼地偷看他的侧面，他还带着几分孩子气，说是比姐姐小两岁，看起来还要年轻得多。父亲难得这样高兴，他不合调地用手打着拍子，唱了几支歌。九点过后，大夥就把新夫妇送出去了。

姐姐在走下泥土地的时候，回过头来悄悄地对我说：“歌子呀，给你添麻烦了，真对不起。爸爸和奶奶都托付给你了。”“你放心吧，姐姐也多多保重身体。”——这是姐姐被领回来以后，我们姐妹俩交谈的头一句话。

姐夫是搬运组的工人，据说他们想暂时借住在搬运组办事处二楼上的房间里。他俩由大娘伴送着，顺着坡路走下去。我站在门口目送他们，姐姐穿着那件她作姑娘的时候奶奶给她的人造丝褂子，我一直望到她褂子上的红色花纹被黑暗吞没、三个人的背影在坡下消失了。天快亮的时候，又像要飘雪花似的冷起来了。

姐姐结婚以后，家里也安定了一些。可是大弟弟还跟以前一样不在家呆，回来就硬把家里仅有的那点钱要走，还顺手抓到什么东西就拿。奶奶早晚都在神龛^①前合掌念叨：“他不是个坏孩子，一定就会变好的。”二弟已经念完高等科，给占领军当听差去了。可是他说：“怕会变成哥哥那样的二流子。”自己决定去学木匠，每天就到几百米以外的木匠家去当学徒。当然这是没什么收入可以指望的。

工场里的活儿很忙。女夥伴不断地更换，我成了老工人啦。年底的街头又逐渐出现了货物，

^①佛龛是日本人供祖宗牌位的地方。

显得繁荣起来。电线杆上贴着电气公司和国营铁道公司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传单，在国营电车的车站前和商店街的十字路口，工人们用带子挽起和服衣袖，拿着扩音器，正在宣传要求年终津贴和提高工资基数的罢工，请求大夥给予支持。我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老是预支，预支，到发工资的那天，已经拿不到几个钱了。而且不管干多少活，工资总不过是三千圆出头。中午带的一般是稀饭。热稀饭不好带，怕流出来，所以等凉了以后再包在包袱里。跟我一起做工的人带的都是干饭，虽然他们饭里也掺着麦子、土豆和菜梗。所以我老是背着人吃。

我真愿意想法多弄点钱。跟我一起干活的男工常常从做肥料用的咸鲑鱼、鲷鱼和其他鱼当中挑出较好的部分来，偷偷装在木箱里，弄出去卖。我也常常拿到这种东西，往家里带。因为老板太凶，谁也不想正面去要求增加工资。我一看到罢工传单，听到拿着扩音器的人们的宣传，就想要到大工厂去干活，可是我连小学都没有正经上过，不管是读、写或者珠算，样样都不成，对我来说，这不过是妄想罢了。

正月过了。奶奶始终是疼我的。她总是说：“只有歌子是为一家干活的好姑娘。”她还有旧布替我缝束腿裤。我在假日也给奶奶梳梳头，洗

洗衣服。姐姐结婚后，父亲早晨按时上班，傍晚回家，可是一个钱也不往回拿。我一问，他就说：“都拿去还债了。”

因为澡塘离得远，我大约每隔五天就牵着奶奶的手，领她去洗一次澡。二月初的一个晚上，雪已经住了，月色很好。奶奶热呼呼的手上戴着破手套、拄着拐杖，我搀了她在雪地里走。我们在街角的点心铺买了两个五圆的糖球，每人吃了一个。奶奶很高兴，说她要把她攒的零用钱给孩子们每人一百圆，这是她从远处儿女那里得来，为料理身后的。回家以后，她马上给弟弟们每人一百圆，给了我二百圆。第二天，我就用这笔钱买了一双我早就想买的红色天鹅绒的袜子^①，穿上暖和极了。

这以后，奶奶还很硬朗，可是三天过后的傍晚，我回家看见奶奶躺着，父亲和小弟弟在准备晚饭，说奶奶在中午拿抹布擦东西的时候，忽然感到不舒服就躺下了。我挨在她的身边说了声：“我回来啦。”可是奶奶不回答，只是哼。我大吃一惊，马上请了大夫来，大夫说是脑溢血，不一定能保得到明天。我一想到待我比父亲还要亲

^① 原文是“足袋”，日本人穿的一种袜子，大脚趾和其他四个脚趾分开。

热的奶奶就要死了，简直悲痛极了。第二天，奶奶仍旧躺着哼哼。晚上叔叔和姑妈赶来了。奶奶直流油汗，我觉得她这就要死了，哭个不停。第二天早晨，奶奶唯一的妹妹从青森赶来了，她匆匆忙忙地挨到枕边的时候，一直在昏迷中的奶奶把眼睛睁得大大的，泪水沿着鬓角流下，嘴唇还翕动了几下，然后就死了。

正是寒冷的时节，要睡也没有被子。我们在火盆里添足了火，大夥守夜。半夜，我当着亲戚的面，壮起胆子问父亲：“爸爸，您是不是已经不在市公所下了？”我原来一直就觉得父亲的神情不对头。这时候他一动不动地垂着头说道：

“歌子呀，原谅爸爸吧，幸子（姐姐的名字）结婚的时候，我到处借不到钱，所以辞去了市公所的职务，用退職金还了他们的债，替他们办了喜事。”父亲说着，不觉流下泪来。接着就大声哭着说：儿子变成了二流子，女儿跟男人跑了，大儿子阵亡，自己身体又不好，觉得很难再工作下去，所以决心退職，把女儿嫁出去，然后豁出去到山里寻死了事，没想到奶奶却死在头里了。亲戚中有的责备他，有的安慰他，大夥都哭了。想到父亲退職以后还假装上班的心情，我不由得也哭起来，只觉得父亲太可怜了。

奶奶去世后，家里更寂寞了。以后父亲每天

就呆在家里。为了养活父亲和弟弟们，我得干活。三弟在学校里成绩很好。我想，三月里一定要让他考高等学校，把他培养成一个有作为的人。我拚命干活，把摆脱贫困和屈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三弟的升学上。我和着“大马猴嘿！”

“宋美龄嘿！”“转呀嘿！”的吆喝声，胳膊上使足了劲，紧紧攥住那条压鱼用的铁棒。

三 值得活着

捕鲢鱼的船开进港口，春天来了。我一起来就爬上后山，这时候，树梢上刚冒出叶芽，嫩得发红。后山的小鸟都跟我一块儿起来，又开始了喧喧闹闹的一天。“咻！咻！咻！”我吹着口哨，向小鸟打招呼。我挺起胸脯深深吸着早晨山丘里的空气，觉得好像有一股力量从身体的深处涌了出来。“咻！咻——”我感到了一种像小鸟一样的愉快的心情。我跑进阴暗的厨房，把干树枝塞到灶口里，点着火。一股青烟袅袅地随着山里的和风从后门吹走了。自从奶奶死后，我每天早上都是做好早饭，把父亲和弟弟照护完，才出去干活。

我瞒着父亲让三弟去投考高等学校，结果被录取了。“饭都没得吃，拿什么去上学呢？”父



亲这样反对。的确，我们过的就是这样的日子。我说：“可是没有学问就被人家看不起，谁也不会好好瞧你一眼。”我硬作主张让弟弟进了高等学校。

“不要紧，爸爸，我只要多挣些钱，不就有办法了吗？”

鱼肥是用太阳晒的，在长长的春日下，很容易晒干。我们在广场上铺满席子，把压榨筒压干的、凝结成块的鱼肥用机器碾碎，把它在席子上摊平，这样既不至於闷坏，也不至于晒过了头。晒的时候鱼肥特有的臭味直冲鼻子。鱼肥干了以

后，用手指一捻，就沙沙地撒落，变成粉末。这些鱼肥要用草袋装，会打算盘的老板连草袋也要我们编。他买了大批稻草席，叫我们把细竹竿的一头削尖了，拴上绳子，把折过来的席子缝在一起，然后再用绳子把底部巧妙地缝拢来，制成类似草袋的东西。我们在台秤上称足一百斤鱼肥，装进草袋，顶端用绳子结结实实地捆好，免得撒出来，然后打成包。要把这种包打结实，一定得有男人那样的大力气，所以我连两只脚都使上，才连踢带踹地把包打结实。大夥又把打好的包扛去堆起来。趁着有太阳的时候，大夥都被逼着不停地晒肥料，傍晚就烧起大锅，熬夜制造鱼肥。我这样不分昼夜地干，到月底也挣不满三千五百圆。鱼来得不多，因此，制造肥料的活也有间歇的时候，於是工场老板决定盖一座鱼类加工场。

他不雇零工，叫四个男工和我，还有另外一个女工，利用空闲时间来盖。地面全是坑坑洼洼，打地基需要土。我们扛起铁镐和铁锹，到二百米以外的山岩上去开山，用筐子接连地把土运回来，在场地上打下桩子，装上板壁。我们还跟老板一起学着做木匠活。

又制造肥料，又干木匠活，把我累得精疲力尽，晚上回到家里吃的又是很糙的饭。父亲差不多一步也不出去了，他整天摊开被褥，过着时睡

时起的生活。可是当他精神好的时候，他也帮助三弟做晚饭。

“春夫那家伙刚才又把爷爷的什么衣服拿走了，简直不是个东西！”“春夫今天又来逼着要零用钱，我说一分钱也没有，他就从壁橱里拿出被子，把破被里子撕下，光把棉絮拿走了，”父亲总是这样无可奈何地诉苦。春夫有一阵子没回家，一下子突然又回来了。大家见了面，不知不觉地就责备起他来。於是他就吓唬着说：“什么？再说一遍，你试试看！”放荡的生活不知什么时候使他的眼神也变了，他虽然是我的弟弟，可是他一瞪眼，我就吓得缩作一团。

虽然这样，两个弟弟还是不顾一切地缠住哥哥说：“为了哥哥一个人，爸爸没脸见人，连门都不敢出，我们也觉得难为情。哥哥呀，求求你改邪归正吧。”“别罗嗦，少废话！”春夫一把抓住小弟弟的前襟，把他打倒了。二弟气得喊道：“好，你敢动手，你这个忤逆的家伙，滚出去！”说着他就向春夫扑了过去，接着两个人就扭在一起打了起来。

父亲也出来说：“再也不能饶他了。”於是，打呀，踢呀，哭呀，喊呀，许多邻人都挤在大门口看热闹。“别打了，别打了！”我一边哭一边劝他们。然后一家子又都默默地钻到被窝里

去了。奶奶一直到去世的时候还惦记着春夫，每天早晚总要在顶棚角上的神龛前面合着手祷告。

春夫本来是个聪明的孩子。他在小学里当过班长，写得一手好字，曾经在书法展览会上得过奖。那样好的一个弟弟……晚上，当他心平气和的时候，我对他追述母亲活着的时候大夥听她讲民间传说的事情，轻轻地劝他，盼望他重新回到正路上来。这种时候，他也会一声不响地听着。可是到了第二天，他的态度就又完全改变了，家里的东西仍然顺手往外拿。

春夫不回家的晚上，大夥都惦念他，可是他一回来，晚上又准吵得很厉害。大弟的事情使一家人都感到没路可走。什么都不怕的春夫，终于对父亲也耍起粗暴的态度来了。不用说二弟三弟，就连我身上也不断地有了伤痕。我要是一不小心让他看见了钱，他就逼着一定要，要到手才算了事。我因为怕把事情闹大，怕他吵闹得四邻都听见，只好忍痛把第二天买米的钱都拿给他。

“得，得，就这一回，就这一回。”每次都是“就这一回。”

穷人家里所有起眼的东西都被他一件件地拿出去卖了。对外人我们还尽量替他隐瞒，可是这一带连檐房的人早已知道了这种情形，并且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已经成为附近纷纷议论的话题了。

大家都怕事，没有人肯替我们出主意，家里人谁也拿弟弟没办法。隔壁赶马车的大爷是父亲的知交，常常到我们家来玩。旧历五月节的晚上，他喝醉了酒，兴高采烈地到我们家来，谈了一些家常以后，他说：“像你家春夫这样的家伙，据说要是关到感化院那样的地方去就好了。”“哪儿有感化院呀？”“怎样才能把他送去呢？”我们都觉得这是个办法，就向他问这问那。从那时候起，家里人就时常商量把弟弟送进感化院的事，可是不久以后姐姐回来了，她说：“要是把他送进感化院去，反而会激起他的反抗心，那就更不好了。”

春夫虽然一回家就胡作非为，看见什么就拿什么，不过他在外面还没有干过坏事，也没有伤害过别人。家里又觉得这样看来，他还算过得去，於是又把送感化院的事搁下不谈了。我们决定暂时先不拿他怎么样。

父亲和弟弟们都想决不再跟春夫说什么话了。可是我一看见春夫，女人的脾气就来了，老想唠叨他两句。暮春一个雨天的晚上，我又不知不觉地揪住了春夫。“嘿，真罗嗦！”他话刚一出口，就把火盆上煨着的水壶向我丢了过来。水壶打在我的胸口上，滚烫的水溅了我一手。“哎哟！”这是一眨眼工夫的事。父亲吃了一惊，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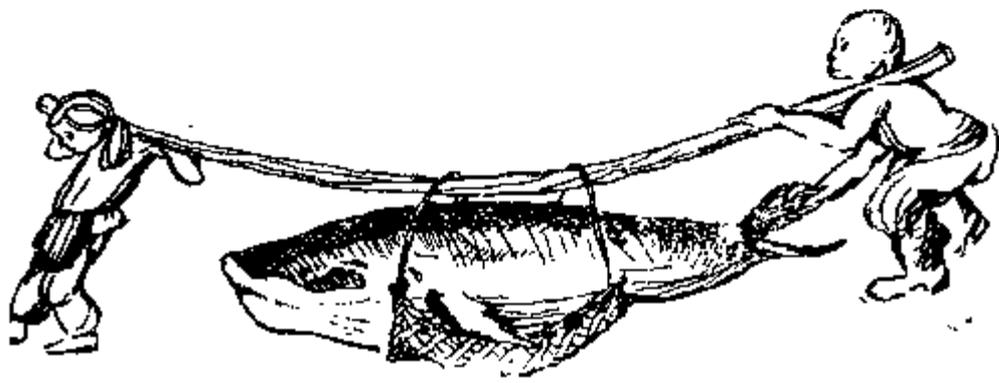
道：“你要干什么！”就一把抓住他的肩头。春夫猛地挣开，跑到门外，两手抓起房前的泥，胡乱地往家里扔。他没完没了地扔进来，弄得屋里到处都是泥，水壶也翻了，弟弟的半边脸上也全是泥。那天晚上，春夫就这样冒雨走掉了。

我的左手烫伤了，有一个星期的工夫都裹着用破布条做的绷带。只要没有了——对啦，只要没有了春夫——我对我心里起的这个念头，不禁感到害怕。“把他干掉吧，只要我一个人去坐牢就成啦，”二弟突然这么说。“唉，”父亲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大家都不吭声。沉默得叫人喘不过气来。只要把春夫杀死，自己一个人抵了命，其余的人就能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姐姐和弟弟的心里产生了这种一心想要从绝路里逃出来的念头。这个念头，在沉默之中一天比一天清楚地形成了。我们每天过的都是恐怖、暗淡的日子。

肥料工场老板的气色越来越好，也更加肥胖了。“喂，歌子！鲸鱼来了，鲸鱼来了！”在这样的喊声下，我们被老板派到船上去卸鲸鱼。新盖的鱼类加工场在鱼市场南面临海的栈桥旁边，要是买进来的鱼不在鱼市场上经过搬运组的手运上岸来，而是把船绕到栈桥旁边，由工人们直接从船里把鱼卸上岸的话，就能够省下一笔搬运工

人的脚力钱和搬运费。於是，我们男女工人都被派去卸鱼。

我们把鲸鱼放在竹兜上，用一种类似铁钩的东西钩住竹兜的前后耳，铁钩拴上绳子做成的绳套，再穿上圆木杠子，两个人抬着走。老板像一只大马猴，他在后边抬，我在前边抬。随你身体怎么好，扛这样的竹兜总归不是女人的气力能吃



得住的。我要不是每步都在腰上使足气力撑住的话，就会摇晃。我不能有节奏地、轻快地迈动脚步。抬后半截的“大马猴”仗着他一百八九十斤重的身体，也不管我抬得动抬不动，放开脚步就走。我要是跟不上后面的脚步，就一定会被冲倒。我使劲咬住牙关，腰上撑足力气，拚命往前迈步，油汗滴滴嗒嗒地直往下滴。男工人也分别合成几组，把鱼卸了，然后就动手去用盐腌。

“大马猴”这个人赚起钱来简直是精明到家了，像我们这样花钱雇来的人，他绝对不会叫你

歇一口气的，不是制肥料就是加工，他一样接一样地赶着你干。买进便宜的夏乌贼的时候就煮了再晒干，买进鲣鱼的时候就煮了晒成半干或者用盐腌，加工场做的就是这种活。老板还从四国^①招雇制鲣鱼乾的工人来制乾鱼片。我被逼着这样干，可是到月底算工钱的时候顶多也不过挣三千五百圆。就连这一点钱也由於一再预支，根本没有完全拿到手的时候。穷日子过起来是莫名其妙的。米刚吃光，一看黄酱、酱油和盐也都一起用完了。到手的钱买了这些东西以后，就又光了。再加上到处欠着帐，拿到的钱全用来还帐也不够。三弟用领到的奖学金交学费，晚上靠编织滤紫菜用的筛子挣几个零花钱。作木匠学徒的二弟已经能够挣点零用钱了，可是他干活得使自己的家伙。结果，一家五口全靠我一个人。不管怎样拼命干，总还是没有把握吃饱。

这一年的风雨季节特别长，梅雨下个没完。这种年头，七月初是连檐房最住不得的时候。阴沟的水一溢出来，就跟厕所和马房的脏水渗在一起，把这一带地方弄得到处是水，都成了沟。臭泥浆给太阳蒸得热腾腾的，臭气简直要把人的头熏得发昏。苍蝇到处在飞，蚊子白天也来咬

^①四国是日本四大岛中的一个，在日本南部。

人。有一天，吃过晚饭收拾完家伙以后已经八点多了，我想把第二天的米淘出来，可是打开米柜一看，竟是空的。怎么搞的，不是昨天刚买的米吗？——唔，又是春夫干的，我的心冷了半截。

“爸爸，春夫今天回来过吗？”

“回来过，呆了一会儿，马上又走啦。”

“他把昨天刚配给下来的大米都偷走了。”

“哎呀，这家伙！”

大米是用昨天才预支下来的工资买的，要吃一个星期呢。只不过是昨天，我快快乐乐地把口袋里的大米倒进米柜，感到了一个星期可以不愁吃的轻松的心情……当下我就跪在地板上，连气都坐不起来，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厨房里没有电灯，黑暗中，成群的蚊子嗡嗡地叫着飞袭过来。

……明天的米怎么办呢……事情太突然了，我一时也想不出好办法。穷人就是穷人，虽说应该互相帮助，可是在现实情况下是办不到的。大家都穷，可是大家都尽可能对别人遮掩自己的穷。看到别人穷就高兴，看到别人生活过得好一些就眼红。而且各家都有各家的困难，不能说自己没着落，就随便向人借大米。

已经九点多了。二弟一直在廊子上修理木匠家伙，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

想来想去，我决定到上坡一百多米远的朋友

家去借半升米来。这个朋友三年前就当了“伴伴儿”，生了一个黑色的混血男孩，住在近处的飞机场，她的寡母和三个弟妹全靠她一个人寄钱回来维持。

“我出去一下，”我这样说着走下泥土地的时候，春夫却连脚步声也没有，突然走进来了，他浑身一股酒臭，衬衫的前襟敞开，汗涔涔的。父亲和弟弟们什么也没有说，默默地看着。春夫脱下沾满了泥浆的鞋子，马上就脱掉衬衫，在廊子边上伸直身子躺下了。我本来想就这样走出去，可是有点不甘心，就回过头来对春夫说：“你为了自己喝酒，就让我们大家饿饭。”

三弟听了我这句话，他的愤怒猛地爆发了，他骂春夫：“好呀，好呀，你害得我们好苦啊！我不把你当哥哥了，你滚出去吧！让姐姐一个人受累，像什么话！”

春夫马上坐起身来。

“你敢对我这样说话！咱家的米我拿去卖，有什么不对？好没规矩——”

春夫突然站起来，一把揪住小弟弟背后的衬衫。嗤啦一声，衬衫撕破了。春夫的手没头没脑地插打。三弟也拚命抵抗。

“别打，别打呀——”

我像祈祷似的把手合在胸前。正在这时候，

一声不响地在廊子上修理木匠家伙的二弟，突然站起身来，拿起锤子，在春夫的脑袋上砰的就是——一锤。

“哎哟！”春夫两手按着挨了打的右半边脑袋，就这样向前栽倒了。在这一瞬间，大伙都站在那里发了愣。锤柄顺着木纹斜着折断了，铁锤头连着折断了的木把落在草席上。这是一眨眼工夫的事。不知道这样又过了几秒、几分钟。二弟放声大哭，使我也清醒了过来。他伏在草席上呜呜地哭着。三弟也哭了。父亲默默地抱起春夫，把他放在破旧的蚊帐里，然后一动不动地坐在旁边。

弟弟们的哭声止住了，家里静悄悄的，一种可怕的寂静。我们的心又渐渐安定下来。——杀……死了……这样就行了。样样事情都照应当的样子进行着……

二弟悄悄地说：“只要我一个人坐牢就行了，谁也用不着担心。”

他抱着两膝，在廊子上蜷着身子。过一会儿，父亲从蚊帐里出来了。

“只好去报告警察吧。”

大家都不吭声。父亲一个人出去了。过了一阵，他把隔壁赶马车的大爷领了进来。大爷和父亲一起在春夫旁边坐了一会儿。三弟脸朝天躺

着，两眼死盯着顶棚上的一个地方。

过了一会儿，父亲和大爷从蚊帐里出来了。

“该怎么办呢？”父亲说。

“我想等一下，看看情形，再报告警察好一点。”这是老大爷的声音。他们两个人低声谈了一会儿，大爷回去了。我们到天快亮的时候才钻进被窝里，好像放下心去似的睡熟了。

春夫到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恢复了知觉，第三天早晨就从被窝里爬了起来。说也奇怪，他竟像没事儿似的一骨碌就起了身，一声不响，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当天傍晚他又出去了。

我家的顶棚很矮，不大通风。到了炎热的八月，就更加气闷。父亲经不起热，连饭也吃不下。可是家里根本没有馀钱可以去买合他口味的东西

一天傍晚，我在回家的路上偶然遇到从前的一个同事。我们谈起“大马猴”，也谈起彼此的生活情况。那个人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听说K加工场正在招募到北海道网走去干活的工人。我一听见大概能挣很多钱，就决定去问个明白。

第二天，我直盼着吃午饭的时候到来。我匆匆忙忙吃完了饭，就跑到离我干活的地方差不多半公里远的K加工场去。走进工场，我慌慌张张地

讲明了我的来意，就有人叫我到那边的办事处去打听。办事处里有一个像老板样子的胖胖的男人，年纪大约四十五六。

“跟您打听一下——是您这里在招到网走去的劳工吗？”

那个男人大模大样地点了点头，像检查似的从头到脚把我打量了一番，说道：“是你要到网走去吗？”

“是的——因为——我很穷，想去挣点钱，您说大概可以挣多少钱呢？”

他对我急躁地提出的这个问题，显出吃惊的样子，笑了一笑说：“噢，是你呀，像你这样的好身体没问题。不管怎么说也是好体格，体重总有一百二十斤吧。噢，今年多大啦？”

“虚岁二十二了，”我心里急着想打听到能挣多少钱，就草率地回答说。

“嗯，岁数也合适。挣钱就要仗着年轻。至于钱呢，应当说不算少。这是一家跟我们有交易的大型加工场，今年头一回委托我们来招劳工。因为考虑到将来还要再招，所以决定工钱给得比别家要格外多些。除了管饭以外，每月至少五千元是不成问题的。”

管饭以外每月还有五千元，要是把它全都寄回家去的话——我急于要使家里摆脱这种困苦的

生活，叫大家过个好年。

这个老板看来人很不错，我自然也就相信了他的话。我听他讲明白了大概的情况：到网走去的火车票由工场给买，被子要自己带，路上伙食自己管等等。他又说，明天通知动身的日子，这样我就出来了。

我满脑子想的净是到网走去的事。“喂，别发呆呀！”一个骑车的人差点儿把我撞着，他这样说着就从我身旁闪开，骑过去了。我在中午灼热的马路上跑着回到工场，不过对谁也没有讲，就动手干起活来。我回到家里以后觉得难以开口，也终于没有说出来。

第二天我照常去干活，回家的时候，到前天去过的办事处去一问，说是昨天接到了电报，由于鱼源的关系，预定的计划突然提前了，决定后天下午一点十八分在S站搭车出发。同时，办事处的人又交给我一张从S到网走去的车票。

这一下，事情可急了——我有点吃惊。虽然下了决心，可是一旦要到陌生的地方去，心还是放不下来。我想：这算什么，跟别人一样好好干活就行了。于是又放了心。我对自己的劳动是绝对有自信心的，我从小就相信，不论到哪儿，凭我这身体总能把活儿干得挺出色。这种自信心排除了我所感到的一切不安。

吃过晚饭，我拿定主意把到网走去的事谈了出来。父亲气得要命。

“女人哪有到这种地方去的。出外挣钱的女工，谁也保不住清白，”父亲就这样提出种种理由来反对。我想，父亲的病情忽重忽轻，对他说来，最叫他担心的就是放我出门。所以我说：

“干三个月一定回来。”

这样，我就用只去三个月为理由说服了父亲。

“我们欠下米店不少的债，小铺的钱也该还了。爸爸，要是我每月寄五千元回来，过个不欠帐的年多好呀！”

我的衣服除了身上穿的没有一件可换，于是就先把衣服洗洗补补，料理一下零碎的事情。我把暗淡的电灯拉下来，一边拍那在脚上和脖子上叮着的蚊子，一边拚命做针线活。我收拾出两条旧围裙，两条旧束腿裤和一件上身穿的有点像战时标准服的短衣，每一件都用不同颜色和花样的布打上补丁。

第二天，为了多得一天的工钱，我还跟平日一样到工场里去干活。快下工的时候，我向老板辞了工。老板扣除了我预支的钱，把到那天为止的工钱算给我，还给了我五百元的饯别金。伙伴们也每人送我五十元。一共有二千多元，我全都

交给了父亲。我还告诉他，到了网走以后要尽早预支些钱寄回来。父亲也不再反对了，只是默默地躺在那里。我一个人打好铺盖卷，把洗补好的衣服包起来，也没有忘记带上缝补衣服用的各种布条。我的行李统共只有一个包袱。

十点多钟，春夫突然回来了。自从那件事发生以后，春夫就不大回家，就是回家，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乱来了。

我对他说：“明天我要起身到北海道网走去干活了。”他带着怀疑的神情睁大了眼睛，一句话也没有说。过了一会儿，他在厨房喝了点水，马上又出去了。他走到门口回头问道：“什么时候动身？”

我就回答说：“一点十八分从S站出发。”

动身的日子到了。我很早就爬起来煮了一满锅饭。因为要坐三天火车，我做了十个饭团。虽然已经到了八月底，天气还热得厉害，所以我在饭团里放上乾梅子，蘸上黄酱，烤到快要糊了的程度。正在这时候，春夫进来了。他手里提着一大条鳊鱼，简简单单地说道：“跟朋友要来的。吃完再走正好。”

我定睛望着春夫，眼睛忽然迷糊了，春夫的脸看上去也歪歪扭扭的。

“嗯。”我要是再说一句话，泪水就要涌出

来了。

父子五个人在一起吃了早饭。我们用大盘子满满地盛了鲜美的鲚鱼片。谁也没有讲话。

吃完饭，弟弟们都出去了，只剩下父亲和我两个人。我想等我走了以后，家里只剩下几个男人，所以我连厨房都仔细收拾好了。我这样张罗着，时间就到了。

“那么。爸爸，我走了。”父亲听我这样说，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就走到背阴的地方去了。我提着一个包袱，带了三十九零用钱，离开了家，谁也没有送我。

K加工场的老板已经在S车站等着，出门干活的女工连上我是三个，另外还有五个男工，大伙都在那里集合了。大伙都有家里人来送行。临开车的时候，三弟跑来了，他是从学校里赶来的。“弟兄们可千万不要打架啊！”我这样再三地嘱咐他。

火车已经走了几个钟头？过了些什么车站？我根本没有想这些事情。我离开家的时候，父亲躲在背阴的地方，连门口都不肯送。当时父亲也许在哭，他的身体好像衰弱得多了——春夫这家伙，要是他稍微回心转意。愿意作个人多好呢。——我的心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同样的事情。

从窗口斜着射进来的夕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沉了下去，闷热得难受的车厢里，也吹进了一阵阵清凉的晚风。我们这一伙是分散着坐的。领队的是一个四十来岁、身体很结实的男人，大伙都管他叫“领队先生”。在我对面那排的窗边坐着一个女伴，后面隔一排的座位上也坐着一个。靠窗的女伴有二十五六岁了，模样长得很端正，奇怪的是没有鼻子。脸盘当中只有两个鼻孔。

这是我生平头一次坐火车走远路，可是并没有什么可以使自己心情愉快的东西。我独自想着：要到网走去了，不知怎样总有点怕，只听说那里有监狱，可是网走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于是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没关系，哪怕是很可怕的地方，只要我比别人多出一倍力气，就不要紧了。”这样我又把凄凉不安的心情压了下去。

火车在黑夜的山野里奔驰，远处近处，微弱的灯光忽隐忽现。火车驶过铁桥时发出咯——咯的响声，铁轨单调地震动着。人们都歪歪倒倒地睡着了。我也昏昏沉沉地觉得困倦。已经离开家了，要是就这样永远离开了那多好……摆脱不开的贫穷，生病的父亲，二流子的弟弟，臭气冲天的连檐房——唉，这一切现在我都可以躲得干干净净了。在什么地方，是的，在什么地方不是有

类似“幸福”这样的东西存在吗？我仿佛觉得灿烂的幸福就在什么地方等待着我。不，一定在等待着我——随着火车咯噔咯噔的节奏，我的充满了希望的心也悠然地在晃动。

是他，是进先生。他曾经在加工场的门前亲切地跟我说过话。我一见到他，不知怎么脸就红了。“肯不肯跟我结婚？”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带着一本正经的脸色，令人有点害怕。当时我好像全身都颤抖了。是高兴吗？居然提起了“结婚”。不，我只是吃了一惊，一定是的。可是，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想，活在世上不管多么苦也还是好的。“我家哥哥娶嫂子的时候，可绝对不要他娶什么加工场的女工。”我还记得他妹妹说这句话时候的神情。……“哼，我是个没有念过多少书、从小就做工挣钱的女人，所以根本就不打算给您这种好门第的少爷当媳妇。您可别看错了人呀！”我好像对那个女人脸上啐一口似的顶撞了她，他这个妹妹大概是在什么女子中学念书。哼，就是日子过得比别人好一点，也不应该看不起人呀！唉，可是当时进先生在旁边低着头，满脸都是怪对不起人的样子。……

咕咚一声，行李架上一个挺脏的包袱掉下来了，声音响得里面像是包满了空饭盒。

“该死！”包袱掉在一个建筑包工商模样的

男人肩上，把这个刚好睡着了的人给打醒了。他皱了皱眉，把包袱放回行李架上，接着伸了伸懒腰，抱着两只胳膊，翻过身去又睡着了。

车窗大多是关着的。我轻轻地把玻璃窗打开了一道缝，夜晚的冷气马上吹了进来。我吓得赶快砰地关上了。不久，火车开到一个小站，这是我不认得的一个车站——大概已经过盛冈了吧，听说要在青森下车，也许快到青森了——我把头直直地靠在车窗和座位靠背之间的角落里，把一块有点汗臭的手巾盖在脸上，恍恍惚惚地打起盹来。

火车很愉快地摇晃着。进先生的面庞又出现了。我的确喜欢他。他认识我以前做工的那家加工场的老板，他自己开过一家铺子，战争期间烧光了，所以他在重修起新铺子之前，自己到那里去帮工。这件婚事是我自己放弃的。与其说是因为他妹妹说这说那，倒不如说是因为我跟他两个人太不相配，从各方面考虑都不会落个好结果才作罢的。可是我心里仍然忘不了他那样子——他那中等的身材、壮实的后脖颈，看见了就像会被吸住了一样。我跟他并肩干活的时候，总觉得很愉快。

在电影上出现的那种“恋爱”或者“爱情”（这是我一向认为不过像梦一样的东西），说不定就正是穿着破旧的束腿裤、有着一副可怜相的

我现在感到的心情吧。我怀着奇妙的心情，观察着自己被进先生吸引的心。

“阿歌真好，像没涂过油漆的木材那样诚实和温柔，”进先生看着我的脸说——哎呀，我以为是进先生呢，原来是你呀？哼，没有骨头的家伙，自己那样缠着我，可是遭到父母反对的时候，就连当面回绝都不敢，却把什么伯父支使出来……反正我是不能跟你这样的胆小鬼结成夫妇的。我连你的名字都忘了。啊，对啦，好像是叫武田。你是第一个对我提起婚事的。那是我十九岁上的春天，我也有过出嫁的念头。可是有用那种方式退婚的道理吗？自己鬼鬼祟祟地躲了起来，让伯父来出面拒绝。当然喽，只要说一声：“你父母没有工作，家里穷，姐姐弟弟都不争气，我不愿意娶这种家庭的姑娘。”那么我只好说：“是的，说得对。”就走开了。你那么紧缠着要跟我结婚，临了却连一句道歉的话也不对我说……

我心里充满了气愤，就在这时候，因为身子歪倒着很不舒服，就醒了过来。奇怪，为什么老作这种梦呢？结婚！结婚！这跟我没有缘分。我的家境不允许我去结婚，我得替家里干活。

窗外渐渐亮起来了。到青森的时候，天已经完全大亮。下了车我们立刻就搭上渡船，这是我

生平第一次看到的大型客船。人们在上面忙忙碌碌地走动。三等舱在船的底层，充满了油污的臭味，这间舱房像是个可以铺几十张草席的房间，用窄木板隔开，隔出走路的地方。我们八个人一起围作一圈吃早饭，我带的十个饭团只剩六个了。我一想到路途还远得很，就把饭团又包进包袱里。八点刚过，锣声响了，要开船了。唉，这一回确实是要到陌生的地方去了，打锣的声音使我更感到孤单寂寞。汽笛带着悲哀的声调飘向辽阔的海面，船悄悄地离开了码头。

差不多过了四个钟头，就到了函馆。我们立刻搭上火车，到达小樽的时候正是炎热的午后。那一天特别热。我在车窗口买了一根冰棍，被敲去二十元，使我大吃一惊，可是滋润的冷牛奶的味道非常可口。我身边只剩下十元了。

在小樽换了车。火车驰过辽阔的原野，驰过山地。北海道的风光对我是十分新鲜的。白桦木的丛林非常美丽，落叶松也跟内地松树的风味完全不一样。款冬的直径足有五厘米。要是把这种东西采去做菜，既不花钱又一定很可口——并且在那边的树林里捡干树枝，收入也一定不会少——看到这样秀丽的景致的时候，我仍然不免想到过日子的事，自己也觉得好笑。

我跟两个女伴渐渐熟了起来。那个怪可怜的

没有鼻子的姑娘好像早就跟领队的两三个男人熟悉了，他们都毫不客气地管她叫“缺鼻子”。她要是有了鼻子就好了，我越看她，越觉得她的脸长得很美。她好像本能地知道初见面的人关心的总是自己的鼻子，就说：“我还是个娃娃的时候，有一天爸爸妈妈都出去干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屋角里睡觉。妈妈回家的时候听见娃娃发出骇人的哭声，吓了一跳。一看：老鼠正在啃娃娃的鼻头哪，弄得满脸都是血。你说吓人不吓人！”

她轻描淡写地说着，好像是在把别人的事情讲给我听一样。

“多痛呀……”我说。

“哪里话，小娃娃懂什么呀……比痛更糟糕的是，为了这个鼻子，如今活到二十六岁，连个丈夫的影子还没有呢，哈哈哈！”她好像觉得很滑稽似的大笑起来。看来她是个性情直爽的老实人。

“总得想法补救一下呀！”另一个叫爱子的姑娘说。她是个有点傻气的姑娘，年纪最轻，只有十九岁。

“嗯，只要有钱，听说到S市的大学医院去，就会给你装上一个合适的假鼻子。不过说要花上四五万元呢——”

“四五万？”哼，一只鼻头够我一家人吃一年

的……”爱子说。大伙都忍不住笑了起来。爱子大概也非常穷，她说没有合适的被子，所以干脆没带。

“睡席子也行，总可以睡的，”她很想得开。

我在夜车里睡得很好。天大亮了的时候火车到了北见站，在那里，我们又换了车。

这以后不久就到了网走。

那是离家后第三天的早晨，将近九点钟的时候。

工场离车站大约有十来分钟的路。我们走进去，看到那堆积如山的鱼，大吃一惊。大约有六个男人在那里干活。工场很宽大，包括大规模的鱼酱加工场和鲑、鲂、海扇等的加工场几部分，分设在炊事房和食堂的两旁。我们女工的宿舍在炊事房的楼上，隔着壁橱，那边就是男工的宿舍。为了把两方面隔绝，楼梯口和楼梯都是分设的。我们把手里提的行李放在屋里以后，马上被喊去干活。

先是制鱼酱。在椭圆形的鱼盆里，把鲑鱼、鲈鱼和比目鱼等的头部切下，切成两半。堆得山一样高的鱼，大家动手一搞，不一会儿就矮下来了。切成两半的鱼就放到那个叫作“水槽”的家

伙里，不停地放水冲洗，然后开膛。把鱼的血水洗净，冲掉臭味和多馀的脂肪，再经过一般叫作“压榨机”的机器一压，脊骨和别的大骨头就都脱落下来，只剩下了肉。把这些鱼肉接着放进叫作“搅拌机”的机器里搅成黏糊糊的泥。然后放在用机器转动的“臼”里，按规定的分量配好比目鱼肉和鳃鱼肉，拌上一定比例的淀粉、糖精、葡萄糖和盐。搅拌完了以后，放在“牵制机”上，用适当的火力烘制成为鱼酱。烘得要恰到好处，这正是领队先生显示本领的时候。女工也跟男工合在一起，干得不比男人差。“缺鼻子”尤其是剥鳃鱼皮的能手，她的本领是男人所不及的。而且她为人虽然很好，很老实，可是正像俗语说的，残废的人很固执，她干起活来真顽强极了。我除了在鱼盆那儿干活以外，主要就管“搅拌机”。制成的鱼酱就陆续装进箱里，用马车运走。

因为原料有限，制鱼酱闲下来的日子，我们就做海扇壳的打包工作。在工场旁边宽阔的空地上，贝壳堆得看不见对面。我们把这些贝壳装进草袋里，用台秤称过以后打包，装上马车。虽然已经到了九月初，白天在网走还是非常热，额头和脊背像烘烤着一样。

有时候老板也买进大量的海扇，放在大锅里

用开水很快地滤过。贝壳张开后，我们熟练地剥下肉柱，拔下周围的“韧带”，就这样把“韧带”晒干。可是肉柱得用盐水煮一会儿，摊在蒸笼上，在太阳下面晒好几天。很大的肉柱晒干后要缩小一大半。这是出口货，价钱非常高，老板怕有人偷，监视得很严。即使这样，我们还是在束腿裤的里子上缝了一块布，作成口袋，大家商量好，一点一点地偷到屋里，开心地分着吃。

女工一个两个地增加了，大部分都是当地住户的姑娘。工场里的伙食很坏，早上是一碗掺了大半麦子、盛得松松的饭，中午和晚上是土豆或者米粉团子。活儿相当忙，加班的时间又多，所以肚子饿得厉害。有钱的人就买零食吃。我和爱子把淀粉团起来偷偷摸摸地吃。不过我们有时候也买苹果吃。不管我怎么节省，每月也要花一千元左右的零用钱。

来到网走半个多月的时候，我收到了父亲的信。信上说生活很困难，哪怕是一两百元，希望也给他寄点回去。本来我不想刚来就预支工钱，可是想到家里吃都吃不上，就管不了这许多，马上到账房去借了三千元寄回去——听说我的工资每月是六千元。

一到发工资的日子，卖布的人就来了。十几

个女工好像爬上砂糖的蚂蚁似的，围着卖布的买这买那。连爱子——她没有带被子，我觉得她怪可怜的，就让她跟我合盖一床被子——也要买点什么便宜东西。只有我一个人什么也不买。——这算得什么，我又不靠外表吃饭——尽管我这样想，自然还不免觉得自己怪可怜的，所以每月两次卖布的人来的时候，我老躲出房间去。

炊事房的老大娘打水得走好一段路，我常常帮她打水，还给男工们洗衣服。工场里一共有十二个男工。我一想到家，就想起家里只剩下男人了，不知道他们的衣服是怎样洗，怎样打补丁的，觉得可怜得很，因此，对于离开家到这里来的男工，我就尽力照顾。我把他们十二个人的脏衣服一手包下来，白帮他们洗补。工人们在没有鱼买进来的空闲日子，常常一起去看电影，我就留在家里，摆下五个四斗桶，洗十二个人的衣服。

炊事房的老大娘老是这样说：“谁要是娶了像你这样能干的人当媳妇，才算有福气呢。”其实，我这个人很特别，一向就不能游手好闲地去玩耍，况且又想到一上镇就免不了要花点零钱，所以洗衣服对我来说决不是辛苦的事。

从十月份起，网走地方可以捕到许多鲑鱼。这个工场虽然是私人经营的，可是在网走也算是

数一数二的加工场了，尤其是鲑鱼加工，据说在网走要数第一。“一个来月的渔汛期间可以赚二百万元呢！”一连好几年都到这里来干活的一位男工人这样说。所以在捕鲑鱼期间，活儿多极了。白天做鱼酱加工的人，夜晚还不得不七个人一班轮流着做腌鲑鱼。我们也大量地用盐腌小鲑鱼。夜里已经很冷了，到晚上十二点多钟快干完活的时候，寒气从脚底下往上钻，冻得我浑身发抖。

十一月底，每天晚上都接着加班。有一个晚上，外面虽然没有刮风，可是雪不断地下着。我在炊事房的火炉旁边烤着冻僵了的双手。这时候一位叫佐山的二十四五岁的男工走过来，取水壶里的开水喝。

“好冷的晚上呀，北海道到底是特别冷。”我无意之中对他说。

佐山只是嗯了一声，就默默地坐下来。佐山是个腼腆老实的人，大部分男工都随随便便地跟女工们说笑，他却是很不引人注意的一个人。我替十二个男工洗洗衣服什么的照顾他们，有一些男工就也在工作上帮我种种的忙，可是佐山好像不是一个想得这样周到的人，他连话都很少跟我说。

他的性情就是这样，低着头，不断地把烤着火的两只手握在一起又分开，要么就搓弄着。呆

了好一会儿他才说：“阿歌，你肯不肯跟我交朋友？”

我吃惊地望着他的脸，他的脸有点红了，害羞似的向旁边看着。我马上想起了我喜欢过的进先生和背弃了我的武田的面庞。

——尽管他对我说起这种话，可是因为我穷，结果只是引起我难过悔恨的心情罢了。……

我这样想着，就紧紧闭了嘴唇。

“不愿意吗？”他说。声音虽然低，可是似乎很认真。

“你虽然这么说，可是我非常穷，没资格跟男人交际谈恋爱呀！”我冷淡地说。

入了十二月，海洋上就掀起风暴。海面上也漂来了冰块，这样，渔船就不能出去捕鱼了。于是每一家加工场都要在十二月半收工。

大伙都在做回家的准备，工场里显得很忙乱。可是我怎么也不想回家去。我不愿意回家。连我自己也说不清这究竟是因为什么缘故。病着的父亲，弟弟，这些都是我所挂念的、我所爱的人呀。

我想光把钱寄回家，自己就这样在网走干下去。我有男人一样大的力气，干什么活儿都不怕。我从小就养成了根深蒂固的信心：靠劳动挣钱。

在这种心情下，我收到了三弟的一封信。

“姐姐，你一定不会愿意回家来！光是让你一个人受苦受累，也难怪你要这么想——”来信是这样开头的。我吓了一跳。家里的人竟感到了我在想什么——三弟谈到父亲，说他的身体近来衰弱得厉害，他自己在高等学校也读不下去了，所以打算从第三学期起退学做工，或者就白天做工晚上进夜校；又说大家都准备过苦日子，无论如何要我回去，每一句话都露出感伤的情绪。我不管怎样也想让三弟继续读书，而且手足中间身体最弱的也是三弟，看来他不可能一边做工一边进夜校——总之，我就因为这一封信，决心回家去了。

十二月底的网走完全是一片雪的世界。孩子们在溜冰滑雪，非常熟练。马匹拉着雪橇来来往往，铃铛叮叮当当地响着。现在要回去了，我身上穿的虽然还是夏天来的时候那套衣服，可是只要把带来的破烂衣服都穿上，再套上罩衫，还可以对付过去，然而脚下光穿木屐可不成。于是，我被天荒头一次到镇上买了点像样的东西：我花了六百五十元买了一双雪天穿的木屐，还买了一条最便宜的围巾。干了整整四个月的活，给家寄了两万元，可是由于加班次数多，手头还剩下八千多元。

在靠近年底的二十六日，我们终于从网走动身回家了，每人得了两大条咸鲑鱼。傍晚七点半，搭上火车的除了我们来时的几个人以外，还有比我们早来两个月干活的六个男工——其中有佐山——总共十四个人。

火车走了一个多钟头就到了北见站。外面刮着猛烈的暴风雪，车窗的玻璃上覆满了一层霜，看不见外面。车里也冷得厉害。我虽然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了，毕竟是夏天的衣服，还是冷得受不了。第二天晚上到了函馆，我浑身都已经着了凉。船本来预定在夜里一点钟开，因为海上起了风暴，延到早上四点钟才开。

船在严冬黑暗的津轻海峡里行驶。船底的三等舱发出叫人恶心的油臭气味，我伤了风，觉得晕船，就走到二等舱的过道里。我正坐着打盹儿的时候，听到有人喊“歌于”，就醒过来了。

佐山站在那里。自从那天晚上起，佐山就不显眼地从各方面照顾我。他那严肃到固执程度的性格和做事的态度，重新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对我的关切，也渐渐地使我发生了好感。

佐山在我身边坐下来，谈起他自己的种种事情。他的家在内地的农村，从S港搭火车要走三个钟头，他是一个小农家的次子，在S市的水产职业辅导所毕业。他说话的态度很沉静，尤其他

那一对眼睛非常真诚。

“咱们马上就要解散了，可是我希望今后咱们彼此不要失掉连系，交交朋友，你的意思怎么样？——我打算暂时在S港干活，”他说。

由于过去两次痛苦的经验，我的心已经变得非常僵硬了。——佐山要是知道了我家里的情况，他也一定会厌弃我的，当然，谁都会这样的。——我什么话也没有回答。



佐山又说：“将来我还想跟我父母讲讲，跟你结婚。”

他的话几乎把我打动了，可我还是把自己抑制住，没有作声。佐山也沉默了片刻。——就这样跟这个人分手吧。——这样想，在我的确很痛苦，很难过。我把家里的事情统统告诉了他。佐山默默地听着。我说完以后，他思索了一会儿，然后郑重地开了口。他的语气很坚决。

“说到穷，谁都是一样。你过的是多么贫苦的生活，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可是人生并不能事事都如意。穷人连恋爱都不能讲，没有这样荒唐的事！越是穷，一道过苦日子，彼此越是能够真正了解；有苦一块儿受，有福一块儿享。要是不这么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过，咱们穷人不就一点幸福也没有了吗，你说呢，阿歌？”

他慢慢地谈着，好像要把每一句话都深深地打进我的心坎。两滴泪水掉在我那冻得满是裂口的手背上，闪出一点亮光；细微的裂口里，到处都渗出血来了。

我的心好像燃烧得很热，震撼得很厉害，可是我还是不愿意屈服。于是我对他说，我的境遇没有一般的姑娘那样自在，父亲身体很弱，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死掉；他死了以后，我得把小弟弟培养成人。

“我已经拿定主意，一定要替父亲照顾弟弟，那么一来，我想谁都会讨厌我们家了。到那时候怎么办呢？”

我认真地逼问佐山。我这样坚持，是出于不愿意再被欺骗的悲哀心情。

佐山静静地想了一下，说道：你要是作了我的老婆，你的弟弟就是我的弟弟了。只要我的身体结实，我就要尽力照顾他。”

海上波涛汹涌，船摇摆得很厉害，可是我们连这个都不理会，只顾谈心。留神一看，天亮了，青森的港口已经展现在不远的地方了。

我们在青森搭上火车。来的时候夜车经过的地方，现在在早晨的阳光里眺望，越发显得新鲜明亮。同样的火车旅行，来的时候因为心情暗淡，睡不着觉；这次和佐山面对面地坐着，就很快地度过了。我甚至觉得有点奇怪：这种心情就是“幸福”吗？

一连坐了十二三个钟头的火车，我们在晚上十点钟左右到了S站。两个弟弟在车站上接我。一到家，父亲把火盆生得旺旺的在等着呢。我跟大家谈网走的情形，一直谈到夜里一点多钟。接着，我交给父亲七千五百元。快要过年了。

在我出门的期间，那么胡闹的春夫竟变得很老实了。他住在S港西南部的一个朝鲜人村落里，

帮人做麦芽糖，有时候也抽空回一趟家。

我们虽然什么都没有，还是过了个快乐的年。佐山也来玩过一两次。可是我在北见附近得的伤风怎么也没好利落。这四个月当中寄给家里的钱不算少，可是都还了米铺和别的方面的债，还有向放高利贷的借的钱，所以我回家以后仍然不能长时间闲着。这样，过了七号，我马上又到熟识的加工场干活去了。

父亲还跟平时一样咳嗽，可是食欲显然减少了。过年以后，他连晚饭也不吃，只是喝一两瓶汽水；我为了挣出额外的喝汽水的钱，开始编紫菜筛子，每一只可以挣三元。我白天在工场做工，晚饭后就跟三弟两个人一起干到十点多钟。我们把细芦苇排起来挂在木架上，用两线仔仔细细地编。一晚上大约可以挣到四五十圆。

父亲一天比一天消瘦下去，我再三劝他去找大夫看看。他每次都说，“气喘病，等天暖了自然就会好的！”

“不管怎么说，钱总是头一个问题。”这样，他怎么也不肯找大夫看。正月里我每天到加工场去做工，可是父亲说他身体非常不对劲，让我暂时歇工在家呆些日子，我就把这种情况向老板说明，从二月起歇工了。

从这时候起，我得靠编滤紫菜用的筛子来挣

跟在工场干活一般多的钱了。所以我每天从大清早一直坐着编到深夜。佐山来的时候，编织的手也不能停下来。佐山去找了民生委员，从市公所那里领了医疗券，说是无论如何也要找大夫看看。我对父亲讲起这件事，可是父亲说：“我在市公所干了七年，很知道这种情形：要是求官厅照顾就会被大伙儿看不起，也被他们笑话。反正我也活不长了，还是不要去丢这个脸，乾脆就这样死掉了吧。”

我吃惊地望着父亲的脸。

父亲渐渐地不吃东西了，光喝汽水，每天喝上三四瓶，汽水钱每天就要一百多元，所以我就拚命地编筛子。为了让父亲多喝上一瓶汽水，三弟在晚上也和我一起编，两个人甚至舍不得去睡觉。尽管这样，钱还是不够用。可是不论多么困难，我也难于开口向佐山借钱，生活就这样一天比一天困苦了。

街坊们有时候也来探望。遇到这种时候，父亲就把脸蒙在被窝里，说是：“已经见好了。”二月十一日的早晨，我无意之中发现父亲的脚肿得圆滚滚的。我去打水的时候，在公用水龙头那里遇到隔壁的大娘，就把父亲的情形对她讲了。

她说：“要说呢，一般人都这样讲：要是病人的脚发肿，把脸藏起来，那就是病重啦，不想法

请大夫看就危险了。”我马上就跑到坡上不远那个当“伴伴儿”的朋友家里去，说明了原因，借到三百元。于是我没对父亲说，就把大夫请来了。

大夫看完病，打了针回去的时候，我追着向他打听父亲的病情。出人意外，完全出人意外，大夫说父亲患的是严重的肺病。我一时吓呆了。大夫还说，看样子很难再活过一个星期。

肺病！父亲患的是那可怖的肺病……他本人和我们都还以为只是气喘病呢……所以食具都是在一起合用的，被子不够盖，也是大家挨在一起睡的。三弟早就一直跟父亲盖一条被子。自从那天晚上起，就让父亲一个人睡六铺席的房间，我们睡靠门口的四铺半席的房间，把食具也分开了。大夫曾嘱咐我们买石炭酸水，可是我们没有钱，只好把要洗的衣物分开。

第二天，父亲说他有话要对佐山讲，叫我去找他来。佐山当时住在他做工的加工公司里，我就冒着冷风跑去找他。正是中午休息的时候，他来了。父亲看见佐山很高兴。他说：“歌子到那边去一下吧。”

他们两个人在裱褙那边低声谈着。我不知道他们谈的是什么，可是脸有点发热。我从网走回来以后，家里的病人的贫困的情况还跟从前一样，

家里也一点不比从前快乐，可是我自己却比过去活头大多了。看护病人，干副业，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同时心里某一个角落里总留着佐山的面影。正是这个面影支持着我，安慰着我；我一想到他，受什么苦也不在乎了。他随时都在我的身旁。

过了一会儿，佐山拉开被褥走了出来。他说时间来不及，一边赶忙穿鞋子。我跑过去的时候，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千元的票子，悄悄地塞在我的手里，叫我给父亲买点他喜欢吃的东西，就跑出去了。父亲咳得很厉害，我把他胸口上的被子掀开，他慢慢地又安定下来。

“让你受了这么多日子的累，真是过意不去。我已经活不到一个星期了——”父亲这样说，我当着他的面，忍不住涌出眼泪来。

“爸爸，不要讲这种丧气话，赶快好起来吧。学木匠的弟弟过不多久也要满师，就能独立了……”

父亲打断了我的话，说道：“唉，我早就知道自己是要死的。你呢，在我死后过了七七，可要跟佐山结婚，好好地过日子呀！”

说到这里，父亲又咳了起来。也许因为刚才一直不停地说话，他太累了，好像很痛苦。我给他擦去额上的汗水，想让他静静地睡下。我刚站

起身来，父亲又在背后喊住我。

“别忙，在这儿坐下。——佐山真是个好汉子。今天我已经跟佐山正式说妥了你的事，所以我能够安心地死了。你一直受了二十三年的苦，从此你们可不要吵架呀，两口子要好好地过，但凡是老实的人，一生起气来就不得了啦，”父亲说。接着，父亲在痛苦的咳嗽的间歇，断断续续地谈到：大弟、二弟已经能够自食其力了，关于最小的弟弟，他已经写好信给“木娃娃叔叔”，托他接去照管——这位叔父是父亲的弟弟，从小就被送到S村附近做“木娃娃”的工匠那里去当学徒，后来自立了。在长期的战争中间，那个叔叔过得非常苦，可是战争结束以后，“藏王木娃娃”的生意好转了，他的生活也还过得去。在盂蓝盆会和过年的时候，他总给我们寄点钱和衣服之类的东西来，因此我们都管他叫“木娃娃叔叔”，对他怀着一种亲切的感情。父亲还说，春夫已经能够认真干活了，可以放心；不过假使又有变化的时候，怕没有人照管，所以他把将来的事情也已经托付给佐山了。父亲把要说的话都说完以后，就无力地闭上了眼睛。他的呼吸又短又急促，痛苦地呼呼喘着。

傍晚，我等三弟回来以后，立刻就上街去，买了些认为父亲爱吃的各种吃食。我想，父亲也

许没有挽救的希望了，哪怕买一点好吃的东西给他，也算是尽尽孝心。我买了些罐头、酱菜、橘子、鸡蛋等等东西，佐山给的一千元也就不剩什么了。吃晚饭的时候，我马上把这些东西都端了上来，可是父亲差不多没有沾筷子。我失望极了。父亲光喝汽水——喝了三瓶。

又过了两天光景，“木娃娃叔叔”和住在福岛县的姑妈，收到了弟弟寄去的信，知道父亲的病严重，都来看望了。叔叔问父亲想吃什么，父亲说要吃面条，于是姑妈马上给他煮了，父亲很难得地吃了三小碗。叔叔他们都说，能够吃这么多，身子一定还算硬朗，也许还能支持到秋天。他们住了一夜，十六号午后，两个人都回去了。不一会儿佐山来了。他说因为是旧历年，所以要回乡下住两三天，也马上就到车站去了。

当天傍晚，春夫回家来住。他跟父亲说，做朝鲜麦芽糖有时候要干到天亮，弄得很疲倦。春夫很早就睡下了。那天晚上我跟三弟编筛子也编到十点钟就停了手，立刻睡下了。刚睡着，就听见父亲隔着裯榻喊：“歌子，歌子。”我以为父亲想喝水，就起来走过去。他说：“气闷得非常难过，最好请大夫来打点舒气的针。”父亲一边说，一边痛苦地挣扎着嚷：“难过呀，难过呀。”我想，也许让他换个姿势会好一点，一摸父亲的胸

口，烧得滚烫，无意之中看见他的背，竟像只三色猫一样出现了一大片黑色的大圆斑点。

我吓得赶紧把弟弟们摇醒，叫春夫去喊姐姐，叫二弟去请大夫。父亲越来越难受，不时地用脚把被子踢开，蜷着身子呻吟。我们焦急地等着大夫来。我简直一点也没有办法减轻父亲的痛苦。后来在稍微轻松一点的时候，父亲把手伸到枕旁，拿出一张千圆的票子。

“这是人家来探望我的时候送的钱。我就要死了，拿去添着用吧，”说着就把票子递给我了。

大夫好不容易才来。打了针以后，父亲略微安静了一点。大夫说，顶多只能保得住两个钟头，就走了。姐姐背着娃娃，跟姐夫一起踏过满是积雪的路赶了来，头上肩膀上全是雪。过了一会儿，父亲又痛起来，脸上渗出一层油汗。他推开枕头，乱抓胸口。我们急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父亲痛苦的情形真使我们不忍正眼去看他。在痛苦中，父亲摆摆右手，望着我的脸说：“我没有什么要说的了。”又过了二十分钟，他就死了。

我站在那里呆呆地凝视着父亲的遗容。姐姐和弟弟们围着父亲哭了起来。父亲受了那么多苦才死去，脸上却又温和又安详，一点也没有留下

痛苦的痕迹。这时候，正是半夜两点钟，外面下着稀有的大雪，夜越来越深了。冬天的夜晚是漫长的，又是那么毫不留情地黑暗。曙光迟迟地还没有射进山后这排被雪封住的连檐房里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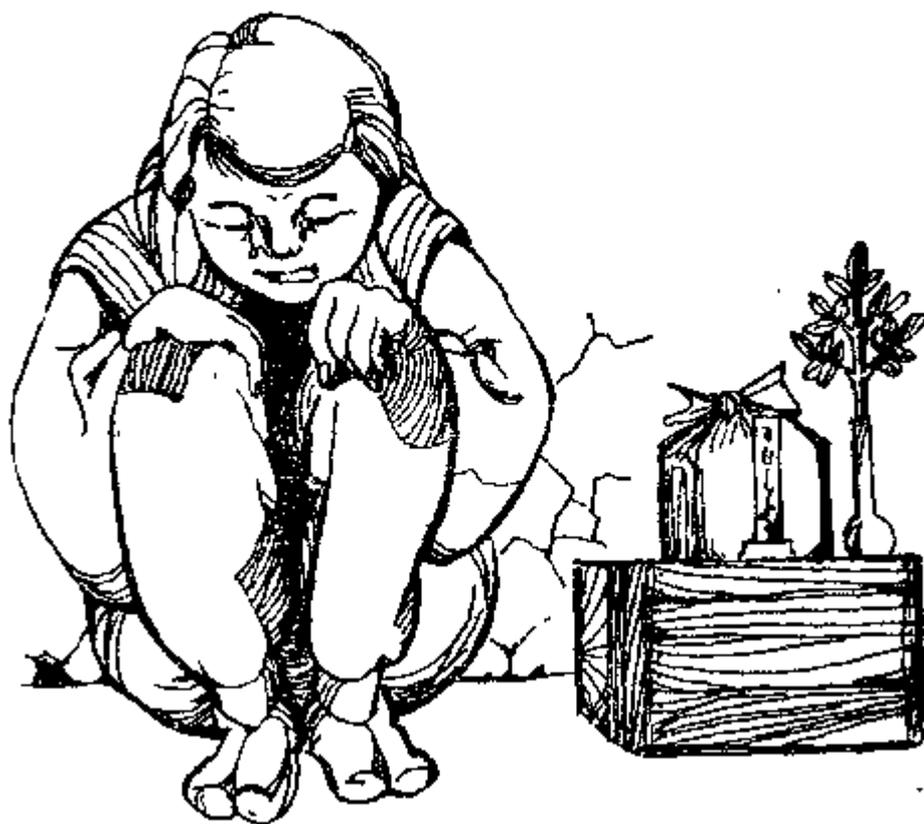
四 遥远的春天

葬礼举行完以后，亲戚们都陆续回去了。阴暗的壁橱角落里隔好了一座小小的神龛，父亲的新牌位在那里朦胧地现出一点白色。

“爸爸现在一定无忧无虑，什么痛苦也没有了呵！”我无意之中自言自语地说。爸爸死的时候那副安详宁静的面容又展现在我眼前了。他那张似乎受尽了人生的痛苦才得到解脱的脸，使我感到很气馁，不禁心情懊丧起来。

“是呀，说什么人死了以后下地狱，可是咱们穷人现在还不就是在活地狱里。……”当木匠的弟弟叹了一口气说。

自从像逃跑一样离开S村，到父亲去世，我们在这个连檐房屯里已经住了十多年。在这些年当中，尽管有程度上的差别，家家户户都普遍地遭到了不幸。我们隔壁赶马车的大爷家里的大娘得了急性肺炎，很快就死掉了。隔一户那家的主妇是个还不到四十岁的人，由于怀孕期间还得在



加工场站着干活，不知是胎儿下坠还是受了凉，一天夜里起来上厕所，要从后门出去，一只脚刚迈下泥土地，胎儿就突然掉在堆在那里的柴禾上了。婴儿娇嫩的皮肤初次触到外界空气，可怜就被柴禾扎伤，掉下来几个钟头以后就死了。那个母亲由于当时流血过多，害了心脏衰弱，躺了两个多月跟着也死了。住在这家后面的一家，户主是个渔夫，船靠岸卸鱼的时候，铁缆索缠住了他的右手，胳膊肘被绞碎，好不容易才请大夫接好，可是右手不能灵活地转动，手腕和指头都僵硬了，变得十分难看。从那时候起他就不能打鱼了，只

好上山去干活或者做土木工。

这家对面的街坊是在搬运组做工的，主妇得了子宫癌之类的病，走过他家门口就闻得见可怕的臭气，可是孩子们不知道病人的心情，故意捏着鼻子跑过那家的门前，大声喊：“好臭好臭！”我想跟那个躺了好几个月的人说说话，进去一看，已经不是讲话的时候了：病人的脸说不清是青是黄，像蜡一样，露在被子外面，呻吟着。又过了三四天，她就死了。

对面靠尽头的一家，听说户主得了脊髓溃瘍，就靠他的老婆和十六七岁的儿子干活吃饭。我有时候从他家门前走过，看见他腰部以上的脊骨已经一点也弯不过来了，还那么坐在泥土地上，垂着眼睛用斧子砍柴禾。他这种古怪的姿态又是附近男孩子们天真的嘲笑的对象。

另外，还有的人家儿子得肺病死了，也有的姑娘大概是受了父母梅毒的遗传，生下来就是白痴。我发现这一带家家都在各自的灾难里生活。

佐山还不知道父亲已经去世，我们办完丧事的第二天，他从乡下来了。他一进门，唉呀了一声，马上就知道父亲死了。我刚一跪下，眼泪又涌了上来，呜咽着，这是重新勾起来的辛酸的泪水。要不是看到了佐山，我也许不会哭得那么厉害。

过了一会儿，佐山轻轻地拍着我的肩头说道：“父母早晚是要分离的——我爸爸死的时候，我也才十九岁。”

“爸爸真可怜——”

佐山的手轻轻地压在我的肩上，我越发感到父亲孤苦伶仃，哭得更厉害了。

停了一会儿，佐山镇定地说：“爸爸一辈子过的都是苦日子。可是，阿歌，要是咱们俩从今以后幸福地生活下去，死去的人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佐山又凑近了一点。

“我很穷，活也干不好，可是我要使出全部力量来叫阿歌一家人过得舒服一些。好吧，不要哭了——我已经回家跟我妈谈过了。她说，到了春天把那位姑娘带来看看吧。哈哈，到时候咱们就一块儿去吧，好不好？”我正趴在那里哭着，佐山却凑近了我的脸对我这样说。他那温暖柔和的呼吸，使我全身都充满了喜悦。

又过了两三天。虽然快到三月了，早晨水桶里还结着一层硬冰。我把父亲的被子衣服之类完全收拾起来以后，屋子就空空的令人起一种冷冰冰的感觉。可是还不只是感觉，是真正一阵阵感到寒冷。一到下午，我的脊梁上就莫名其妙地嗦嗦发冷。我随手拿起衣服，一件一件地套上，

这时候身上才感到有点热了。我想到自己该出去到什么地方干活了，可是不知怎么身体总有点不对劲，呼吸感到困难，接不上气，全身懒洋洋的，就怕动弹。我想也许是看护父亲累的，可是夜里睡不好觉，醒来的时候，一阵子不安像闪电似的掠过我的心头。使我很害怕：我是不是也得了肺病呢？

佐山每天都来看我。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就没有跟他提起。可是后来越来越感到不安，就在他趁工厂午间休息跑来看我的时候，把这种情形对他讲了。

佐山说：“我想也许是看护病人累的，不过还是先请大夫仔细看一下的好。”

“可是父亲的丧事还是‘木娃娃叔叔’和姑妈凑钱办的呢，哪儿有钱请大夫……”我说。

“话虽这样说，可是什么也代替不了命。到镇上的大夫那儿去看病得花钱，到保健所去就好了。明天我歇工，我带你一起去吧，”他说。

第二天，好久以来第一次放晴，也没有风，佐山就领着我到保健所去了。保健所里乱哄哄的，挤得厉害。等了一小时才轮到我。

“那么，当初你父亲患肺结核，到死都没有去看过大夫，一直跟家里人在一块儿过的，是不

是？”

“是的，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他是肺结核——”

“啊哟——真糟，那么被子和碗筷也是大家混在一起用的吧？”

“是呀，直到他去世以前一个星期左右才分开的。”

“啊哟哟，这样一来，保健所可真丢人了，”大夫回头看看长得挺伶俐的护士，苦笑道。

有生以来头一回照了透视像，我有点害怕，可是比普通照像还简单，一下就照完了，使我感到出乎意外。大夫还在我胳膊上抽了一点血，说是要验血沉，叫我等一会儿。一切都办完以后，我走出诊疗室，看见佐山等在那里，一脸担心的神情。

“怎么样？”

“嗯，还不知道呢。说是叫我再等一会儿，等弄清楚检查的结果再走。”

我们俩在椅子上并肩坐下来，人们不断地出出进进，不知道他们是有什么病还是有什么事。

大夫会怎么说呢？我很感到不安。可是还有一种感情压倒了我的不安，那就是我生下来头一回感到自己被爱情包围住，我不由得陶醉在里面了。母亲的爱已经融化在我全身的血液里，就是

父亲的爱也比爷爷、奶奶和哥哥的爱，感觉得都更为强烈，更能引起我悲痛和温暖的回忆。可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跟佐山仅仅才认识了两三个月，他的爱怎么就把我以前的爱都冲淡了呢？我甚至觉得，我在认识佐山以前没有被任何人爱过，而是孤零零地活过来的。他这种爱情似乎是光明的、灿烂的、温暖的。

“还没有轮到，病人太多了啊。……阿歌，我妈为咱们的事高兴极了。我真想早点把你带去，”佐山悄悄地对我说。

“哎呀，可是我连一件衣裳都没有呢，”我不禁笑起来了。

“那算什么，去以前我要给你买的。”

“山田，山田歌子！”

“有！”听到护士在叫的声音，我赶快站了起来。

刚才给我诊察的那位年轻的大夫说道。肺门有点毛病，要好好地静养一个时期。血沉也比较多，不过，躺上三个月，多吃点好东西就会好的。”

肺门！肺门是什么呢？也许就是肺病吧！不，既然说是肺门，肺还没有坏呢，不会成为肺病吧？我也没弄清楚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就这样走出了诊疗室。

“说是肺门有点毛病，那不会是肺病吧？”

我这样说。佐山把头歪了歪。

“是怎么回事呢？我对这种事也一点不懂。再去问一遍吧，”他这样说。不过两个人又商量一下，反正照大夫嘱咐的话去调养就行，于是就回家去了。从那天起，我大约有十天的工夫只是躺着，尽量不活动，不干活，光是睡觉，吃饭。这种事情在我是生平头一次，使我有一种不习惯的、异样的感觉。

我每隔一天到保健所去一次，可是也有时候手头不方便，那就不去了。

早起把板窗打开，换进来的新鲜空气已经柔和多了。佐山有时候来。他因为还要干活，来得也不能像我盼望的那样勤，遇到他接连三天不来的时候，我就感到放心不下。有时候我正在烦躁不安，他手里却拿着两三枝大概一路在道旁折来的梅花，一边说：“看呀，梅花都开了呢！”一边走进来了。把梅花插在装醋用的空瓶子里摆了起来，连这间铺了四铺半破草席的污黑屋子，也会变成一间好看的、发着香气的屋子了。

大弟偶尔也回家来住。以前不务正业的时候，他是那么不好对付，可是等到他醒悟了过来，摆脱了二流子的伙伴以后，却变得异常严肃了，他就住在劳工饭堂，在那个被叫作“作坊屯”的朝鲜人聚居的地方帮人做麦芽糖。当然这并不是



他希望干的事，也不是他理想的工作场所。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他是个功课非常好的孩子，比三弟还要聪明。他很想继续升学，可是没有能够办到，於是，他不知不觉地竟变成了这一带人人谈论的一个二流子。到了现在，再想找职业也不容易了，只好由熟人介绍到那儿去做工。他不大讲话，看上去好像是很忧郁。做麦芽糖要通宵生着火熬糖，中午的时候把做成一定形状的糖用纸包起来卖。所以他每次回来，总唠叨说累坏了，可

是看来他并不是单单因为没有充分的时间睡觉，他好像深深地在考虑着什么事情。

“姐姐，我简直对这个世界觉得厌烦了，”他有时候突然透露出这样的想法，我听了感到说不出的不安。不久，有一天晚上，他说他老是这样干下去也没用，所以想干点别的活。我对他说，这话虽然有理，可是这个年月，连那些从来没有走过邪路的人还找不到好职业呢，我劝他稍微再忍耐着干一些时候。第二天早晨，他一声不响地又回去了。

爬上后山，就可以望见附近山岭上和远方市镇里开放着的鲜艳夺目的樱花。

我的心境很坏，我怎么也不能恢复原来那样的健康情况了。我说不上有什么大毛病，可就是打不起精神来干活。身体好像还是很虚弱。

“本来还说到了春天就见你的妈妈去呢。”

我觉得怪对不起佐山的。

“不碍事，等身体好一点再说吧。”

他用这样的话来安慰我。

我也不能老是不干活。大弟做麦芽糖只有一点点收入，当木匠的弟弟也只能挣一些零用钱。我正在考虑想点什么办法的时候，“木娃娃叔叔”来了。

“我想来看看，爸爸死了以后，你们是怎样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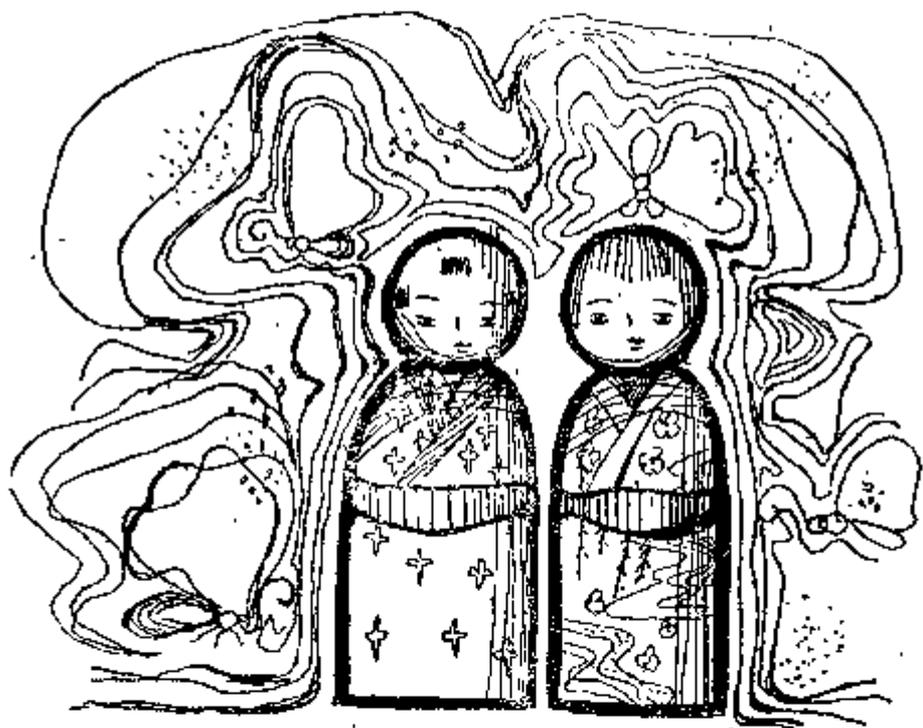
“我们在想，爸爸既然死了，叔叔们以后谁也不会再来看我们了，”我说。

“不会的，不会的。哪儿有这样的事——唉，真累真累，”他说着，在炉边坐下，点起了烟斗。

我说我的身体不好，他说：“是累的，不久就会好的。”我对他讲了佐山的事，他说：“你爸爸死以前给我写的信里也提过这件事，歌子是个好姑娘，将来一定很有福气。”他看来好像很高兴。晚饭后，两个弟弟也在一起，我们就商量怎样过日子的问题。不管怎么样，要是我不能干活，目前家里就没办法生活下去。话虽这样说，叔叔啦，还有住在各地的别的叔叔姑妈们啦，也都是勉强维持着自己一家人的生活，所以也不能要他们按月接济我们多少钱。叔叔想来想去，最后说：“你们既然有房子，光是女人小孩住起来也怪孤单的，干脆让佐山搬到这儿来吧，你看怎么样？”当然，他搬来是作为租用一间屋子的房客，结婚要等将来我的身体完全养好了再说。“那时候，叔叔和亲戚们大伙儿都要出贺礼了，哈哈，因为歌子从小就一直替家里操劳过来的，”叔叔一个人谈得欢天喜地的。

那天晚上，叔叔住下了。他要睡的时候，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事，从包袱里拿出一个报纸包来。

“你爸爸去世以后，我想你们一定很寂寞，所以给你们捎来一对我做的木娃娃，”他说。我打开一看，是一对可爱的夫妻娃娃。我把这对娃娃并排放放在炉边的小柜子上。虽然旁边没有人，我却独自在那儿飞红了脸，感到有点难为情。



第二天，我把佐山找来了。我把他介绍给叔叔，自己坐在旁边听他们两个人谈话。佐山的话很少，只是简短地应答着叔叔。后来谈到请他到我家来的事，他好像有点害羞，接着又说：“现

在我干活的地方工作渐渐闲下来了，再说，即使长期干下去也挣不到多少钱，只顾得上自己吃饭——”看来他很为难。

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就说：“那么你就到乡下去卖鱼，回来的时候带大米来，这样不很好吗？反正我也不能出去干活，我在家里替你吧米卖给附近人家好了。”

事情就这样简单地决定了。叔叔打了点酒，跟佐山两个人高高兴兴地喝了一通，那天傍晚他就搭夜车回去了。

佐山是在两天以后搬到我家里来的。记得那是在四月二十日左右。傍晚，我呆呆地站在盐铺前面一带焦急地盼望着的时候，看见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在夕阳下闪闪发光，骑上坡道来了。车上还载着一些行李和包袱。

“还要去搬一次被子，”他说着，马上又回去了。

两间屋子中，那间六铺席的给佐山和我两个弟弟住，我在四铺半席的起坐间住。因为我不能干活，生活困难，讲好收佐山连房租带伙食费六千元。我们决定第二天起就开始做生意。早晨六点钟左右佐山到市场上去买鱼，他把鱼运到他本村——骑自行车要走两个半钟头——去卖，回来的时候带大米，事情就这样谈好了。

“买了这辆自行车，做生意的本钱就只剩六千元了，”佐山笑着说，精神饱满地出去了。

大清早把佐山送出去，晚饭的时候他回来，他在身边无论如何对我精神上是一种鼓舞。佐山跟弟弟们挤在一块儿睡，似乎也不在乎，他好像还很高兴。关于运大米的事，不用说这一带连檐房，甚至附近的屯里也不知怎么都知道了，人人都来买，我呆在家里毫不费力地就能够把米卖出去。

这以后不久——我想大约过了五六天光景吧，大弟弟来了。他是晚上来的，那天很凑巧，佐山出去的时候说过，他卖完鱼以后顺便要绕到自己家去住。大弟弟跟往常一样没有讲什么话，吃过晚饭以后就跟弟弟们三个人并着枕头睡下了。我想也该睡了，正在收拾饭桌的时候，春夫起来了，他把被褥拉开，走进来，默不作声地坐在炉旁。

“我呀，简直觉得活着没味儿啦，”他说。我吃了一惊，盯着弟弟的脸。他带着沉思的表情，直直地瞪着眼睛。

“就这样混到老，到头来也不过像爸爸、爷爷一样死掉！像条虫子那么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不十分懂得弟弟的话。活着有什么意义……这是什么意思？要是尽想这一类事情，连饭都要吃不上了。

我说：“把事情想得这样复杂又有什么好处？春夫，穷苦的人只有什么都不想，光是一个劲儿地傻干，要不然就别想吃饭了！”

“你看是不是，第二句话就说到穷，穷！我最恨穷。简直受不了。穷怨得着我吗？哼，都怪那些把我生在穷人家的家伙——我要死，死给你们看！”

我大吃一惊。

我想说点什么，可是偏偏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话来。唉，怎么办呢？隔壁屋子里静悄悄的，弟弟们好像都睡熟了。我有一肚子话想说，可是不能够痛痛快快地说出来。春夫错了。他什么地方想错了呢——我在琢磨，不知道对他说些什么好。

我所说的也许跟我真想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可是我像哀求他似的说道：“春夫，话虽然这么说，可是既然已经生到世界上来了，就没有法子。只有活到死的那一天——觉得活着有意思的人也没有几个。”

“哼，敢情姐姐跟佐山打得火热了，觉得多么有意思呀！”

我的心一跳。真糟，春夫在感到寂寞了……

“佐山是佐山。咱们既然是姐弟，春夫也好，常夫也好，我觉得弟弟都同样可爱。”

弟弟默不做声了。我忽然想起来，从柜子里拿出邻家给的剩下的团子来给他吃。茶已经快凉了，弟弟只喝了两杯茶，就悄悄地站起来走了。

我呆呆地坐着想了好一会儿。我临睡的时候因为放心不下，轻轻地把裱幅拉开一着，春夫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醒着，他阖着眼睛，眼圈上的泪痕在暗淡的灯光下闪亮。

我想睡，可是怎么也睡不着，一脑子都是春夫。我一点不了解春夫的心情，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他很可怜。不愿意再干活……活着没有意义……到现在为止，我可曾这样想过一次？为了生活，随便什么样的活儿我干起来也不觉得讨厌；甚至也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做是愚蠢，而且也没有想过贫穷不能怪自己。我也想过不愿意受穷。的确，穷要是能够摆脱得了的话，我真想摆脱它。可是我觉得自己对于仍旧追逼着、纠缠着我的贫穷是没有办法的。也许女人容易死心吧。不是的，也许是因为脑筋笨，想得不深刻。春夫真可怜，他太聪明了——要是这样说，那么生来就穷的人还是笨一些的好——常夫在拚命地干木匠活，他大概像我，脑筋也笨。春夫一定把自己的

前途看得太透彻了。然而，我们周围的许多人都是这样活一天算一天，辛辛苦苦地度过了一辈子。大家都像理所当然似的吃苦受累，无声无息地死去……

这样一说，佐山啦，我啦，也是要在贫困中度过一辈子的了——即使跟佐山结了婚，我也得像母亲和奶奶那样，为了过日子，不得不拚命干活。作个长着一双雪白的手的太太，等着开上饭来吃现成的那种前途，我是作梦也没有想到过的。

春夫也许觉得自己跟二流子一道混了好几年，已经不可救药了，所以才想不开。也许就是这样。真可怜，从前他那种粗暴的举动，一定也是因为自暴自弃的心情没有地方发泄而造成的——那么现在的春夫怎样才能……不……

我来回翻了好几次身，再不快点睡着明天就会疲倦了。可是我越急越睡不着。时钟也好像发困似的报了一点，又报了两点。不久，三点也过去了。春夫好像也睡不着，我听到他一次又一次地翻身。

天快亮的时候下雨了，好像也起了点风。门不时在震动。佐山要是冒着雨回来那可太糟了。天如果能在中午的时候放晴就好啦——我打起瞌睡来了。雨声一阵阵更大了。我刚打个盹，一看

纸窗已经微微发亮了。柜子上的木娃娃在我的眸眼里显得很鲜活。我的心情本来很沉重，忽然发觉愉快的早晨来到了。

春夫和两个弟弟先后从家里走了出去。

“春夫，不要想得太多，还是干活吧。不久就会找到比较好的工作的——我也替你向朋友们打听打听，给你找找看，好不好？”

春夫只是嗯了一声，冒着小雨就出去了。

午后，天完全晴了。在地板上把脚伸了出去，暖和得叫人感到很舒服。我看到自己的两隻脚又细嫩又好看，倒有点吃惊。光是享受，不劳动，身体就会变得这样柔嫩、好看吗？我感慨很深地望着。我已经懒懒散散地过了快三个月啦。

晚上，佐山很迟才回来。

“想着今天反正没有买卖，所以在家里多呆了些时候，等着天晴，”他说着走进来了。

我一时感到有点妒忌的心情。

“跟你妈妈在一起比跟我在一起要好得多吧，”我赌气地说了一句。

“哪儿的话，不对，不对。没有这样的事！的确是因为下了雨，”佐山对我说的话认真起来，郑重其事地辩解着说。我心里想：就因为这样说拿佐山这种人没办法呢。我觉得好笑，转过身

去把背朝着他。

“不要那么生气呀！”佐山从后面搂住我的肩头，我突然出於本能地挣扎起来。我从他那因为惊慌而放松的手里挣脱开以后，就吐出舌头来哈哈大笑。佐山也大笑起来，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头，走进自己的屋子去了。

我给佐山弄好晚饭，他吃过以后，我还拿不定主意讲不讲春夫的事情。不知怎么，我总觉得说出来有点不吉利，并且也不知道该怎样说起才好，终于跟谁也没谈就睡了。

可能是由於昨天的疲乏，我好像一会儿就睡熟了。在酣睡中我听到一阵巨大的声响，原来是咚咚咚打门的声音。我吃了一惊，就跳了起来。

我把门闩拉开，打开门一看，一个陌生男人站在门口。

“春夫自杀了！”他说。唉呀，他真下手了！我觉得仿佛有人在我背上泼了一盆冷水。他终于干出来了！

佐山和弟弟们也马上都起来了。我不顾一切地往路上跑，佐山和当木匠的弟弟也在一起跑。

一股浊酒^①的气味和煮油腻东西的臭味直扑鼻子。这就是“作坊屯”。一条黑洞洞的窄巷子

^①原文作“浊醪”，一种没有除掉渣滓的白酒，味道很浓，是日本穷苦人民常喝的酒。

里，有一间板壁、泥上地的屋子，里面装着熬麦芽糖用的大锅，屋子中间站着七八个人。我跑过去一看，春夫被大伙儿围着，满身血淋淋的躺在门板上。他的喉咙和右手腕冒着殷红的鲜血。

“春夫，春夫，呜呜呜——”我在旁边一蹲，就哭倒了。

“快点，快点！”大家动手要把门板抬出去。佐山先把春夫的右手腕用破布重新扎紧。这大概是他在当卫生兵的四年中间学会的。他还指挥大伙儿把春夫的血擦干净，并且扶正了他的姿势，然后马上就由屯里的一些壮汉把门板抬起扛出去了。

最先赶到Y医院，一个年轻的护七走了出来，说大夫不在家，不肯收容。我们又立刻到O医院去。这里的大夫已经快七十岁了。妹妹、母亲、爷爷、奶奶以及父亲，全都在这里看过病，不，全都在这里开的死亡诊断书。一位三十来岁眼熟的护士走出来，她怪过意不去地说：“先生正患着神经痛，这样半夜三更，他年纪又大……”跟她争论了两三句也是白搭。春夫脸上越来越苍白了，没办法，我们只好向护士指点的K外科医院跑去。

“大夫伤风了，”护士这样说，我们理也不理，硬把门板抬进候诊室去。护士吓了一跳，退

到里面去了，另外出来一位年纪大一点的女人，看来像是大夫的太太。她非常客气地转达了一句见死不救的冷淡的话：说是主人不在家。我们怎么哀求也没有用。他们这样一定是因为一眼就看出了我们这帮人不像出得起钱的，也可能他们不愿意管自杀的人的事。

“春夫，打起精神来，春夫！”我不顾一切了。怎样也不能让他死——我怀着沸腾的愤怒瞪着那个女人。

大概只有O医院了，这样大家又回到O医院去。那里是认识我们的，总不能见死不救吧。先前的那个护士走了出来，她不忍心，就走进里面通知去了。老医生也没有怎么表示不愿意，立刻就开始消毒，进行救治。他说颈动脉和右手腕的动脉割破了，可是没有伤着致命点，所以还不碍事。

“作坊屯”的人们都替他担心，许多人跑来了。亏得这些好心人，才给春夫输了足够的血。

春夫只是断断续续地哼着，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大夫治疗完了以后说：“不碍事了，放心吧。”我一下子浑身的劲儿都松了下来，咕咚一声坐倒在角落里的长椅上。这时候挂钟已经指着两点多了。

大夫说最好住两三天院，可是钱没有着落，

我们要求大夫让春夫就这样在诊疗台上躺到早晨。到了早晨，又用担架把他抬回家来。

第二天起，大约一连三天，请大夫来替他治疗伤口，那以后，就由我领他去看大夫。春夫几乎完全不睡觉。一个星期左右拆了线，伤是渐渐地好了，不过春夫的样子很奇怪。他东张西望，眼睛里流露出不安的神色，常常说一些胡话。有一天晚上，他突然爬起来走到黑漆漆的厨房里去，带着奇异的表情从纸窗的破洞里向这边瞪着。又有一天早晨，他站在大门口，用奇怪的声音尖声叫着，好像顺手要抓东西来寻死。

我想他要是睡得好一些，也许就会安定下来，于是就到药房里买了点安眠药，可是只有头一夜有效，第二天就不灵了。我们就这样过着暗淡阴惨的日子。

佐山也很着急，尽量安慰我，可是他不能把买卖歇下来。当木匠的弟弟和上学的三弟每天各人都去各人的地方。我叫春夫睡在两个弟弟中间，想让他们监视着他，可是他们白天奔波一天，晚上很快就睡着了，所以白天夜晚，总还得我操心。再这样搞几天，我简直也要垮了。

我们把带刃的东西——像斧子和菜刀什么的——都藏了起来，二弟也把木匠家伙藏在眼睛

绝对看不见的地方。可是叫人着急的事还是连连不断地发生。夜里，大家都睡觉，静下来的时候，六铺席的房间里响起了咯嗒咯嗒的轻微的响声。

我心里一惊，隔着裱榻大声问：“常夫，你看看春夫在干什么哪？”说了两三遍，可是他好像睡熟了，没有回答。我轻轻推开裱榻的一看，春夫正在用皮带套住脖子要勒死自己。

有一次大家在吃晚饭的时候，春夫站起来走到隔壁屋子里去了，过一会儿他喊道：“阿歌，我死啦——我已经死啦，你快去报告警察吧！”他在赤裸的胸脯上，接近胃的地方深深扎进了两根针。

“这个混蛋！”二弟马上用钳子把针拔了出来，使劲朝春夫的脑袋揍了一下。唉，还不如当初让他死了的好——我真感到难过得哭也哭不出来。

在这连檐房屯里有某某教、某某宗、某某教团等等，差不多家家都是信徒。父亲在世的时候他们就轮流劝我们信教。父亲讨厌这一套，他什么教也不入。可是我听了街坊的话，想到要是能够从这种极不幸的境遇中解脱出来，就是当个信徒也罢。我对家里人讲了这件事，三弟反驳说：

“要是这样一来大家就都能享福的话，那么世界上就没有不幸的人了。”佐山也表示不愿意入教。

不久，房东的盐店大娘看到了我们家里的情形，也为我们着急起来。她说惨到这样程度，真是没法子了，就把我们这种情形对民生委员讲了。于是，上了年纪的民生委员和市公所的职员到我家里来了。不用调查，只要看一眼就应该能够了解我家的一切景况了。我们马上就办了申请生活救济的手续，预备接受父亲至死也不肯接受的生活救济。我们还是松了一口气。

我头一次到市公所去领钱。听说是早上去好，所以我是在九点左右去的，可是一看吓了一跳。进门左手的屋子就是福利课，人们从福利课门口排成了一字长蛇阵，穿过市公所楼房前的广场，一直排到大门口。这些人都是来领取救济金的。人人都穿得跟我一样破烂，有的人甚至穿得比我还要差。有的人离开了队伍，在附近的石头上坐着。有不少人用毛巾把脸严严包着，好像不愿意别人看见他的脸。

大多数的人都带着愁苦的表情。其中也有人脸上发呆，没有精神。时间不如自己想像的那么长，没等多久就轮到我了。

我领了钱刚要走的时候，上次到我家里来过的那个职员把我叫住了。他说我们的生活一定很困难，叫我把弟弟送到S市的精神病院去，费用当然由市公所负担，并且当天下午就可以由市公

所派卡车送去。我想，回到家里也没有可以跟我商量再做决定的人，就当场回答他说：“那么拜托了。”

中午过后，卡车照约定好的开来了。

由於坡道上有一段路很陡，车子绕了一个大弯，从学校方面开下来，停在盐店前面。

这一带的孩子大人都觉得是件新鲜事，从车子周围直到巷子的尽头都挤满了人。正巧姐姐带了娃娃来，我们一左一右搀着春夫，劝他出去，可是他硬不肯走，怎么说也不成。房东家的大娘和邻家的妇女们也都来了，他却好像更激动了，乱闹起来。汽车司机也走进来想帮帮忙，可是看见这情景大概感到有点吓人，所以抱着两隻胳膊在一边望着。

“这么勉强——还是算了吧。”

“不行，不行，这样做反而要坏事。”

来帮忙的人口口声声这样说。

盐店的大娘也说：“这样子可真没有办法——这话不好大声讲，不过听说穷人要是进了精神病院就会给弄死的。”

姐姐也说：这样太可怜了，虽然麻烦点儿，还是让他慢慢在家里养吧。我考虑了一下，春夫的衣服件件都是破破烂烂的，连被子都不够盖，决定还是不让他入院。

卡车开走以后，春夫盖着被子，好像静静地睡下了。

这以后，春夫还是很糟。可是他最疯的时期过去了，虽然恢复得很慢，还是一点一点地好了起来。他渐渐不大讲胡话了，莫名其妙的举动也少了起来。

五 活下去！

我突然感到很疲倦，也许是对春夫的事情放下心以后，紧张的心情松弛了的缘故。最初我还到保健所去，可是在这种混乱之中，我也顾不到自己的身体了，再加上生活越来越困难，於是既然自己不觉得有什么徵候，就不再到大夫那里去看病了。

佐山担心地问起我的身体情况，我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也许是因为放了心，所以有点儿发软。他说自己的身体要保重才行，还是找大夫赶紧去治好了吧。

申请到生活救济的人就可以凭医疗券去找大夫看病，所以我赶快到市公所去，回来的时候走进镇上大夫开设的叫作N医院的大门。窄小的候诊室里挤满了人，我等了差不多一个钟头。看病的是一位个子矮矮的五十多岁的大夫。

“以前在保健所，说是肺门有毛病，”我回答大夫说。

“还要再检查一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从透视看来，是早期浸润。”

“什么？”

“是肺浸润，还是初期，不过得趁现在马上就治才好。”

“肺浸润是不就是肺病呢？”我畏畏缩缩地问道。

“是的，就是肺结核——不过还很轻，只要一年的工夫不要累着，多吃点营养就会好的，”大夫带着乾干脆脆的表情说。

听说是肺结核，我多少有点丧气。跟从前干活的时候比起来，我虽然觉得现在身体有些发软，可是从肩膀到胸部还挺壮实，腰和脚上的肌肉也没有显得消瘦多少，所以我也不大在意。佐山好像也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还半开玩笑地说“尽量静养下去，早点养好了吧，我都等急了”一类的话。我既然有医疗券，就决定从此以后，每隔三天左右到N医院去一次。

佐山满有精神地干着活。早晨很早出去，在市上买进了鱼，然后骑自行车到自己本村里去兜卖，回来的时候运回约莫一袋米。我每天就呆在家里卖那些米。一天卖两斗到四斗米，每升可以

赚五元。佐山运米得要躲过警察严密的监视，干起来好像很不容易。警察几个人一批，坐着卡车或吉普车，在乡下的路上来回巡逻，眼睛瞪得碟子那么大，搜寻着那些哪怕只是运了两三斗米的贫苦的行商。一旦被抓住了，他们就要狠狠地勒索，除了把全部米没收以外，还要罚很大一笔根本缴纳不起的罚款。“用卡车或是船只运米的头号捐客们，都在他们各自走的那条路上请警察大吃大喝，所以警察不但不干涉他们，反而跟他们串通，告诉他们哪一天哪些地方有风险，”佐山时常愤慨地跟我讲这种神事情。

“所以我们卖鱼的也都组织好了，有什么消息马上就彼此打招呼。而且村里的人们也很叫人感动，穷人跟穷人一条心，他们总是为着我们担心，告诉我们：‘今天几点钟警察要走过这条路。’‘吉普车刚开过去。’”有时候，佐山老实的脸上露着笑容，对我们这样讲。我们对这类话很感到兴趣，跟他谈到随便什么时候都不觉得腻。

带上一大包米，怎么拚命地骑也会被吉普车追上抓住的。他说：“要是遇到山路就算运气好，可以连自行车带米都藏起来，可是走过一望无际的田地的时候可真没有办法，那就乾等倒霉吧。”

要不是这样拼命去运大米，光靠卖鱼是怎么也不够生活的。佐山来回要骑五六个钟头的自行车，还得提心吊胆地带着非常沉重的大米，所以干起来很吃力，每五天就得休息一次。而且每逢下雨，稻田里的小路就烂得骑不动车，不能出去办货。遇到这样的日子，他就在家里呆一天，所以，我不由得感到很快乐。

作为一个男人，佐山的心胸不够宽，不过他为人老实，又拘谨，所以跟弟弟们相处得很好。可是，我要是为弟弟们操心太多，他有时候也有点不高兴。弟弟们也一样，他们看到我替佐山洗补内衣的时候，就说：“我的也给洗洗吧！”然后胡乱丢了过来。这种情形很微妙，我也不得不留心。

佐山常说：“想早点结婚。”我也很痛苦。

夏天到了。春夫差不多已经恢复正常，可是他什么也不干，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他什么也没有心绪干。这也许是很可笑的。“不要老在家里呆着，偶尔也该出去走走，”我对他说，可是他觉得不好意思，哪儿也不肯去。

市公所常常有职员来调查。“居然让这么结实的年轻小伙子闲着，”职员有时候说这种讥讽的话。还有人临走的时候微笑着挖苦一句说：

“听说你收了个好女婿。”有善良的人，可是也

有坏心眼的，碰到后一种人，我很生气，觉得真不应该要什么生活救济金。领到的钱很少，每次评定的数额也不一样：那时期一个人可以得七百多元，我、春夫和三弟三个人一共领到两千多圆。

每月领一次钱，领钱的时候大家好像都尽可能穿得破烂一些。如果说这是穷人的恨性使得大家做出这种卑微的样子来，那可真是令人痛心。我去领七月份的救济金的时候，主管的职员是一个相貌冷酷的中年男人。

“你家里居然还供得起小弟弟上高等学校，受公家的救济还要这样做，真是奢侈！”他恶狠狠地这样说。

“是的，因为那孩子在兄弟当中身体最弱，一看就知道的：他个子小，又瘦得可怜，简直干不了力气活。而且中学毕业的时候，老师们都说他是个功课很好的孩子，不继续升学很可惜——”

“话是不错，谁都愿意让功课好的孩子升学，只要有钱——哈哈。”

我简直冒火了。

“是啊，不过并没有穷人就不许念书的道理呀，”我这样说了，接着又想：这下子糟了，跟官老爷吵了架就算完了。我赶快把口气改变得

温和些，客气些。

“老师劝他请求公家给出学费，所以他领了奖学金，一方面还在家里帮着搞副业，”我说。

职员一声不响地在文件上盖了章。我一路回家的时候觉得很气愤，心里想：只要有一点办法，谁也不愿意领什么生活救济金。

我们也不能老让春夫晃荡下去。市公所说要取消春夫所得的那份救济金，所以，进了九月不多久，我们就决定叫春夫到职业介绍所去打零工。他每天带着饭盒去干活。我想现在季节也好，这样搞下去我也放心。

又过了不久，有一天市公所的人来了。他微微地笑了笑，说：“住在你们家里的那个年轻人是你的丈夫吗？”

我心一跳，飞红了脸。

“不是，不是这样的。我只是租房子给他住，”我有点狼狈地回答说。

“不过———家里光住着些年轻人———”

我感到很难堪。即使他没有跑来这样问，街坊的闲言闲语也早已传到我耳朵里来了。

“喏，我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就跟他认识了，我大弟弟又那个样子，一点也靠不住，所以靠他来帮帮忙———”我说。

“虽然这样，市公所仍然要把你们看作夫妇

的——这样一来，就没有理由给生活救济金了——”他略微带点同情的口吻说。

佐山傍晚回来的时候，我对他讲了这件事，他说市公所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咱们既然这样住在一起，人家要那样看可也没有法子。尽管这样说，我们想到要是生活救济金被取消了可就糟了，因此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好。两个人想来想去，结果除了佐山搬出去以外，想不出别的好主意。我们真不愿意分开。我不愿意让他走，可是考虑到生活问题，只有趁救济金还没有取消，在什么地方找到房子。

第二天，我们就开始找房子。佐山不是S港的人，我在这儿认识的人却很多，所以由我到处去打听。

合适的房子很难找到。生活救济金眼看就要给停掉，所以我们拚命地找。这时候有朋友来介绍说有一间房子，不过只能算是个简陋的窝棚。

这房子在下坡向东北走三百多米远的地方，从海岸线凹进去的地方往断崖上走进一点就到了；地点很冷僻，正像那人说的，完全是个简陋的窝棚。一排一共约莫五间同样的小屋，这是中间的一间。里面居然也安着一盏电灯，铺着四铺半席。房东就住在附近，是个老头子，房租非常便宜，当然要自己烧饭吃，烧起来好像还方便。四铺半

席的屋子跟一间不算窄的泥土地房间连着，后面还有一口井。佐山决定立刻把这间房子租下来。租妥以后，马上就得搬过来。

第二天下雨。一下雨，两个人倒松了一口气。佐山最初说：“明天再搬吧。”可是天一放晴，他又得去做买卖。我们决定还是等雨暂时停了的时候就搬。

“搬了家，我也天天来，并且还得来卸大米呀！”他这样安慰我，骑上自行车走了。那是秋分前后的事情。

那以后，他每天都来。我也像往常那样卖米，还时常到N医院去看病。春夫又使我们着急了。他到职业介绍所去以后，头两个星期每天多少还带点钱回来，可是渐渐地他就很晚才回家，按天计算的工钱领到手，不等回家就花光了。我要是问他，他就乱踢乱打。我虽然觉得很糟糕，可是除了默不作声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我对他真感到腻烦了，然而我在心底里又可怜他，觉得他既然要在这个世界上过活，为什么性格偏偏又生得这样乖张呢？

到了十二月，冷风夹带着雨雪，刮在我光着的手和脚上。我担心起过冬的准备来，还得买柴禾呢。

柴火要是论捆买，贵得简直叫人吃惊。所以我总是到我小时候当过女仆的那家人家去，用特别便宜的价钱（一百元买一车）向他们匀一些柴禾来。我等三弟放学回来以后，一块儿去运了三送货车的柴火。在回家的路上，有一个地方坡道陡得厉害，骑不动送货车，只好把柴禾卸下来，搬到坡上。这是非常吃力的活。当天我没有感到什么，可是第二天发起高烧来，接着就得了厉害的痢疾，一直泻了一个星期。佐山很担心，用自行车带我到N医院去。大夫说是得了肠结核，我吓了一跳，完全绝望了。

“大夫，您说要怎样才能治得好呢？”我问道。

“要说呢，只要用一种叫作‘链霉素’的新药，注射四十来针就能治好——这种药比以前便宜些了，可是还是很贵，一针要一千元左右，等于黑市上买的价钱——”大夫摇摇头说。大夫还说不知道用医疗券能不能打这种针。（后来用医疗券也能打这种针了，可是在当时还不行。）我不用说一千元，就连一百元也没有。尽管这样，我还是绝不甘心死。我要想办法救自己。

佐山听说是肠结核，好像也大吃一惊，蹬自行车的时候脚都感到吃力了。两个人连话也没有说，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里。肠结核！唉，得

了肠结核啦——连三个月也活不成了！

我一到家，马上就咕咚一下倒在火炉旁边。要是不想办法，只有一死。我想要钱，要买药的钱——

佐山一声不响地在打主意。过一会儿，他心情很沉重地开了口。

“大概要多少钱才能用那种新药治好病？”

“说是四十针，那就要四五万元——”

我有气无力地回答说。佐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又继续想着。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想只有到市公所去请求他们给点钱——要是有什么办法都没有，我就出门干活去，哪怕不断地预支也行，反正你得好好地活下去。”

我的眼泪不断地簌簌落下来。

佐山挨近我的脸说：“不要悲观，不管怎么样也得把病治好——”

“这种病是长期的，不知道哪天才好得了——我，真是对不起你——光给你添麻烦——”

“你这是瞎扯！一定得放弃这种糊涂的念头，抱着准能治好的信心去治，要不然病就治不好了。是啊，要拿出精神来。要是这样还治不好，那就是命了。阿歌啊，到那时候我不会叫你一个人死的，我也跟你一块儿死。你应当这样想

着，打起精神来把病治好。”

佐山这样说着，紧紧地抱住我。

我一连拉了好多天严重的痢疾。我简直连站起来都觉得吃力了。照这样下去的话，只有等死。我静静地闭上眼睛，忍住肚子痛，母亲和奶奶的脸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清清楚楚地记起了父亲临死时候的痛苦。又过了几天，佐山说他一定要想尽办法弄些钱来，好歹要先住院才好。他带着礼物替我到N医院求情去了。他的恳求大概有了结果，医院说后天可以入院。可是临到要入院了，我却连被子也没有。

“我记得我家里还有战争时期配给的布呢，我去要来。”

佐山这样说着，马上骑上自行车回家去了。第二天一清早，他带回半匹黄色的人造丝料子来。他又到镇上去，补足了还缺的布，并且托邻家的大娘给擦好，这样总算拼凑出一床被子来。我趁着还没发烧，在午前就入院了。大夫说我虚弱得厉害，需要找个临时帮工来照看，于是就由市公所找了一个人。我的心情稍微宽松了一些，可是想想还是很发愁。这个医院规定伙食自理，这样，除了我的伙食外，还得给临时帮工预备，并且得去买煮饭用的炭。这样一来，日子就好像分作家里和医院两处来过，虽说是用医疗券住的

院，可是开支还是很大。这样一想，尽管在那里躺着，我也没有心绪睡觉。

N大夫给我打针，还给我药水喝。可是诊察了三天，病一点也没有减轻。啊，我多么想能够得救啊——我跟迎面扑来的死亡的恐怖搏斗着，怎么也挣扎着要活下去。

“医疗券上也没有明白说明不给使用那种新药，你硬去求求大夫看好不好，”同房间的大娘瞧我怪可怜的，对我这样说。这位大娘是附近渔村的人，家境好像还不错。医院大概一下子腾不出床位来，所以把这位患高血压症的大娘跟我这个患结核症的安置在同一间病房里了，她似乎不是个神经质的人，所以没有露出什么不愿意的样子，而且还对我这个穷病人很表示同情呢。

那天下午N大夫来查病房的时候，我就求了他。

“要是害了结核性脑膜炎这一类的病，用医疗券也可以打这种针，不过……”大夫这样说。

第二天我又硬求他。痢疾还是一点也不见好。我想自己既然不甘心死，要想法子活下去，就不要在乎大夫怎样想，也不顾什么羞耻或脸面了。N大夫终于被我这种恳切的请求所打动，答应替我向福利事务所交涉一下。

我的肚子刚不痛，又感到胀得很厉害，气闷

得很，每天都发烧。从病房窗口望着十二月的天空，身子虽然不能动弹，可是心却忽东忽西地动得很快。医院里和家里的开支只靠我和三弟两千多元的生活救济金来维持怎么够呢？每天自己的伙食费也感到逼得十分紧迫。还有当木匠的弟弟和佐山的生意也都是我担心的事。三弟来看我的时候说，当木匠的弟弟因为睡觉的时候老盗汗，这些天来一直歇着工，现在也起来开始干活了。我心里虽然想想真是可怜，对不起他，可是目前除了这样做，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好不容易得到了使用链霉素的许可。我作梦都在想着新药——自从N大夫最初劝我用这种新药到现在已经二十天了。从我入院那天算起，也已经过了十多天。

寂寞的正月来到了，这是少有的不下雪的正月，天晴的日子刮着寒冷的干风。从除夕那天开始注射的链霉素使我退了烧，痢疾也渐渐好了。佐山因为买卖的关系，大约每隔两天来看我一次。他对我说，鱼和大米的生意不大如意，所以打算买一架压乌贼片机器来做干乌贼的加工工作。弟弟们也时常来探望我。当木匠的弟弟说，他在大冷天里干活也不伤风，所以很高兴。“老天爷也还没有完全不管我们呢，”他这样说，坐在床头上微微地笑着。

过了半个月，一个月，快到两个月的时候，我的身体大致恢复了。我已经习惯在熄灯后的病房里度过失眠的夜晚。地板屋子里没有取暖设备，黎明时候特别冷。从玻璃窗的细缝里吹进来的雪屑打在我的脸上，耳朵和鼻子都觉得痛。我在暖烘烘的被子里抚摸着自己的身体，想到自己终于活下来了，就深深地感到能够活下去的快乐，我的心脏在手掌下面发出噗咚噗咚的声音——柔软的胸部鼓起来又落下去。我想活着。我想早点治好病，好干活去——希望使我鼓起了精神。

不论怎么节省，在医院里生活也要花五六千元。买鱼也净买骨头架子来吃，又生怕临时帮工不愿意。我连烧一块炭都觉得心疼。可是我想到当木匠的弟弟不顾自己身体有病，还干活供给我的花费，三弟也拖着瘦弱的身子开始送报纸，对这点事也就毫不在意了。

二月底，“木娃娃叔叔”来了。

“听说你住了院，我直念叨你怎么样了，”叔叔说，他像过去一样很慈祥。叔叔担心着我们家里的情形，来住了两夜。当时，我们谈起了春夫的事情。叔叔说：“他已经完全不可救药了，干脆就把他赶出去，跟他断绝关系吧。”这也是亲戚们一致的意见。春夫在职业介绍所打零工，

可只是在他高兴的日子才干，而不干活东游西荡的日子倒要比干活的日子多些。他从来没有替家操过心，可是我一边觉得对不起这个连手续都要替我们办的好心肠的叔叔，一边还是舍不得弟弟。

我说：“可是他总有一天会醒悟过来的，请再原谅他一下吧。”

在下雪的日子或者路上的雪化了的时候，佐山出去做买卖就有困难。而且自从我入院以来，卖米的生意进行得并不顺利，所以干到一月底就罢手了。他买了一架压乌贼片的机器，待在家里干活。他的工作是把干乌贼压平加上作料，上面放上写着“礼品”字样的漂亮的颜色纸，装入玻璃纸糊成的彩色纸袋里，然后批发出去。弟弟们好像也时常帮着去干装袋子的活儿。佐山为人老实，干这件事还一样样跟我商量，并且总是听从我的意见。

“怎么，阿歌，从现在起就老婆当家了！”同房间的大娘这样笑我，可是我仍旧觉得高兴。

我在N医院也住惯了。看护长是一个姓山村的人。她下面大约有四个年轻的见习护士，这些姑娘们常常到我房里来玩。她们也都过着贫苦的生活，她们除了吃饭以外每人可以挣上三百元。她们都挤在病房楼梯底下大约四铺半席的房间里

师。可是看护长跟见习护士之间却是合不来的。

见习护士说看护长总把她们的事情一件件地向大夫告嘴，都讨厌看护长。尽管这样，我在诊疗室却看见见习护士总是被看护长支使得晕头转向的，在大夫面前也是怯生生的样子。听说见习护士时常调换，我入院以来就已经换了两个。有一个叫阿良的姑娘被人告发，说她偷了药房的钱，自己辞了职。关于这件事她们对我讲了许多闲话。她们说N医院每天都把收进来的钞票浸在消毒药水里，放在大块的玻璃板上晾乾。做这件事的人是个给药房和会计帮忙的青年，他是N大夫的远亲。那一天他跟平常一样在晚上把钱摊在那儿，就到厕所去了。事情好像就是在这会儿发生的。

“阿良说她那时候绝对没有走进药房去，可是看护长说她一眼看见阿良从药房里走出来时的后影，一口咬定说是阿良干的。阿良真可怜——这些日子加藤（那个青年的名字）好像喜欢上了阿良，所以看护长要这样搞她一下子。一定是看护长故意偷的——”

她们对这件事很为不平。正在闹着的时候，阿良提了个小包袱就走了。

N大夫跟大家都合得来，所以N医院的买卖很好。可是医院对阔人和穷人采取的态度有很大

的差别，简直使我都替他们不好意思。我本来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不大在乎，可是在胸部感到憋闷或者肚子痛得难过的时候，就深深感到了这种差别。我对他们说我感到难过，他们的答覆是：“忍着点儿吧，你简直是个爵爷了。还有许多比你病重的人，穷得连大夫也请不起哩。你凭着医疗券居然还用了链霉素。”既然这样说，我也觉得确是这样，可是一阵阵袭来的肚子痛使我这个从小就被人家说是忍耐力强的人也受不了。一到这时候，医院里的人就说“简直是个爵爷，太奢侈了！”我觉得这比什么都使人生气。所以后来我不管怎么痛也不讲了。

进了三月，N大夫说肠结核已经好了，要打空气针。大夫给我扎了好几回，可是一点空气也打不进去。他没有给我上麻醉药，就把那五寸长的钉子似的针扎进去又拔出来，每次我都咬紧牙关忍受着。

大夫说：“肋膜粘在一起了，扎不进去。”

我心里想，好不容易饶了我啦，可是疼痛并没有马上停止。我回到病房睡下，到夜里呼吸越来越困难。我既躺不住也起不来，疼痛越来越厉害。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滚着，因为忍耐不住，就下了床，在地板上爬，一直爬到天亮。同房间的大娘说要替我叫护士来，可是大夫说的“你简

直是个鹧爷”那句难听的话给我的刺激很深，所以我痛得歪着脸，一直坚持着说：“天亮以前请不要去叫。”好容易窗外才发白了。

以后大夫又给我试了好几次空气针，可是都失败了。然而我的身体却显然恢复了，不过肺部的病灶还需要一些日子才能好。尽管如此，佐山还是非常高兴，他满脸带着快乐的神气说：“再鼓一把劲儿就成啦。”我住在医院里本来一无所有，从衬衣衬裤到手巾这些零碎东西都需要花钱去买，可是只要他留意到，不管钱多么紧他也一件件地全给买来了。压乌贼片的活刚开始的时候相当顺利。佐山正在讲起在我的病完全治好以前他多少能帮助我一些，可是有一天晚上他竟垂头丧气地来了，说大概是在港口附近把命一般的钱包弄丢了。

“我不是早就说过吗？都是因为你不肯听我的话。我跟你说过多少次，要把带子套在脖子上，可是你——”

那隻钱包是我身体舒服的时候坐在床上一针一针地缝成的，用的是帆布，能够折成三折那样大小，因为怕丢，还用结实的麻线编了一根带子按在上面；可是佐山老觉得不好意思，不肯把带子套在脖子上。钱包里有六千多元，几乎是他全部的财产。

祸不单行，过了不久，帮佐山批发乌贼片的那个人又把款子拐跑了。佐山知道了很着急，马上坐火车到那个人的家里去找，可是那个人早已不知去向，有几个跟他同样吃了苦头的人也赶去了。

比较起来，佐山算是个胆小的人，没有一点点狡诈或者油滑的地方，我看到他那种沮丧的样子，简直心疼极了。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偏偏又没有力量来安慰他或者说一些鼓励他的话，这使我更加痛苦。

“我还是到北海道去挣钱吧，”佐山愁眉不展地说。

我住在医院里，两个月、三个月地长期拖下去，钱就越来越紧了。我已经把临时帮工辞掉，自己烧饭吃，继续在医院里住着。我虽然穷，过去还偶尔送大夫和护士一些礼物，现在却完全办不到了。在私人开办的医院里，这样的病人怎么也会使人讨厌的。我本来已经死了心，反正穷人也得不到有钱人那样的照顾，可是一想到自己的病将来怎么办，就不由得发起愁来。

我正在这样闷闷不乐的当儿，隔壁床上的大娘说：“你不要这么发愁，到赤滨的S医院去看看怎么样，我听说那边不论对穷人阔人，都同样地照顾得很周到——不过，据说那是一家赤色医

院。”

我想，这年头哪儿会有这样的医院呢？可是我说：“是真的吗？那么像我这样的人到那里去才好呢。”

“是啊，是啊，听说那个医院专会治像你这样有肺病的人，”大娘说。

我被“对病人都毫无区别地照顾得很周到”的话大大地吸引住了。从那时候起，我每天都想转到那个医院去，可是当时医疗券的规定很严，不能照病人的意思换医院，所以我简直没有办法了。

我对佐山提起了这件事，他说叫我偷偷去看一次门诊，钱由他付。

从那天起，佐山好几天没有露面，后来突然又来了。他说买卖不顺当，所以决定尽早出门挣钱去。即使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买卖也还是勉勉强强的，偏偏又把钱包丢掉，款子又被人拐走，终于负上了债。佐山这么说着的时候，仍然带着明朗的神情苦笑。

“我又想去网走呢。”

我有点失望了。

“准备去很久吗？”

“嗯，把借的钱还清，手边还要剩点钱回来才行啊——今年年底回来。”

他好像心里在来回盘算着。

我不禁叹起气来。不过我也想不到有什么好工作能够把他留下来。他对我讲了许多关于未来的话：要耐心地干活，把债务还清，回来以后两个人成家立业。他想开个小型加工场，所以也想在这方面作些准备。他说：“阿歌，到那时候你可要把健康完全恢复过来呀，我也把这个当作熬头，好好去干活。”

春天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满了整个房间。我隔壁床上的大娘说，季节好了，打算在两三天以内出院。

“我真羡慕您。我也恨不得快点结实起来——”

我这样说的时侯，佐山好像忽然想起了似的说：“喂，到那个S医院去看看吧……我已经打听过了，那个医院管饭。要是这样就不必一面养病一面自己做饭吃，也就更加能够安安静静地养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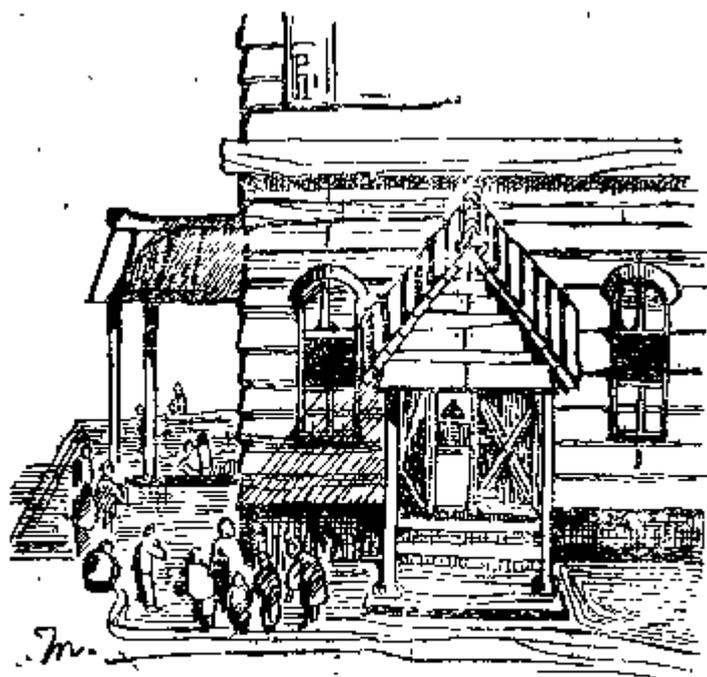
於是，我就突然请求出院一趟。

从N医院坐两站电车下来，走不多远就是S医院。刚出车站，左手是一条狭窄的石头路，这条路围着S医院转一圈。拐过角去就是医院的正门。虽然叫作门，其实只不过是两边立着像是倒

塌了的大门的两根石柱，连写着医院名字牌子也没有挂。走进去，是一条满是碎石和土块的凹凸不平的路，右手是新修建的一幢光线很好的灰色的大病房，左手却正相反，是一排破旧的病房，看来好像会漏雨。尽头上，正对着我，也有一幢像诊疗室似的建筑物，左边是关着的小玻璃门，大概是出入口。我四下里看了看，可是摸不清医院的门厅在哪儿。

我到处绕了半天，还是跟小卖店的大娘打听了一下，才走进破旧的门厅的玻璃门。

门厅的地是泥土铺的，周围的走廊墙壁上贴着许多照片。我心里纳闷这是些什么照片呢，连木屐也不脱就站在那里看。“好，快点进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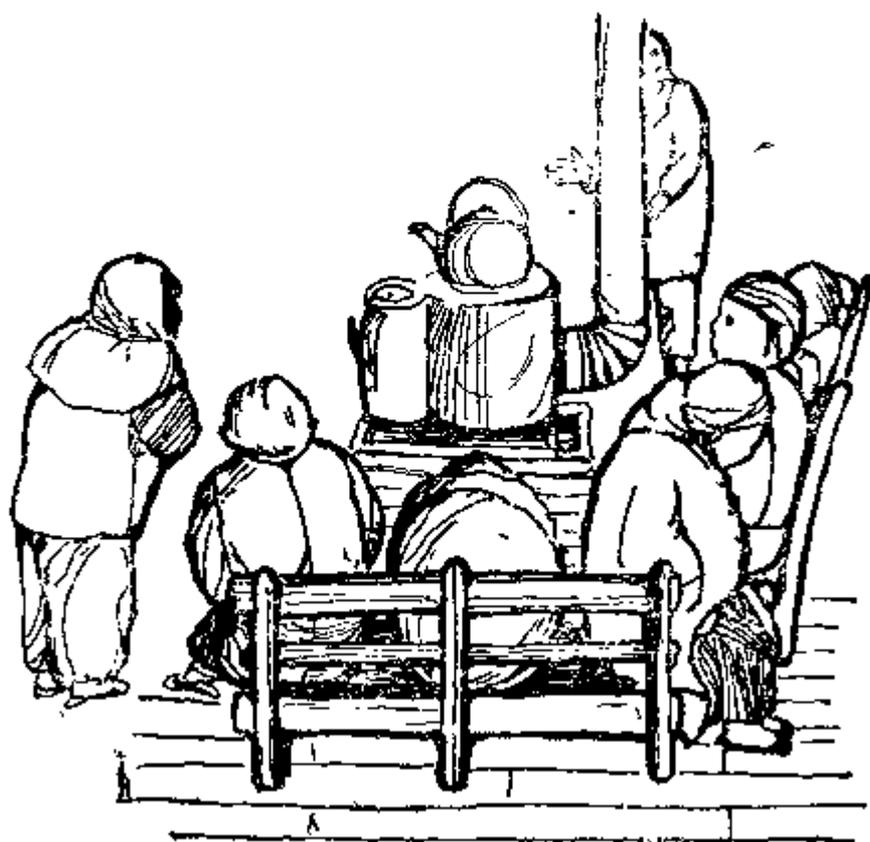
吧！”管鞋子的老大爷催促说。我正慌忙脱木屐的时候，佐山进来了。

“我找不到门厅在哪儿，跑到那边去了，”他笑着说。老大爷也笑了，在盖了一层白灰的炭火上烤着手，说：“病人们全都这么闹不清楚哩。”

进了右手的走廊就是昏暗的候诊室。那里只是把廊子加宽，就当作候诊室了，墙上也贴着许多东西。

我们俩在挂号处办完了手续，就在那儿的长椅子上坐下了。大概正赶上人最多的时候，当中放着一只火炉，四周的长椅子上坐满了人，再过去一点，椅子上也有许多人坐着等。这里跟N医院的候诊室不同，大多数人都穿得很脏，几个青年面色苍白，还有一些女人把娃娃裹在洗旧的背孩子穿的褂子里抱着，看上去都很穷苦。我无意之中回头一看，后面墙上用大字写着：“生活困难的病人请到专门解决生活问题的窗口去。”这里跟N医院的气氛完全不同。

佐山也好奇地看着周围的招贴和墙报。我站起来，到门厅走廊里看照片去了。那是苏联的照片。贴得满满的照片下面分别写着简直的说明。我把照片一张张地叠下去，读着一条一条的说明，遇到难懂的地方就跳过去。一座好多层楼的壮丽



建筑物的照片下面写着：这是按最新的建筑方式为工人的家属修建的住宅。

在美丽的海滨上修起了一所带圆形门厅的大建筑物，注明是工人的夏季休养所。其中结核病疗养所的照片对我最有吸引力。建筑物非常漂亮，窗子全是敞开着，一张张洁白的床整齐地并排放着，还有病人的食堂。照片下面写着：食物是按病情仔细调配的，好让病人得到充分的热量。还有许多工人病院的照片。我站在那里看个没完。忽然回头一望，才发觉佐山就站在我旁边。

“他们会不会也要缴入院费呢？”我小声问道。

“我想既然是工人，工厂方面会替缴费的。”

还有许多照片墙上贴不下了，就都放到安置在那儿的一张长桌上。佐山默默地一张一张拿起来看，可是我觉得站累了，又回到候诊室里去。来来往往的各种人都在看照片。候诊室里的病人差不多都换了，我呆呆地在等着轮到我。

“山田歌——子！”

尽头内科诊疗室的门打开了，年轻的护士喊道。我听见隔壁小儿科里娃娃哭的声音。这是个光线很好的房间。大夫个子很魁伟，四十来岁，宽额秃顶。他问了一下我的病历。我告诉他我凭医疗券正在N医院住院，可是想转到这边来治疗。他仔细地检查我，还照了透视相。大夫做事很麻利，看护也敏捷地协助大夫，工作态度真是使人惊奇。我感到一种有话都可以说出来的气氛，跟N医院有多么不同啊。

我模模糊糊地这样想着。

不一会儿大夫说：“现在你既然由别的大夫在治疗，我们觉得那边也是尽力在替你治病——不过你要是想到这个医院里住院，那么只要得到那边大夫的谅解就行。我们也希望看看到目前为止你的透视相和病历——”

大夫对我这个没有念过书的穷人讲话的语气和态度非常客气，弄得我脸都红了，只是答应了一声，匆匆地要走出门去。

看护在后面对我说：“请你到这边办公室的窗口去缴费。今天你没有拿医疗券来吧。那就请你光缴透视费吧。”一边交给我一张纸片。佐山还站在那里，也不知道在看墙报还是什么别的东西。我一看缴费的卡片，上面只写着透视费。

我对佐山说：“我享受生活救济的待遇住的院，可是没有带医疗券来看病，医院照样把别的检查费都免了。”佐山带着怀疑的神情哦了一声。我想省一点钱总是好的，心里很高兴。

又过了两三天，佐山去网走的日期确定了。我心里感到又寂寞又不愉快。我原来比别人都坚强，从来不屈服，现在看到自己这种样子，觉得又奇怪，又可怜。

“这次回来以后，我们就要结婚了，你要保重身体，快点养好啊，”佐山仍然高高兴兴地这样说。他说要把游手好闲的大弟带到北海道去。我说要是能够办得到，那是再好也没有的事了。关于春夫，不用说左近一带，就连亲戚中间，也没有一个人关心他的。可是佐山却诚恳地说：“到了陌生的地方他也许就会认真地干起来，愿

意自立了。”这样，两个人就在三月底动了身。

寂寞无聊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的病既不感到痛苦，也不感到难过。心里觉得能干活，可是多活动一点马上就会感到疲倦，因为肺里有病，自己也摸不透是怎么一回事。我已经躺腻了，觉得好像已经躺了三四年似的。我从被子里伸出手来仔细看看，手变得又白又细，连青色的静脉管都透出来了。我真想多多干活——我真想念以前被贫穷逼着干活时候的情景。怎么穷都行，只要能够拚命干活……

贫穷像把我的手脚缚在床上一样，叫我动弹不得，它像用丝绵勒着我的脖子似的，热呼呼地令人恶心。我带着好像是躲在阴影里度穷日子的心情，每天过着住院的生活。我并不好虚荣，要面子，可是心情变得很凄凉，很自卑。我觉得过去正大光明地受穷的日子倒反而要幸福得多。

我的手头越来越紧了。早早吃完晚饭后，我站在窗口，对着渐渐暗下来的春天的夕阳想着种种的事。我想健康的时候随便要我怎么拚命干活都行，只要有病的时候能够不愁吃，安心地养病就好了。这样的事情在这世界上是没有的。也许在天堂那种地方才能有呢——我是认真这样想的。接着，不知怎么我又清楚地想起了在 S 医院看到的一张张苏联的照片。我在梦里看见了死去

的妹妹的笑容，她好像在托儿所那样的地方打秋千呢。

不赶快出院就吃不消了。可是我一想起几个月前患肠结核的可怕情形，又担心病会再犯，不敢这样轻率。我想鼓起勇气申请转到S医院去。那里管饭，所以不用为了吃的着急，能够安心治病。我的父母、祖父母都是因为请不起大夫看病死掉的。我想，我至少应该请大夫治治，直到把病治好了，因为我还年轻，我一定要尽一切力量活下去。

“已经好到这样程度，为什么又想转到S医院去呢？”N大夫一边看着透视相片一边问道。

“这里要自备伙食，所以得花不少钱。我想S医院管饭，养病不用担心思——”我老老实实地这样说了。

大夫听了，突然大发脾气。

“真是！所谓‘得寸进尺’说的正是你这种人。政府这样照顾你，你还不知足，竟想白吃饭！你要知道一点廉耻呀，廉耻——”

三四个门诊病人在角落里的长椅子上坐着，大家都吃了一惊，转头向这边看。我羞得脸上像着了火一样，好容易才小声地说：“大夫，我并不是为了吃现成饭才想去的。不过在这里连吃三顿饭都有困难，照这样下去，病也好不了，所以

我想到管饭的地方去，好好把病治了，尽早去干活谋生，这样就不必再靠市公所照顾了。我并没有别的意思。”我气得声音都发抖了。

大夫马上叫护士打电话给市公所。他自己拿起耳机，当着我的面大声说：“山田歌子的病已经好了，限她今天出院。以后挂门诊号。”然后咔嚓一声把耳机挂上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只好回家。我把三弟喊来，马上作出院的准备。傍晚，临出院的时候我向大夫道了谢，离开了医院。我对大夫说：“谢谢您的照顾。”大夫随便说了句客气话：“以后挂门诊来看，很快就会好的。”

我离家五个月，又回到家里来。破烂的小屋，再加上一直丢着没有人管，简直不像样子了。所以我回家以后第二天，又不得不起床操劳。可是不管怎么样，大弟弟不在家总使我松了一口气。当木匠的弟弟虽然有时候会闲着没有活儿，可是他也还能挣一点点钱。

从暮春到夏天，我一直过着没有任何变动的疗养生活。大约每星期去N医院一次。我本来不愿意去的，可是换不到其他医院的医疗证，所以没有办法。

遇到身体舒服的傍晚，我就试着散步，慢慢地走上坡去。

这样散步的时候，我跟一个叫阿照枝的年轻女人相熟了。她是最近才跟一个挑夫结婚的。坡道向右拐过去一点的地方密密地盖着一片茅屋，他们就住在其中最小的一间里。茅屋后面是一片丛林，前面草地上有一些锯得很整齐的树桩子，我常常在上面呆呆地坐着歇脚。这种时候，阿照枝就在收拾房前的小块菜园子。她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我们不久就成了朋友。她的哥哥是生肺结核病死的，也许为了这个原因，她好像不大讨厌肺病。她在职业介绍所登记过，在打零工。她生来脾气很好，又加上还没有孩子，心情也悠闲，在没有活干的白天或是晚上，有时候来找我玩。她还常借给我米或者钱，不用说，过后我总是照样还她。

佐山来信了，叫我吓了一跳：他在做鱼酱的时候，被“牵制机”的齿轮绞住左手，挫坏了四根指头。

信上这样写着：

那是一瞬间的事，我怕你担心，所以没有告诉你。现在已经差不多快好了，我从下星期一起就可以回工场去做工啦。手指头虽然不能恢复原状，可是不用切断。亏得是左手，总算是不幸中的幸事。

他一定是在想什么心事，偶然注意力不集中

就被绞住的。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来着——我把那封信读了又读，感到他的身影、容貌和声音仿佛就在我的身旁。

尽管年年都是这样，可是夏天在家里真受不了。房子后面油蝉鸣叫的声音越听越叫人觉得闷热，我呆在不通风的屋子里，虽然一动不动，还是出一身汗。夏天不论是洗澡还是洗衣服，打水也是一件吃力的事。三弟替我打水，他从公用水龙头用桶把水提来，倒在水桶和洗衣盆里。我留神看着，他每打一次水，就蹲下来很痛苦地呼呼喘着气。他的身体本来就不结实，可是这种样子还是有点奇怪。这样一想，我又觉得他近来饭也不大吃得下。“是哪儿不舒服吗？”我问他。他说：“没有什么，我有点苦夏。”虽然如此，万一是……这么一想，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要是连这个弟弟也生起病来，那可怎么办呢。我知道应当找大夫给他诊断一下，可是我又害怕，没敢说出口来。这样一天天地拖着，学校放暑假了。他吞吞吐吐地说：“可不可以把送报的事停一停，到秋天再干。”不用说，这是因为他的身体吃不消了。这样，在暑假里，他每天都在闷热的家里躺着。我觉得他那本来就瘦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地更瘦下去了。

我终于下了决心，那是一种豁出命去跳山涧

的心情。我领了医疗券，把三弟带到S医院去。医院的建筑跟以前有点不同。前次的苏联照片展览已经没有了，不过候诊室的墙上还跟以前一样贴着种种招贴画和标语。

“让我们大家为反对废止医疗券的措施而进行斗争！”

我看到这样一张标语。

想不到很快就轮到我們了。大夫和护士还是前次我看病时候的那些人。诊断很简单地结束了。大夫只给弟弟作了精密的检查，嘱咐我们第二天去听结果。

第二天我们两个人又去了。我担心的事果然证实了：大夫查出弟弟得的是肺结核。大夫又说，肺上还有洞。我的眼前一团漆黑。好不容易咬着牙供他进了高等学校——一切劳累心机都白费了，想到这里，我的眼睛发暗，头也晕了。

我昏昏沉沉地走出诊疗室。

大夫劝弟弟住院。他说等到有空病床的时候马上就通知他入院，在这以前要施行人工气腹。我们两个人怀着说不出的阴暗心情走出了医院的门厅。我无意之中往旁边一看，木履柜子的墙上贴着带画的大张招贴，上面这样写着：

我们要靠自己的力量来获得健康！把重新武装

的钱用在社会保険事业上！

回家以后，两个人什么话也没有说，三弟好像比我还要懊丧，他脸朝着走廊躺着，纹丝不动。傍晚天刚黑下来的时候，当木匠的弟弟回来了。我一想起这个弟弟的奔波劳累，一句话也说不出口来。“怎么样？”他问道，我没有回答。二弟好像觉察到了，说：“果然是有毛病啊！”三弟嗯了一声。我悄悄地对他讲了大夫的话：“三弟得休学住院。”“哦！”二弟带着悲痛的表情听着。

吃过晚饭以后，我们也不想站起来，各人想着各人的心思。只有蚊子在嗡嗡叫着，讨厌地叮人。过一会儿，当木匠的弟弟就地躺下了。他闭了一阵子眼，自言自语地说：“咱们的家算是完全垮了。”

不多久，他说想到乡下去一趟。他的意思是这一带找不到好活干，所以打算把“木娃娃叔叔”的家当据点，在乡下转着干活，尽量把钱寄回来。他说，在乡村里干木匠活挣的钱，想来会比这里要多。我当时看着他的脸，想道：他的意思当然不会是假的吧。可是，他年轻轻的，是不是因为家里阴暗的不幸已经使他觉得闷得喘不过气来了呢？也许他想到，既然同样是受苦，还不如离开家，多少吸点轻松的空气——

他想这样做我不能拦阻，当然要高高兴兴地送他出门，可是家里竟连一条给他带走的被子也没有。家里一共两床被子，我用一床，剩下的一床是两个弟弟合盖的，这样就发生了困难。我把这件事对二弟说了，他说，到那边去挣了钱自己做一床，所以不必担心。他就这样仅仅拿着木匠家伙出了门。他是趁着天还没有热起来，坐早上第一班的火车走的。我和三弟两个人把他送到盐店前面。“我会想法子给你们寄钱回来，买点滋养的东西吃，所以你们打起精神养病吧！”在仲夏早晨清爽的空气中，他这样说完就快步走下了山坡。

家里只剩下两个病人过日子了。三弟到S医院去打空气针。我继续到N医院看病，可是八月底开始咳血痰了。我对N大夫讲了这种情形，他却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还是每次给我打两针。我想，既然大夫这样说，大概就是这样，我照常做饭和洗衣服。

不久，佐山又来信了。信里说，网走比别的地方工资低，所以有些人辞了不干，到别处去了。他自己也觉得没有干头，所以问我可不可以替他在别的地方找到工资较高的工作。

当天晚上，我就拿着这封信到住得最近的阿照枝家去商量。我是想，她的丈夫在搬运组做

工，也许会知道有更好的地方。

正巧她家里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女人，大概是住在近处的，我也时常碰见过她。我们很快就知心地无所不谈了。她原来住在阿照枝家隔壁的隔壁，有三个孩子。她姓田中，像是东京人。

“听说在苏联，连一个‘伴伴儿’也没有呢。”

听到她这句话，我心里想：真有这样的事情吗？“不会的吧——”我反问道。於是，田中对我们讲了许多事，说在苏联生活有保障，女人用不着当“伴伴儿”。我也想起有一次在S医院看到的苏联照片，三个人津津有味地谈起来。一着，已经十点多了。於是，我赶紧向阿照枝托付了佐山的事情。她答应丈夫回来以后替我问问，她自己也去打听打听。

田中的意见是：与其换地方，不如就在眼下干活的地方大家一起要求提高工资。

“能够找到更好的地方去干活固然好，不过在那里也免不了碰到降低工资或是解雇的事；不进行斗争，我们的要求是达不到的，”她说道。她还说，她们女工部大家就迫使厂方答应，工人带孩子去看病的时间，不扣工资。

在我看来，田中这个人很是了不起，我并且感到她是可以信赖的人。我想她说的话是不会错

怕。

回到家里以后，田中所讲的话仍然留在我的脑海里。单是没有“伴伴儿”这件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就使我马上觉得苏联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国家。我那许多堕落成“伴伴儿”的朋友的脸，一张张地在我眼前忽隐忽现。就连我自己，只要有人用手指头一推，说不定也很容易就会堕落成“伴伴儿”或姨太太呢。

田中说，苏联是由共产党当家的。他们搞政治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幸福。正是由於这个根本上的不同，所以日本穷人才过着这样痛苦的生活。我对共产党的事情一点也不知道，可是不知怎的总觉得那是个可怕的东西。田中说，共产党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只有对那些强迫劳动者拚命干活而自己只顾赚钱的家伙才是可怕的。我对这种事情不大懂，可是我想，不停地干活还受穷，甚至连饭也吃不上，这的确是怪事。过去生活一困难就去搞副业或者干加班活，想尽量多挣些钱，我感到那简直是徒劳无益。到目前为止，我只是一个劲儿地靠损害自己的身体而生活着，这种生活方式是不是在哪里缺了一颗重要的螺丝钉呢？——不知怎么，这种模模糊糊的想法在我心灵的一个角落里开始抬起头来。我没完没了地回忆起过去的生活。於是我更睡不着了，一直到天

快亮的时候还醒着。

过了两天，阿照枝的丈夫在出去干活的路上到我家来了。

“哦，早！”他很瘦，然而却是个精神饱满的小伙子。我们站在门口谈起来，他说正巧稚内^①有个好差使，可是还不大清楚哪天出发。于是我决定先打电报把佐山叫回来再说。

佐山在第三天晚上就回来了。他的左手受的伤比信里讲的要厉害得多，中指和无名指的指尖截断，短了一节。他显得满不在乎，可是我每次看见都心疼极了。

第二天早晨，我跟佐山面对面呆着的时候，突然感到一股腥臭味从胸部深处向上涌起，接着我就吐出来一大块血痰。我吓了一跳，佐山的脸色也变了。隔了一会儿，又吐出来一块。粘在草纸上的鲜红色的血块，冷冰冰地映在眼里。我说以前就常常吐，N大夫也知道，佐山歪了歪头。

他要我趁着他在家的時候静静地躺着，连做饭、洗衣服他都一个人包下来干。可是他只要一接到电报，马上就得到稚内去。我的心情消沉下去了，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

我想到佐山的身体并不算结实，可是他还干着活，我总觉得我加给他的负担太重了。自从我

^①稚内是北海道北部的都市，以产鲑鱼著名。

们认识以来，尤其是自从我生病以后，不用说在精神上，就是在经济上他也给了我们一家人很大的帮助。为了他所付出的牺牲，我觉得很对不住他。我两眼盯住他那勤勤快快干着活的身影，忽然想到：是不是该跟他分离呢？父亲没死以前就吐了两三年的血痰。我到了这般地步，即使能活，说不定寿命也只有三年光景了。佐山真可怜，反正我们也不能结婚，我是不是现在就该退出呢？——我暗自用指尖抹去了溢到眼角的泪水。我非常想跟田中见面。

终于来通知佐山了，他决定第二天早上坐火车出发。

晚饭后，我对佐山讲了那天晚上的事。我把从田中那儿听来的关于苏联的情况告诉了他，佐山也把从前夥伴们对他讲的话告诉了我。他说，在苏联，一个人只要劳动，生活就没有困难，这事大概是确实的。

他说：“我也这样想。我这个指头碰伤的时候，也都是亏得大家给办交涉，老板才出的医疗费，休养的时候也得到了工资。不过大家都分散到别的地方去了，其实到别的地方去，不一定就比以前的地方好。稚内的工资比网走的多一些，可是网走在冬季失业期间有失业保险，稚内就没有。”

“那么，到了稚内以后，为了拿到失业保险去斗争不就行了吗？”我说。

“阿歌，你忽然间变得伟大起来啦！”佐山大声笑着说。

我本想在佐山出发以前跟他一起去找田中谈谈，可是结果没有能办到。是不是现在就该叫佐山减轻负担呢？——这种想法在我心里逐渐清楚地形成了。可是一方面我又按捺不住这种被他吸引的心情：即使他把我丢了，我也仍然要跟着他走。对于这件事，田中会怎么说呢？——我独自这样想。

“阿歌，你怎么这样消沉啊，快睡吧，又要吐血痰了！”他说。

吐血痰，也许连三年也活不了啦——我突然下定了决心。

“佐山，我想要跟你分离了。”

“啊，分离？为什么？”他吓了一跳似的抬起头来。

“我想我是养不好的了，即使能够活下去，大概也活不长，让你等到哪一天，咱们也没有结婚的指望。这样拖下去，只有害你受苦受累，不如趁现在就分手……”底下的话就说不出来了。

“真是说傻话——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事。

阿歌好糊涂呀，你要是放不下这种多余的心思，不把心放宽些，振作起精神来养病，那么治得好的病也会治不好了，”佐山这样鼓励我，他的话使我的眼泪不停地流下来。

过一会儿，佐山忽然自言自语地轻声说：“真是，只要我能够多挣点钱，你也不至於过这种悲惨的日子了，我这样不争气，你真是可怜！”

佐山不断地劝我进S医院。他几次三番对我说，既然我很想到S医院去，就想法子要求市公所让两个人都到S医院去住院多好呢。於是我也振作了精神，说就这么办吧。

第二天大清早，他离开了家。他说不必送了，可是我说就送到前面，送到前面一点，结果一直送到了坡上。

佐山的身影转过拐角的邮筒消失了。我刚掉过身去，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头，原来是田中。

“你发什么呆呀？”她露着缺了一颗门牙的牙齿，精神饱满地笑着说。她穿着束腿裤，脸上包着手巾，正要出去干活。我对她说，我刚刚送佐山出门。

“我在N医院看病，想转到S医院去，可是用医疗券不能随便换医院，所以正在发愁呢，”我详细地对田中说了。

我们两个人站在那里讲话，好几个去上工的

人都躲开，匆匆地走过去了。

田中很认真地听我诉说着，然后对我说：

“这是生死大事，你应当到市公所去，顽强地跟他们办交涉，一回不行就两回、三回地耐着性子跟他们交涉，一定要他们答应。”她连在市公所该怎么讲都教给我了。

我到市公所去了。办事的是一个头发灰白的中年妇女。我把情形详细地对她讲了，并且说我也想到S医院住院去。

“不过——那是共产党的医院呢——光让弟弟去，你就到市立医院去吧，”她说。她盯着我的脸看了一会儿，又说：“你不是山田荣助先生的姑娘吗？”她原来是父亲在市公所工作七年期间的同事。总算是这场巧遇带来的运气，我顺利地换到了上S医院看病的医疗券。

我有了依靠，第二天就到S医院去了。跟以前一样，候诊室里挤满了工人装束的人们和穿得很贫寒的女人。桌子上放着好几册封面上写着“你也可以得到生活救济”字样的小册子，以及《苏联新闻》和图表一类的东西。那里还有一种叫作《每日病情》的报纸，大概是结核病人联合起来办的。我是第三次到这个医院里来了，每一次来我都感到一种令人鼓舞的气氛。也许是因为我感到受贫穷和疾病折磨的不单单是我一个人，

更加上我还有这种模糊的信念：觉得什么地方有一种替我把痛苦稍微减轻一点的力量。

那一天我头一次打空气针，而且一次就好好地扎进去了。我在N医院已经受够了罪，所以大夫打针的时候我的心直跳，可是在这里竟然毫不费事，很快就搞好了。给我打针的是往常的那位T大夫。医院决定只要床位一空出来，马上就让我入院，我回去的时候步子也觉得轻快了。不过，我感到遗憾的是，要是佐山知道了我打空气针的事再出门就好了，他要是知道的话，会多么高兴啊。……

从那时候起，我每星期去打一次空气针，弟弟也去。当木匠的弟弟只给我们寄了一次钱回来。我想，他初到新的地方，也不能马上就挣到很多钱，而且他自己还得做被子，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春夫到北海道去后一直没有音信来。只要不给别人找麻烦，他一个人能混下去就行了，我也不指望他什么。

九月过了。房租欠了一大笔，什么都是赊来的，我们已经欠下店铺八千元，简直什么办法也没有了。我本来指望战死的哥哥那笔遗族金可以发给我们，可是老不发下来，我急得不得了。

我和三弟两个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都怕去预备饭，常常吵架。没有米的时候，我们不吃饭，

就那么躺着。弟弟说，与其向人家低头借米借钱，还不如不吃。借的回数一多，我也觉得难为情，不愿意去。

有一天下雨，早上就没有米，我们没有吃饭，躺在那儿。中午刚过去，阿照枝来了。她打开门，在门口张望了一下，好像马上看出来，就说：“怎么，你脸上的样子像是还没有吃饭呢！”我说：“麻烦你的次数太多了，所以不好意思——”“不要有什么不好意思，我家里要是没有，那也就没有办法了；只要有，就给你拿来。”她这样说着，马上顶着雨走回去，用大碗盛来了一满碗饭。我和弟弟分着吃。在一片朦胧的白色中，我掉了好几滴眼泪，把饭粒都浸湿了。

到了十月，床位还没有空出来。我和弟弟两个人顶担心的是，住进医院以前的这段日子怎么过。我们商量来商量去，决定把值点钱的东西都卖掉。

虽说是要把家具等等一切东西都卖掉，其实父亲死以前的几年当中早就卖得差不多了，并没有剩下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个大概是爷爷那一代置下来的榉木衣橱，比普通的大一些，值点钱，其余只有桌子、橱柜、饭桌等，都是粘着几

十年的手垢，脏了也没人管，破破烂烂的东西。

“那个自鸣钟也能值点钱吧？”弟弟说。

“真的，怎么把它忘了呢。不过，那座钟已经完全不中用了。”

终于由街坊大爷把买旧货的人找来了。我们试着讲桦木衣橱的价钱，可是买旧货的看出了我们的底细，说是：“肺病人家卖出来的东西没有买主。”结果说妥了给两千元。所有的东西，从腌菜用的四斗木桶到洗衣盆，除了目前必要的东西以外，我们全都卖了，一共得到三千八百元。

买旧货的人把东西放在送货车上运走以后，我们两个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默默地躺着。原来有的东西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屋子里显得冷清清的，给人一种说不出是寂寞还是悲哀的感觉。草席破烂得都露出地板来了，只在一个角上留下衣柜那么大一块乾净的地方。熏黑了的墙壁上只有一处特别白，那是好多年以来放橱柜的痕迹。

“这下可穷到家了——”我说。

“是啊，以后也就不能比这再穷了”，弟弟说。我们两个人不觉你看我，我看你，眼泪汪汪地惨笑了一下。

那以后就光等住院了。我们用卖东西得来的钱改做了被子，还买了点零碎东西。姑妈给我寄

来一件住院时候穿的人造丝的和服。

十天，半个月过去了。卖东西的钱一天天地少下去。我到了这个地步也顾不得什么脸面了，就在打空气针的时候把家里的情况大致跟T大夫讲了。大夫显得有点吃惊。他说既然情况这么困难，就先叫弟弟来住院吧。

第三天，医院寄来了一张明信片。是准许弟弟住院的通知。

姐夫特意来照料弟弟住院的事。虽然已经是十月二十了，可是白天的阳光还很强烈。我们到医院正是吃午饭的时候。我身上淌着汗，把弟弟安置在病床上以后，真是疲倦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姐夫，姐姐都回去吧，”弟弟说。他在床上露出放了心似的微微的笑容。

我正要回去的时候，在门口碰见了护士。她对我说：“你后天也可以入院了。”我听了不觉反问道：“是真的吗？”

第二天早晨，姐姐来帮忙。我终于要在明天入院了。一旦到交回房子的时候，虽说家里空空洞洞，好像什么也没有了，可还剩点零七八碎的东西。中午刚过，阿照枝也来帮忙了。我把到了傍晚才整理好的东西往姐姐和朋友的家里各存了一半。佐山的东西也一起存在姐姐家里，吃过晚

饭，把家里整理干净，打扫完了，时候已经十一点了。

第二天早晨是阴天。田中在上班途中到我家来了，她说她是从阿照枝那里听到的消息。她说：

“有空的时候准来看你。”她留给我一条床单，还直抱歉说是旧的，很对不起。床单大约打了两个补钉，可是浆洗得干干净净。

大家说，最好趁着雨还没下就进院去，姐夫、姐姐和阿照枝都在上午来了。虽然这个肮脏的连檐房是贫穷和不幸的窝巢，可是它究竟是我住了十几年的家。现在一旦要离开了，就有一种说不出的依依不舍的感觉。吱吱作响的大门，火炉周围烧焦了的洞，厨房熏黑了的烟囱，处处都唤起我甜蜜的回忆。

我穿好了衣服。有一件姑妈寄给我的和服，不过没有衣带和外褂，不能穿，所以我穿的是束腿裤，上身是朋友给的下厨用的新围裙。

大家一起吃了茶。

“病这东西全是急出来的，阿歌心胸宽，所以管保会好，”姐夫带着宽慰人的神情说。

我把被子、衣服和身边的东西全都打好包，放在送货车上，也没忘记带上用报纸包着的夫妇木娃娃。神龛里的牌位也用包袱包好了。我们又把家里看了一遍，然后走出了门。

终于要跟这个家分离了。“再见吧，”我这样说着，关上了门。

姐姐、姐夫和阿照枝推着送货车先走一步，我到街坊那里去辞别。

我到房东盐店那里去，对房东十几年来照顾表示了谢意。大娘从小就特别喜欢我，她说：

“快点养好了回来吧。”我虽然不肯接，她还是硬把白纸包着的一些钱塞在我手里。

欠下的房租和欠铺子的账，我说好等哥哥的遗族金发下的时候再还。

街坊们都依依不舍地一直把我送到大路上。

“倒霉的事一件接着一件来，阿歌也真不幸呀——”

“人活一辈子哪能事事如意，治病可非得彻底治好才行呀。”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安慰着我。

盐店隔壁米铺里的老大娘也出来了。

“可真是不幸的事呀——不过别失望，快点治好病再来买我的米吧，”她说着，把铺子里的五个鸡蛋和三个苹果用报纸包好了递给我，说是略微表表心意。我还欠着她的账呢，心里直觉得过意不去，可还是接过来了。

我要赶上走在前面的姐姐和姐夫，所以被惜别的人们目送着，匆匆走下坡去。走到坡道陡的

地方我停下脚步，又回过头来向我们的家那边望了一下。那些送行的人已经看不见了，连房顶也看不见了，只有道旁的黄茅和杂草在随风摇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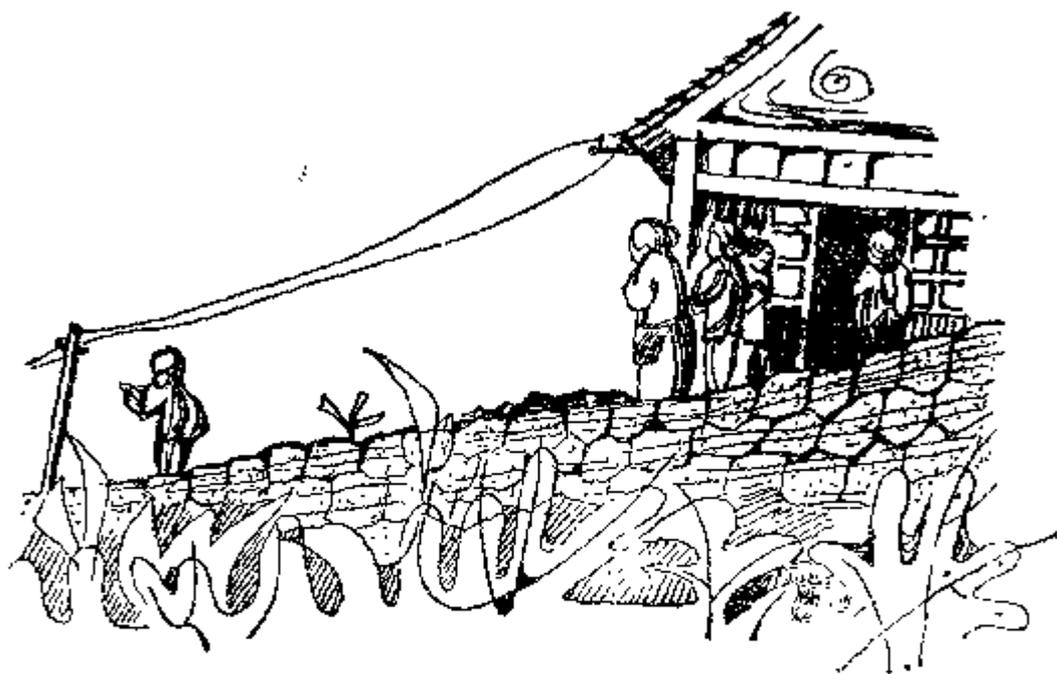
我在医院附近追上了送货车。我们到医院门厅的时候已经快三点钟了。门厅尽头开小卖店的大娘望着进院来的我们这一帮人，小声问我说：

“是谁入院呀？”

“是我，”我回答说。

“哎呀！”她好像吓了一跳，睁大了眼睛把我重新打量了一番。我这样穿着束腿裤和下厨用的围裙，也难怪她看我不像个病人。我暗自觉得可笑，我想她一定以为我是个伺候病人的呢。

按照护士的指点，姐夫帮我把被子等等都搬



到床上。我小心翼翼地抱着包了父母、祖父母和哥哥妹妹的六个牌位的包袱，怀里还带着剩下的六百五十元，走进了病房。

病房是小房间，有三张床。我的床位把着门口，另外两个也是年轻的女人。我朝这两个含着笑容欢迎我的人恭恭敬敬地鞠了个躬

姐姐、姐夫和阿照枝回去以后不久，阴沉沉的天就下起雨来了。刚好五点半钟，医院开来了晚饭。铝质的方盘子里放着同样铝质的碟子，白色的搪瓷碗和小盆子，我觉得样样都是新奇的。

晚饭后，病人们都在走廊里来回踱着，我还听见大房间里传来热闹的笑声。这也不过是一会儿的事，快到八点钟的时候大家就都静静地上了床。

“熄灯的时间是八点半，”我旁边病床上的O告诉我说。对了，我又慌里慌张地爬起来，在枕头上放了一张厚纸，开始在明信片上写着：

好不容易今天才入了院。因为放下了心，好象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房子已经退给房东，家具什物也都卖得精光。我剩下的只有你了。这个医院是个了不起的地方，我一定会养好的。因为我还这样年轻……

我不时舔着秃了的铅笔，聚精会神地给佐山写信。